

侯文詠小說中的體制論述與批判

目次

第壹章 緒論	3
第一節 研究動機	4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6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述	7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12
第貳章 《白色巨塔》 ——醫院體制的探討	20
第一節 父權體制下的陽具崇拜	21
第二節 人際網絡的牽扯	28
第三節 體制與親情的拔河	36
第四節 白色巨塔內的陰暗	43
第參章 《危險心靈》 ——教育體制的探討	56
第一節 教育體制的強制性	57
第二節 有「價值」的知識	66
第三節 功績主義式的假平等	74
第四節 個人焦慮與公共議題	82
第肆章 《靈魂擁抱》 ——媒體體制的探討	91
第一節 聳動的標題	93
第二節 媒體的共犯結構	100

第三節 攀登媒體的邊	107
第四節 媒體的「角色派定」	114
第五章 侯文詠小說中對體制的批判	126
第一節 社會體制的反思	126
第二節 死亡對體制的衝擊	128
第三節 作者在文本中的自我投射	137
第四節 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懷	150
第六章 結論	162
參考文獻	165
附錄一：侯文詠的年表	170
附錄二：侯文詠的訪談記錄	180

第壹章 緒論

筆者閱讀侯文詠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七年之愛》是在1988年。當時，希代出版社號召了一群稱為「小說族」的年輕校園作家¹，被偶像化包裝的他們大受歡迎，寫的主題多半是校園裡面的愛情。但《七年之愛》的路數不同，侯文詠以詼諧的文字寫著醫學院的事。筆者被這樣新鮮的寫作風格吸引了。《淘氣故事集》、《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烏魯木齊大夫說》、《頑皮故事集》、《離島醫生》陸續出版，擁有同樣幽默風趣的風格。

不過後來的他一改詼諧輕鬆的筆觸，在《白色巨塔》（1999）、《危險心靈》（2003）、《靈魂擁抱》（2007）長篇小說中，轉而為關懷社會體制的寫實風格，引發社會各界更多的關注與討論。他的小說內容反映了當前台灣社會中不滿的氣氛與不安的現象。打開電視，喪失理性及不道德的新聞天天可見，那是一種人與自身、人與社會的不和諧。但人類明明建立了許多制度，想藉此努力維持社會的和諧運行，為何一切不如預期呢？筆者發現侯文詠的作品正想面對這樣的問題。近年來他的文筆更加犀利，剖析著《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帶我們進入一個理性熱鬧的表象世界，再用人心深處的錢慾、權慾以及性慾，把那個看似秩序井然世界裡的所有意義與價值——不管是倫理、道德、義氣、友情、愛情，都一一解體，讓我們看穿：原來「價值」只是表層的假象，慾望才是底層的真正。正因為在乎真實，過去那些被視

¹希代出版社自創《小說族》這個名詞，讓六位念中文系，甫出校園一、兩年，得過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女性作者集體出書，創造出更大聲勢。包括吳淡如、楊明、彭樹君、詹玫君、陳稼莉和林黛嫻。這六位新人不負所託一炮而紅，小說在短短半年內也各售出五、六版。希代老闆朱寶龍在接受訪問時曾表示，他認為出書本來就是商業行為，當然要考慮市場，於是這一系列每一本書從書名到封面、內頁設計都充份掌握作者和作品的特性，有的書還用作者本人經過造形師設計拍出的沙龍照，有的在內頁放了大量生活照，凡此種種，據朱寶龍的說法，「包裝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針對年輕人，因此設計上要有親和力」。這種做法在當時文學書只是素樸地把文字排滿的文壇確實引人注目。除了六位女作家，曾獲學生文學獎的郭強生、侯文詠、安克強等人，也成為希代網羅的對象，並以同樣商業行銷手法，促銷他們的新作。資料參見林黛嫻，〈兼論《小說族》二十週年〉，《自由時報》副刊，2006年9月25日。

為粗鄙、貪婪、淫穢的一切於是有了值得被凝視的理由。²

在侯文詠眼中，《金瓶梅》描述的是一個不相信任何價值的世界，用「粗俗」來顛覆「價值」的虛偽，他發現自己存在的這個世界的內裡和《金瓶梅》的內裡，幾乎如出一轍。裡頭提過的問題隨著時代變得更加危險、尖銳，甚至充滿迫切。承襲著這樣的精神，侯文詠仍然使用他的作品來顛覆「體制」的虛偽、懷疑著體制內的「價值」，而這也正是筆者在本文的研究重心。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侯文詠的作品一向暢銷，改編為電視劇³後，更能引起熱烈的回響。但是，國內對他作品的單篇評論或學位論文並不多，使讀者無法對其小說特色有全面性的了解。有鑒於侯文詠小說研究仍屬於一塊處女地，小說中有許多瑰寶尚待研究者發掘，這是筆者對其小說研究產生高度興趣的原因之一，希望能從特定角度考察侯文詠長篇小說，以開發不同的閱讀視野，並試著揭示侯文詠個人在體制的生活經歷對其小說風貌上的意義。

1997年，侯文詠36歲，毅然辭去台大醫院主治醫師的工作。他曾分析到在他老家的觀念中，有人當醫生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但說到作家，恐怕沒有人會理你。因此他跳開的不只是醫院制度，還包括了整個社會體制長期型塑的刻板價值。

學校畢業以後，侯文詠進入醫院實習、工作，他心裡想：「我應該可以繼續往上爬，至少，可以混個醫學院教授來當。」他預想著自己在醫院制度之內的未來，一條恐怕沒人願意放棄的路，「但我很清楚，這個制度不能讓我感到快樂，制度之內的侯文詠不會是真正的侯文詠，因此我必須跳開。」⁴

²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台北：皇冠，2009年初版），頁9。

³侯文詠的三本長篇小說中，《白色巨塔》、《危險心靈》都已改編為同名的電視劇，導演分別是蔡岳勳、易智言。

⁴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30雜誌》：9月號，2006年。

侯文詠曾分析到：人們渴望成功，開始循著體制內的階梯努力攀爬、競爭，甚至鬥爭。然而，這塊樣板是如此高高在上，於是，體制內的多數人，窮其一生心力恐怕都無法享受成功的喜樂，「你想，這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生啊？」至於那些制度外的「份子」，下場並沒有好到哪去，因為他們棄離了多數人的標準，於是，也就像是一種尋常社會裡的不正常，一種畸形，成了遭到摒棄、遭到漠視、不被關心的一群。「如此看來，制度顯然存在許多違反人性的晦暗，而制度裡的每一個人、每個典範，就組成了共犯結構。」⁵人創造了「體制」原是爲了方便，最後卻不知不覺的，我們被它制約了，變成這個東西的囚犯，它的奴隸。

這樣的觀點也反映在侯文詠的長篇小說中，從《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到《靈魂擁抱》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那就是它們擁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對「體制」的探討，不過這樣的書寫對照其生平經歷是有些不尋常之處。因爲在侯文詠自傳性的散文集《我的天才夢》中，可以看到他的求學之路順遂，一路都是唸著大家心目中的第一志願；從醫階段也升等的很快，研究成果甚至被刊登在世界上排名領先的神經科學及藥理學期刊；後來出書又一炮而紅，成爲暢銷作家，並成功跨足電視、廣播相關領域，可說是媒體的寵兒。

照理來說，不論是教育體制、醫院體制或媒體體制，在侯文詠個人的經歷中，都是成功的樣板，然而他卻選擇寫出一本本省思體制問題的長篇小說。他曾提及自身創作的原點多半還是回到那個大哉問——人與制度的關係⁶，但其背後又有什麼樣的企圖心？這點更是激起筆者對他高度的興趣，加上目前尙未有論文是以「體制」的書寫主題來剖析侯文詠的長篇小說，因此筆者想當一個開端，希冀成爲日後研究侯文詠創作的參考方向。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361&auth=12360&keyword=%e4%be%af%e6%96%87%e8%a9%a0>

⁵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⁶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侯文詠寫了三個他所熟知的體制（醫院的體制、教育的體制、媒體的體制）來解剖問題，雖然文本不同，但其中仍有共同的脈絡可尋。他曾提到自己「一直在重複關心同一種題材，就是人的自由和體制之間的抗衡。」⁷林容萱也在其論文中提到這樣的看法：「侯文詠的作品出發點便是觀察社會，書寫各領域階層不合理的體制，以及人性矛盾和衝突的一面為衷旨。」⁸本論文即是從這觀點出發，想藉著這三本長篇小說的文本分析來探究侯文詠是站在怎樣的立場及視野去「解讀」體制？

他在《白色巨塔》中討論著醫學倫理與醫療醜聞，重新思考從醫本身的意義及價值，想要去除在這體制中的醫生本位。在《危險心靈》中以青少年為視角，用一個國三學生的眼睛觀看教育現場，想要瞭解台灣教育到底把學生帶往哪個方向？思考著建立新的教育理想的可能性。在《靈魂擁抱》中討論的是台灣媒體的亂象，要處理的問題是「媒體的地位及真實性」。侯文詠以不同的視角提出不同體制的問題，其中有反體制的意味存在嗎？對於這些問題在文本中又如何解決呢？以下筆者提出本論文所要研究的四個主要問題，希望藉由最後的答案來補足侯文詠小說研究的版圖，並詮釋其小說的特色，進一步找出他書寫的主題脈絡。

- 一、侯文詠長篇小說中對「體制」的解讀為何？
- 二、侯文詠在《白色巨塔》、《危險心靈》、《靈魂擁抱》中，分別點出了醫院體制、教育體制和媒體體制的哪些面向與缺失？
- 三、這樣的體制批判與侯文詠個人經歷有何關聯性？
- 四、侯文詠如何以其長篇小說來影響體制？

⁷陳宛茜、羅嘉薇，〈相對論〉，《聯合報》A10版，2006年8月29日。

⁸林容萱，〈大眾文學與社會的對話——以侯文詠長篇小說為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頁1。

第三節 前人研究概述

目前對於侯文詠長篇小說研究並不多，從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查詢，共計六篇，分別是陳筱涵的〈醫生作家侯文詠長篇小說《白色巨塔》創作基本要素研究〉(2008)、朱燕華的〈侯文詠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研究〉(2009)、林容萱的〈大眾文學與社會的對話——以侯文詠長篇小說為例〉(2009)、張淑敏的〈《危險心靈》的探討〉(2008)、張天泰的〈台灣校園師生溝通出了什麼問題？——以 J.Habermas 溝通行動理論分析《危險心靈》中的師生衝突〉(2009)、林貞均的〈白色雙塔記——台日《白色巨塔》異同研究〉(2010)。接著就將分別簡單回顧這些論文，並說明其中對筆者的研究又有哪些助益？

陳筱涵的論文是先做「小說」的界定，分別論述它的定義、類別、和創作基本要素。接著再探討「醫生作家」的相關論著，得到一個結論，她認為：

對醫生作家們來說，創作無非是另一種「關懷」社會的方式，以文字與生老病死作文學對話，臨床的經驗、生命的近距離體認等，文字就像是醫學的處方，它們撫慰了醫生作家們的心靈。⁹

筆者認為侯文詠對體制的探討正符合上述結論中所提及的關懷社會。最後論文中以小說創作要素：情節安排、人物刻畫、主題呈現與環境烘托四個層面進行分析，得到四點結論：一、人物與人物的衝突——醫療事件為主，情感線為輔、二、多線線索結構的情節布局——豐富內容，拓展張力、三、權力鬥爭的衝突——以「社會寫實」的寫作手法書寫、四、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交織——生死與良知。強調侯文詠的文字中寫出「真實」，從生活周遭做取材，貼近讀者們的生活領域，

⁹ 陳筱涵，〈醫生作家侯文詠長篇小說《白色巨塔》創作基本要素研究〉，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頁56。

並可供給讀者及社會省思的機會。¹⁰

這樣的結論對於筆者在第二章分析《白色巨塔》時，有相當參考價值，而其中「供給讀者及社會省思的機會」和筆者認為侯文詠企圖以其長篇小說來影響體制的看法相同。唯其論文不足之處在於花太多篇幅探討「小說的創作要素」，而文本的研究也就相對薄弱。

朱燕華的論文研究是以侯文詠小說群中的女性主題分析為主，主要蘊含了男尊女卑思維下的女性悲情、弱勢處境與偉大女性的情操等思想議題，並引用女性主義理論與文本結合來加以分析，企圖由解讀其文學作品，探討侯文詠潛意識中的女性觀與其對女性族群的關懷，並從小說中的各類女性人物析探其呈現之女性困境與社會問題。其中說明了時代的變遷與個人成長經驗是如何形成侯文詠創作的重要因素，這對筆者做其傳記研究時是有所助益的。

林容萱的論文研究則著重於作家及作品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從各種媒體對侯文詠的訪問中梳理出其學經歷如何影響他的寫作及創作風格的轉變？並經由他的自述裡窺視其寫作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再透過解析三本長篇小說的內容加以印證，最後推展到侯文詠作品所歸屬於的大眾文學，論述其中的評價和缺失問題。¹¹

論文在最後歸納出侯文詠的長篇小說特色，認為他有強烈的社會寫實意圖，期望能對讀者產生意義，這點看法正是筆者所要探究、分析的。另外在寫作風格上，描繪的人物都是屬於社會中高階層的人，而且是對身處的行業失去熱情和靈魂的一群。筆者以為這是侯文詠所要傳達的重要訊息：在體制中成功的人不一定是快樂的。最後，在藝術表現上則慣用批判口吻和諷刺語氣，尤其媒體角色和政治人物是三本小說共同批判對象。

其中還點出了三本小說的主題：《白色巨塔》是對醫療體系腐敗的批判，包括了升等制度、紅包文化、人事鬥爭，也探討了夢想與現實的差距。《危險心靈》

¹⁰陳筱涵，〈醫生作家侯文詠長篇小說《白色巨塔》創作基本要素研究〉，頁 140—143。

¹¹林容萱，〈大眾文學與社會的對話——以侯文詠長篇小說為例〉，頁 21。

則在剖析師生之間不對等的教育、家長和老師的弔詭關係，以及學校和社會的偏差態度，認為台灣教育的問題是一種共犯結構，也質疑快樂與痛苦的學習差距。

《靈魂擁抱》是在透視媒體與文學的合作及角力，並釐清媒體、名人、觀眾的利益供需，及名氣與隱私之間的相對關係。這是目前為止，唯一包含了侯文詠全部的長篇小說研究，對於本論文自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張淑敏的論文以約瑟夫·坎伯 (Joseph. Campbell) 經典之作《千面英雄》一書的〈英雄的歷程〉概念，來探討《危險心靈》中主角謝政傑的英雄冒險經歷，並將他在抗爭時的心靈旅程，共分啓程、啓蒙及回歸三個階段，以角色、事件和結果來解析文本。並且探討作者侯文詠的經歷和其作品風格、教育觀及創作《危險心靈》的動機，研究侯文詠透過主角謝政傑在書中傳達他的教育理念，且將整個教育改革的弊端作一番描述。¹²

此外，她歸納出侯文詠散落在作品中對制度的看法如下：一、因循舊習的制度，將造成制度內部問題叢生、二、官僚體系加深社會文化之惡、三、台灣的制度容不下與眾不同的人、四、制度有問題是每一個人的問題、五、中國人的社會制度是由名或利來評估人的成功與否。¹³這些看法跟本論文的研究主題關係密切，極有參考價值。本論文則選擇不同的角度，進一步來討論社會上的體制問題。

同時，她在論文中對侯文詠的長篇小說創作有提到一個看法：

他在創作長篇小說時總是先有某一種反抗或革命的理念再創作，看他的作品絕不會只是趣味而已。¹⁴

這點跟筆者論文研究的主題是相互印證的，筆者認為體制的探討、改革一直是侯文詠長篇小說的核心價值。不過在其結論中有一點太武斷，就是她認為「侯

¹²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1。

¹³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頁46—47。

¹⁴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頁28。

文詠以自己的人生經歷虛構一場台灣教育改革的冒險故事」¹⁵，事實上根據筆者對侯文詠的訪談得知，《危險心靈》是他在台北碰到一個case，然後再找了大概一、二十個台灣教育事件，把它拼湊出來的。¹⁶

張天泰的論文試圖探究在校園中，師生彼此溝通所出現的種種問題，並透過 J.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中的「有效宣稱」概念，來檢視造成師生溝通障礙的問題癥結點為何？在找到支持「有效宣稱」能實質化解師生衝突的論據後，進一步去化解上述溝通問題的可能解決原則與方法。其中的論述對筆者在第三章討論《危險心靈》中的教育問題是具參考價值。

林貞均的論文主要是在研究台版侯文詠的《白色巨塔》及日版山崎豐子的《白色巨塔》，分別從作者的身份背景、寫作動機、小說中的人物以及揭露醫界黑暗面的書寫，來比較兩書其中的共同點和差異點，以突顯其各別的意義。論文最後所得到的結論是：山崎書寫時著重「人性」觀察和描寫，筆觸中常帶記者的考證精神，文風犀利明快、時發議論，並且將故鄉大阪風物融入作品中。侯文詠則以醫師的角度入手，筆端帶有省思及人文的關懷，小說中時時穿插角色的回憶、筆調抒情，也描寫了台灣「媒體當道」社會現象，且女性意識抬頭、多位女性扮演關鍵的角色。¹⁷

這樣的分析、歸納，算是對當初兩書的「抄襲風波」有了一番中肯的評斷。其實侯文詠也曾對這樣的抄襲傳言有過一番說明：

我在 1997 年寫作這本書之前，從來沒有讀過日本的《白色巨塔》(台灣沒有中文版，我沒有閱讀日文的能力，根本沒有機會讀到)。2004 年改編自 40 多年前同名原著的 NHK 日劇開始在台灣風行，我才第一次在網絡上看到這樣的傳言。那時候距離我 1999 年在台灣出版《白色巨塔》已經過

¹⁵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頁 1。

¹⁶ 參見本論文〈附錄二〉。

¹⁷林貞均，〈白色雙塔記——台日《白色巨塔》異同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年，頁 147。

了5年了。我覺得很驚訝，也覺得很挫折，彷彿好好走在路上，忽然有部車從後頭追撞了過來，又用很快的速度往前開去。畢竟《白色巨塔》的故事是我青春年代珍貴的經歷與記憶(這些真實經歷或者是情節改編的來源我甚至很容易就可以提出根據)，也是放棄了醫師、教授的職位，並且必須面對台灣醫療體制沉重的壓力去寫出來的東西。

不過命運的意志遠大於個人，我自己的作品也遠比我個人的處境代表的事情更多，這件事最終恐怕只能靠讀者閱讀我的小說，讓作品本身去說明了。我的《白色巨塔》和日本的《白色巨塔》雖然對象都是東方文化傳統下的醫院，可是實在是不同的作品：情節不同，歷史背景不同，主旨也不一樣。我喜歡山崎豐子女士的作品，她的《白色巨塔》帶著一種令人動容的光和能量。我無意，也不想借別人的光，只希望自己也能發出一點點的溫暖，哪怕只是螢火蟲那般微弱的光芒。¹⁸

從上面這段文字中，除了可以理解到侯文詠對抄襲的指控作出的反駁外，有兩點是筆者所關注的。首先，《白色巨塔》正如侯文詠所言，是一本面對「體制」壓力的長篇小說。其次，書中的內容是侯文詠的經歷與記憶，並非憑空杜撰。這兩點將是筆者論述的重要根據，筆者認為侯文詠之後所寫的長篇小說《危險心靈》和《靈魂擁抱》也有相同的特點。

除了上述六本學位論文以外，尚有張淵盛的單篇論文〈從精神分析觀點解讀侯文詠短篇小說中的類型人物〉，他從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出發，透過歸納並解析其短篇小說內常重複出現的四種類型人物：衝撞成人價值的頑童、只會讀書的醫學系學生、負面形象的醫師及人生競賽的旁觀者，以此解讀侯文詠的潛意識心理。並指出「壓抑與自由」這兩股矛盾的力量總不停地在其作品內交融，而這些類型人物正呈現出侯文詠心靈世界裡對自我壓抑的反抗及對成功價值的質

¹⁸ 河西撰稿，〈侯文詠：搖擺在幽默與冷峻之間〉，《新民周刊》第450期，2007年10月，取自<http://magazine.sina.com.hk/xinminweekly/450/2007-10-21/ba41444.shtml>

疑。¹⁹這樣的研究、論述雖是以侯文詠的短篇小說為主，但結論所提出「壓抑與自由」的矛盾，筆者認為正是侯文詠在體制內的感受。而用這樣的角度分析侯文詠的潛意識心理，對筆者的研究亦深具參考價值。

此外，在論文、資料的搜集當中，筆者發現相較於《白色巨塔》或《危險心靈》，《靈魂擁抱》的討論並未多見，這也是本論文要補足的部分。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筆者是以侯文詠的個人生平，及其長篇小說《白色巨塔》、《危險心靈》、《靈魂擁抱》為研究範圍，而他的兒童文學、極短篇、短篇小說與散文等書籍則排除在外。至於當中的《白色巨塔》、《危險心靈》被改拍成電視劇，可能存於電視劇與小說原著之間的變更，本文不加以探討。

另外，在本論文中所使用的「體制」一詞，依教育部的《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²⁰中的解釋為「一定的規則、制度」，因此筆者對「體制」、「制度」的定義是相通的，在此先做一番說明。

侯文詠在這本三篇小說中分別探討著醫院的體制、教育的體制、媒體的體制，這些都是人為的一種制度，可見「制度」這個議題正是其小說創作的核心，因此筆者將先以社會學的觀點對「制度的意涵」做一番整理、論述。

葉啓政在《制度化的社會邏輯》中說：

制度是一種表現在生活世界中具「體系」化的人為創造體。在一定時空下，對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是有一定的意義——至少正式的形式意義，否則就難以對人們產生制約的作用。因此，容或人們對制度會有不同的理解，制

¹⁹張淵盛，〈從精神分析觀點解讀侯文詠短篇小說中的類型人物〉，《思與言》第45卷第1期，2007年3月，頁125—155。

²⁰ 參見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度本身並不只是人們腦海中的概念組合體，而是一個透過人際互動過程展現實際效力的權力運作形式。準此，制度是一種有相當秩序，超越個體，而且對個體有制約作用的。²¹

從上述對「制度」的定義可知，我們如果從社會化過程的角度來看，制度是為了一種人際互動過程中行爲的定型化，它的存在通常有其歷史性，絕非一朝一夕可形成。

制度之存在是藉由先被正名的行爲模式而控制人類的行爲，並且使之有一定的導向。²²

任何制度一開始即把人的個別意志與認知模式加以定型化，當制度化形成即代表透過了某種權威展現形式的運作，把人類的活動納於社會控制之下，並予以例行化，最終「制度」超越了個體，又能回過頭來對個體產生一種制約作用，也就是所謂的「約定俗成」。人們在制度化的互動關係安排下，個體的意志自然趨向萎縮，所有的行爲都相當有秩序地被加以分類、定型，人們因此習慣只要依照著制度下安排的規則去做就行了。

因此制度化中有一個最重要特質就是個體行爲的「例行化」，也就是所謂社會中各種傳統的形成，鉅細靡遺地把一些行爲、價值、認知、規範都給予定型且標準化，讓人凡事皆「有例可循」，並以正當的權威方式為基礎去合理化地詮釋這個世界。

制度化世界的意義首在其對生活世界具「規範」的正當性，本質是人為的理性安排，其特質是展生的，也是理想與預定的。透過社會化與社會控制，

²¹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東大，1991年初版），頁69—70。

²²P.L. Berger & T. Luckmann 著；鄒理民譯，《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台北：巨流，1991年初版），頁72。

制度化世界中所設計的規範與價值被嵌印進生活世界之中，兩者之間有重疊互扣之處。²³

社會制度是凌駕個人之上，它有一股無形的控制力量，這股力量以不同的形式、強度加諸個人身上，就像一條無形的鎖鏈，個人是無法隨意地抗拒制度。它的威力不僅是一種行為上的服從，而且還可以使它所認定的價值產生內化。它是一羣握有制度化主控權的人們企圖把一套東西（包含價值、觀念、規範、行為模式等）加諸另外一羣人身上的一種刻意安排。因此換言之，制度化的背後所隱藏的往往是一種對人類行為、思考的「控制」。任何對制度秩序急劇的偏略，均將被視為不正常、不道德乃至心神失常，而貶抑至卑微之異。²⁴每個人都被教導「中規中矩」地行事，如此一來，個人行為將更能預測與控制。

在制度化的體制內約束下，支配優勢者自然不鼓勵，甚至壓抑其他人（甚至包含他們自己）對體制從事革命性的變動。這些人成為制度的化身，他們的意志主宰制度，也為制度所吸納；他們的存在意義靠制度化的內容來彰顯，利益更是仰賴制度來保障、確立、和維繫。他們要求自己，更要求別人（尤其是居支配劣勢者）把意志表現於貫徹體制內所界定之文化內容，並且遵循其界定之規範形式來行事。透過如此雙重的意志運作，制度的權威地位得以保證，並且產生效力，人的社會位階關係也因此得以確立，所謂「結構強制性」由是產生。²⁵

社會是由許多個體所組成，人們為了分配與運用有限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了不同的制度，好提供一套具約束力的行為標準，令社會穩定發展。而在制度內，為不同的個體提供不同的角色，藉此基礎與別人互動。角色是一種客觀化與習慣

²³葉啟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77。

²⁴ P.L. Berger & T. Luckmann，《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頁 82。

²⁵葉啟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139—140。

化，透過角色的扮演，個體才能參與社會，而只要人扮演角色就有一套操作的標準，其行為也就受到控制而無法任意為之。角色是社會對不同個體之行為的界定，以符合外在規範和期望，而在這個角色當中，往往有優勢者與劣勢者的差別，也就是一種階級差異性。

因為彼此主導的地位不同，所以這些在制度內的支配優勢者必須有各種正當的說辭，來詮釋自己既有利益的合理性，並對制度內所界定的各項規範有一套一致和廣涵的解說，使之趨於正當化，以使居支配劣勢者得以信服、遵循。在制度化活動的行動者，必須有系統地瞭解這些制度，因此需要「教育」的過程，使制度能強而有力地烙印在個人的意識中，也就是一種被社會化。好藉此避免任何可能發生的對立、矛盾。因此任何制度化的形式都可能蘊涵著一套特定的分配理論以來呼應既得權益者的需要。²⁶

阿圖塞 (Louis Althusser) 在《列寧和哲學》(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一書中也曾主張，「意識形態」會透過呼喚主體 (interpellation of the subject) 的方式，讓主體誤將其處境和身分，想像成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因此阿圖塞認為「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想像的扭曲，使個人將其在社會中的論述位置，想像成一種真實的關係，同時也藉由家庭、學校、教會、媒體和工會，形成「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制」(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²⁷

這裡提到的不管家庭、學校、教會、媒體或工會，都是一種社會裡的制度，也正是所謂「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制」，統治階級透過了各種的制度運用，並確保多數人相信這些制度，把一切不同的個人意識皆排除在外，好進而強化其在統治上的合法性與正確性。例如媒體大肆宣傳符合主流的價值觀，建構出一個被過

²⁶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139。

²⁷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 年初版)，頁 137。

濾、挑選後的所謂「真實世界」。還有透過教育體制訓練學生服從權威、跟隨主流，向學生灌輸隱含霸權的意識形態，並把各種規矩視為理所當然，不容挑戰、懷疑。

這些制度都是用來鞏固整個國家機器，個體對社會的參與是一種想像關係的存在，體現於社會中各種制度內的活動，看似自覺自由，其實只是在無形中向統治階級給予的意識形態臣服。

通常，愈有能力掌握社會化和社會控制之管道者，也就是社會資源愈多者，其所提供之詮釋意義在社會中就愈有被採用而具正當化的可能。因此，從某個角度來看，社會互動其實只是不同行動者之詮釋意義被正當化的競爭過程，也是爭取意圖和認知正當化之優先權的鬭爭。²⁸

由於個體分處不同的社會階層，詮釋社會制度的能力也隨著擁有的資源多寡而有所差異，任何客觀化詮釋意義都是一種因其具有優先主導性，透過權威使之正當化而成為社會主流的價值觀，並由社會化和社會控制，強迫人們接受，並成為理所當然的認知。握有制度化主控權的人們，往往企圖使制度化滲透到每個個體的意識當中，同時也籠罩著日常生活的各面相。

社會秩序之所以可能是必須有賴一外於個體，且處於個體之上的一個「人工人」(artificial man) 實體來維持。……就西方而言，個人的自我解放只有透過對外在社會形式的合理形塑才可以保證的。因此，人類的問題不能僅靠個人修養來化解，而必須靠社會結構(尤指制度化的結構)來約制才可能處理的。²⁹

²⁸葉啟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90。

²⁹葉啟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16。

筆者以為在這所謂的「人工人」(artificial man)即是指「制度」,制度外於個體,且凌駕個體之上,並對個體具有強制力,以維持社會秩序。而所有個人的慾望、行爲、問題皆要依照著制度來發展、化解,並在各種制度下指導與調整個人在社會中的一切行爲,這樣的制度化使不同的個體符合不同的角色,並區分清楚、避免越界,最後再有系統的組織起來,形成整個社會體系,這也就是一種「外化結構觀」。

生活世界未必即等於制度化世界。……其基本原因在於：制度化本身的意義不是先驗而是後設的經驗表現。它始終因人的認知經驗、利益立場、權力大小、動機基礎、價值和信仰體系,乃至個人特質等等之不同而有差異,也因社會的變遷而不時地改變。雖說制度化的形式在一定時空範疇中常具穩定性,但它一直有孕生新意義之可能空間。³⁰

最初,制度化是對需求之滿足的一種認知設計。人們透過「嘗試——錯誤」的法則,於經驗累積之中,逐漸使行爲與社會關係定型化,制度由是產生。³¹但人們常因慣性而認為這些制度理所當然,最後制度化的世界往往會淪為一種僵化的形態。不過生活世界裡的個體是充滿變數,又有所差異性,所以當個體無法達到角色期待的要求,或者角色間有所衝突時,便會有抗拒制度的行爲出現,即便社會會有外在的控制機構來校正這些異常,但制度也還是有了變遷的可能性。

本論文將採「外緣研究」³²及「內緣研究」³³並行的方式。以「外緣研究」來探討影響侯文詠三本長篇小說的創作因素,像是他的生平與經歷,或者所處的社會環境給了他什麼影響?這個部分筆者對侯文詠做了第一手資料的訪談(在本

³⁰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77。

³¹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88。

³²「外緣研究」(Extrinsic Study),意指研究主題本身的外圍可能影響的因素作為研究因子。可稱作為「外在的研究」。

³³「內緣研究」(Intrinsic Study),意指研究主題本身之內的可能影響的研究因子。可稱作為「內在的研究」。

論文的附錄二)，並參考他許多具傳記性的散文，藉此認識作者寫作的原旨。最後整理出侯文詠的年表（在本論文的附錄一），進一步探知侯文詠的成長經歷與文學創作的彼此互動關係。這些都是前人做相關研究時所欠缺的。

而「內緣研究」則直接從文本中去探索侯文詠隱藏在作品背後的主體意識與創作主張為何？因為文本是以符號的方式，將現存社會中沒有真正現形、隱而不彰且未被再現的隱藏衝突，加以呈顯出來。³⁴

筆者將用一種「深度詮釋學」³⁵的方式，去分析侯文詠在小說中對體制的個人意識形態和文化意涵。並將故事性提昇到「動作媒」(agency)的層次，也就是人類如何產生行動、如何透過語言與抉擇以區隔自我和他人，並形成自己的道德責任。這整個道德抉擇與自我負責的過程，即是「agency」的真義。³⁶探討《白色巨塔》的蘇怡華、《危險心靈》的謝政傑，以及《靈魂擁抱》的俞培文是如何透過各種不同的抉擇來形構他們在體制中的自我。

本論文共分為六章。第壹章是緒論，主要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並針對當前相關研究侯文詠的文獻資料作出簡單分析，最後再交待研究的方法和範圍，並接著用三章來分別論述三本文本所展現出的體制中不同面向。

第貳章是從《白色巨塔》來探討醫院體制。其中要用拉岡理論說明體制與父權的關係，並以盧卡奇的批評理論中「整體性」與「典型」的概念解剖體制內的人際網絡，最後再藉由文本分析去歸納出其中的親情人性和醫院體制的弊端。

第參章是從《危險心靈》來探討教育體制。將以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學校教育中的強制性與知識價值的認定標準，接著把「功績主義」做一個反思考，去針對學校所強調的公平性提出反駁。最後由侯文詠「小題大作」的敘事手法，來說明在文本中的個人焦慮背後所隱藏的教育議題。

³⁴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3。

³⁵將作者所寫出的文本視為論述 (discourse)，找出社會、歷史與文化想像投射在文本中且尚未完成的深層意義，企圖解讀「文本中的烏托邦」或想像的現實，如何在另一個時空，透過重新的瞭解，還原當初的文本意義，利用同情的共鳴共感，將文本背後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意涵加以重新建構，這就是「深度詮釋學」所著重的面向。

³⁶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5。

第肆章是從《靈魂擁抱》來探討媒體體制。將以媒體評論者所說的「媒體的接近使用權」(the right to access to the media)和「議題設定」、「角色派定」來解構媒體，並指出其中共犯結構的關係。

在第貳、參、肆章的許多部分，仍屬於筆者主觀式的評論，以讀者閱讀感受的詮釋為主要分析的依據。

第伍章則將歸納、辨析侯文詠長篇小說作品的內在性，從而解讀小說人物、情節與主題思想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最後導出侯文詠長篇小說的主題性，進而理解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懷。再以第陸章做一總結。

第貳章 《白色巨塔》——醫院體制的探討

對於醫師這個職業，侯文詠曾提到醫學界有許多人相信：當一個醫生愈客觀、理性、無情、殘忍時，那隻看不見的手，就會讓病人獲得最大的利益。這樣的信念在當他還是年輕醫師時，曾經覺得不舒服或者試圖抗議過什麼，可是不知不覺，自己也漸漸變成這個理性的專業體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一個無情自私，只看到自己，卻看不到別人的醫療從業人員。³⁷筆者以為《白色巨塔》就是侯文詠在這樣的感受中發酵出來。

《白色巨塔》是侯文詠在1997年底辭去台大醫院工作後，所完成的第一本長篇小說。醫生這個職業在國內一直擁有崇高的地位，專業的知識和懸壺濟世的理想是他們最引以為傲的。但現在《白色巨塔》內卻上演著各種醜陋的個人利益鬥爭，忘記了身為醫生的使命為何？因為侯文詠本身就是醫界的一份子，聰明的他選擇了一個最熟悉的題材作為其長篇小說的處女作，以寫實的方式曝露出醫院中許多不為人知的事物。

書中的主要情節脈絡是在內科主任徐大明與外科主任唐國泰的權力鬥爭，兩人處心積慮的想坐上醫院院長寶座。為此無所不用其極、勾心鬥角，甚至於賄賂買通相關人士，彼此之間費盡心機的不斷打擊對方。此時總統愛女陳心愉因罹患急性白血症，必須進行手術，這件單純救命的事，卻成了兩方人馬的角力戰，並引發後續一連串的事件。徐大明屬意由他要提拔的蘇怡華醫師執刀，不料唐國泰卻利用職權變更手術，改由自己的人馬邱慶成來操刀，使得一樁單純的手術演變成政治事件，主角蘇怡華也因此捲入了醫院派系的鬥爭中。

而原本在人事鬥爭中保持中立的醫學院院長徐凱元，因為個人疏失造成病人死亡，迫使他不得不向唐國泰求援，希望透過麻醉科主任賴成旭向麻醉醫師關欣施壓，要她用錢來和病人家屬和解。關欣卻堅持她的醫學良知，冒著吃上官司的

³⁷侯文詠，《我的天才夢》（台北：皇冠，2002年初版），頁57—68。

風險，去說服家屬同意做病理解剖，好找到死因的真相，不要讓病人白白的犧牲。

蘇怡華與關欣兩人原本與這場人事鬥爭沒有直接關聯，過著與世無爭的日子，但是最後卻都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這場戰爭，而必須面臨一連串前途與良心的抉擇，這也正是人性的考驗。

本章將分為四節，第一節要以拉岡理論來探討《白色巨塔》中所呈現出父權體制的權力追逐；第二節再剖析這樣的權力互動中人際網絡的牽扯；第三節則要探討這樣的人際網絡中屬於親情人性的一面，看體制與親情的拔河；最後在第四節把書中所提及的醫院體制問題做歸納，並加以探究。

第一節 父權體制下的陽具崇拜

原本佛洛伊德是說女孩對自己沒有而男孩有的，如陰莖，產生了嫉妒與自卑。當代精神分析學者卻認為不論男女孩皆有此嫉羨：男女孩在出生後與母親共生依附後一段時間，後來發覺原來在他(她)與母親的母嬰二人共生關係外，竟有父親的存在，嬰孩認識到原來母嬰不是真正的一對，父母親才是一對，父親才是母親所愛，故男女孩開始嫉羨父親(男人/陽具)。當孩子在「鏡像期」之後，進入主體之間交流的象徵秩序，拉岡稱之為「父親之法則」(Law-of-the-Father)或「父親之名」(Name-of-the-Father)。

父親之名源自父親的、父權法則、父親的性質，是法律，是父權的語言，以陽具作為優位意符。拉岡以為，陽具之所以被選擇扮演這個角色，是因為「它是性交的真實」。小孩發現，母親的慾望是陽具，因此小孩依據「是陽具」和「有陽具」的區別，來發展他或她的性別關係位置。因為可能被閹割的威脅，迫使男童接受認同父親所代表的法則，進而建構出自己的性別主體，而所謂的「陽具權力」便由此產生。對拉岡而言，「陽具」僅是一個符徵，其所指向的是整個父權體系的符旨，因此男性是在主體性造就的過程中，認同了「陽具」是優勢位階的

看法，也據此認知了性別差異與陽具權力。³⁸

根據拉岡理論，「巨塔」正是象徵著陽具（Phallus），古代城市規劃中，擁有權力者喜歡在城市中央建造塔樓，除了可以察看遠方的敵情外，統治者可以在上面享受著監視子民的權力慾望。這也是陽具主宰者的視野角度，這樣的凝視角度，可以把它視為父親的視角，也就是一種父權的體制展現。

巨塔是陽具，是父親的符碼，父權是社會秩序的符碼。因此小說題目本身正隱喻著這是一個在父權體制下的故事。主要角色中除了女主角關欣最後跳脫以外，其餘參與這場醫院的人事鬥爭者，清一色是男性，他們都被迫在這父權體制下進行殘酷的權力爭奪。

而白色象徵著純潔、神聖，這原是人們對醫院的期望，但文本中赤裸的呈現出醫院體制內的不堪，像是輕忽醫療疏失、收受病人紅包、拿廠商回扣、職位的爭奪等等。在這裡，「白色」的意涵成了一種反諷。小說以台大醫院為背景，聚焦於醫院的重重黑幕。其實侯文詠沒有站在一個高道德的立場去批判什麼，他只是在還原體制內的本來面目。哥舒意在評論侯文詠這本書時說：

他可以描寫人物殘忍或寡廉鮮恥的一面，但同時也會把人後的苦衷和溫情帶過一筆。閱讀這部小說的時候，往往使人陷入與小說人物同樣的迷茫狀態裡。我們甚至可以理解小說裡的每一個人物，因為他們和我們一樣，所需要的其實不過是生存下去。而在現代社會裡的生存，是沒有什麼道德可言的。所以，我們沒有理由譴責別人。³⁹

所以小說中不論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都是種灰色地帶的人物塑造，也就是沒有所謂絕對的好壞之分。正因為世上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一

³⁸ 關於拉岡理論參自於迪倫·伊凡斯著；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台北：巨流，2009年初版）。

³⁹ 哥舒意，〈放下手術刀，立地成作家——談台灣超人氣作家侯文詠《白色巨塔》〉，《今日中國》第2期，2006年，頁67。

個人反映出的好壞往往關乎著當時的環境，也關於著某些命運的安排。在這種父權體制下，功成名就是男人唯一的價值體認，非但自身要求，周圍的人也如此要求著。

E.M. 蒞德爾在其《女性主義神學景觀》的著述中對父權制進行了分析，她引用的父權制的定義是一種結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父親就是家長。⁴⁰家國同構這種結構中，父權制是一種必然的結果。皇帝是一國之主宰，父親則是一家之主宰，父親就是家長，主宰著整個家庭，家長和家庭成員的關係是支配和被支配、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清律輯注》中說：「蓋家統一尊，祖在則祖為家長，父在則父為家長。若祖、父不在而祖母與母應同為家長。」我們看到，當祖父在時，祖父是家長；祖父不在時，父親是家長；父親不在時，母親是家長，代行父權制下對子輩的權威。這個作為家長的父親對兒子來說，是「父，至尊也」，是「父為子綱」。

在這種父權體制下的男性人物，個個都追求著名利，以達到社會價值的認同，他們想要爬上巨塔的最頂端。不管是費盡心機，力求升等的陳寬醫師，或是為了院長寶座勾心鬥角的唐國泰和徐大明都是如此，就連蘇怡華和莊哲銘也都因為個人前途而必須放棄關欣，去娶自己不愛的女人。但追逐權力的最終，往往是更深的無奈感，就像蘇怡華雖然最後看似贏家，但心中卻無比的失落。所以在小說的結局寫到：

陽光亮麗地射進這座白色巨塔的頂端，也照映著辦公桌上的瑣瑣碎碎。他失魂落魄地環顧著整個外科主任的辦公室。這個曾經是老主任、唐國泰、邱慶成擁有過的房間——多少外科醫師一生夢寐以求的權力殿堂與象徵，現在完全屬於他的了。……

蘇怡華不知不覺地轉過身，被音樂鐘吸引了。他放下了手上的鈔票，楞楞

⁴⁰ E.M. 蒞德爾著；刁承俊譯，《女性主義神學景觀》（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初版），頁30。

地看著鐘罩內那對跳著舞的新人。音樂盒響著，新郎新娘在世界的頂端旋轉著，所有的生死、愛戀、權勢與榮辱就這樣不停地流轉著。他不明白，永遠跳脫不出這方透明玻璃鐘罩裡的幸福，為什麼總是吸引著那麼多想望的目光？……

「I am on the top of the world……」單調而輕快的旋律響著，那些在世界頂端的滋味，不知怎地，聽著聽著，竟變成了淒涼無比的感覺。

陽光有些刺眼。蘇怡華雙手掩面，終於不可自制地啜泣了起來。⁴¹

這樣的結局安排，讓人感受不到蘇怡華擁抱權力後的快樂，侯文詠巧妙的以玻璃罩的音樂盒和在頂端跳著舞的新人，來象徵著身在巨塔中的蘇怡華。那是個被罩住的世界，是被禁錮的牢籠，然而只有等到他爬到頂端後才了解到，站在頂端之上的那種刺眼和淒涼。⁴²但其實小說中，蘇怡華還算是相對其他人，比較無心於名利權勢的，只能說他被迫在一次次的權力鬥爭中表態，然後幸運的得到院長徐大明的賞識，最後順勢娶了院長的女兒，取得人人羨慕的地位與榮耀。筆者認為邱慶成的角色才是《白色巨塔》最具有企圖及野心的人，在他的言行中，深切體現了一種「占有滿足」觀⁴³。因此將以這人物來分析在巨塔內的人物所呈現出父權體制的權力追逐。

邱慶成是一個具有野心、狡猾的現實主義者。他懂得利用各種方式在醫院中求得生存，總是能看準情勢去做對自身最有利的事，唐國泰曾形容邱慶成「他的問題就是太聰明了。信不信由妳，將來第一個騎到頭上欺負我的人就是他。」（《白色巨塔》，頁 26）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果然印證了這句話。一開始他被唐國泰提拔，為了名利搶走蘇怡華替總統女兒主刀的手術，對自己高明的醫術是如此自信

⁴¹侯文詠，《白色巨塔》（台北：皇冠，1999年初版），頁 412—413。

⁴²陳筱涵，〈醫生作家侯文詠長篇小說《白色巨塔》創作基本要素研究〉，頁 108。

⁴³根據葉啟政在《制度化的社會邏輯》中所論述，這個觀點的基本論點是：凡人皆有慾望；同時，在可能的範圍內，慾望應當給予以最大的滿足。社會最主要的意義即在於提供最有利的條件來充實人們的慾望，保證並拓展慾望的滿足。因此，（正當的）占有社會資源成為人羣的評量一個人之存在意義的共同標準，也往往為個體所內化而接納成為人生觀。因此，這樣的存在基本上是以「有」為基礎，可以說是一種「存有」觀。

滿滿。但在手術後，卻發現總統女兒出現血管栓塞的問題時，他不顧他的老師唐國泰暴跳如雷，也要再動手術拆除原先裝的內植式中央靜脈輸液導管。當然這可以說是相信自己專業的判斷，選擇對病人最好的方式，但也可以解讀成是爲了怕自己的手術失敗，會惹禍上身，而不顧老師的院長升遷之路。

後來唐國泰中風、垮台，身爲學生的他馬上向贏得院長寶座的徐大明投誠，可說一點師生情誼也不顧。他爲了鞏固自己外科代理主任的勢力，好真除成爲正式的主任，對唐國泰的人馬可說是趕盡殺絕。他先拉攏一個不被唐國泰喜歡的外科總醫師，把開刀房中掛名唐國泰的手術都搶了過來。又用主任的權力和院長的協助，拿回受媒體關注的移植手術。最後，當麻醉科主任賴成旭推著唐國泰的輪椅要去和他理論時，邱慶成可說一點情面都不顧，顯示著在權力鬥爭所需要的那種冷酷無情。文本中描述當時的情景：

「我說過，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邱慶成試圖推開輪椅，卻遭到唐國泰以及賴成旭強烈的抵抗。

「你，禽，禽獸，豬……狗，不如。」唐國泰激動地叫嚷著。

邱慶成退後了一步，喘著氣說：

「讓開。」

「你，打……死，打死我啊！」

「我說最後一次了，讓開。否則不要怪我不客氣。」

唐國泰不但沒有絲毫退讓的意圖，反而更激烈地嚷著：

「我，白……白養，養，你……這條，狗了。」

邱慶成壓抑不住滿腔怒氣，使勁一推，連人帶輪椅，把賴成旭以及唐國泰推得四腳朝天，点滴瓶落在地上滾來滾去。唐國泰氣呼呼地倒在地上，仍然罵不絕口。

邱慶成的餘怒未消，目光掃視周遭，忿忿地說：

「誰敢過去扶他，不要怪我把他當成唐教授的人馬。」（《白色巨塔》，頁

在這場巨塔的權力爭戰中，邱慶成可說是一路過關斬將，終於鬥垮唐國泰的勢力，外科整個唐系人馬，簡直可說是樹倒猢猻散。而當邱慶成出席器官移植的記者會時，正是他擁抱權力的顛峰時刻，有一段生動的文字描述：

邱慶成就坐在徐大明隔壁，他已經換好他的領帶襯衫以及白色長袍。掌聲之中，他優雅地起身致意。鎂光燈閃閃發亮。邱慶成微笑著伸出雙手，客氣地邀請其他出席的主治醫師、護理人員站起來和他一起分享這一刻的榮耀。（《白色巨塔》，頁 286）

此刻的他可說是無比得意，以為自己贏得全面勝利，已坐穩外科主任的位置，甚至有一天可能取代徐大明的院長職位。另外，在面對唐系人馬賴成旭，邱慶成靠著與藥商的利益結合，取得他收回扣的證據，逼得賴成旭夫婦倆親自登門道歉求饒，邱慶成也是相當無情。文本中描述當時的情景：

「邱主任，」賴太太不自在地笑了笑，「賴成旭從緬甸來，很多我們這裡的規矩不知道，請你原諒……」

「賴主任，」邱慶成打斷賴太太的話，「你不是說要看看嗎，看我這個代理主任能代理多久……？」

「對不起……」賴成旭吞吞吐吐地說。

「今天如果換成是我站在你家客廳，你會不會放過我？」

「這是一點小小的意思，」賴太太緊緊張張地從手提紙袋裡拿出禮盒，放在桌上，「請邱主任收下來。」

邱慶成接過禮盒，撕開包裝紙，打開禮盒。他看了一眼，毫不客氣地把禮盒丟到地上，散落出成捆的千元鈔票，以及在地上滾動的水梨。

「賴主任，你每個月貪污了多少黑心錢？拿這幾個水梨以及小錢，就想打發我？」（《白色巨塔》，頁 293—294）

在權力鬥爭中，必須懂得要斬草除根，因為如果敵人沒有消失或完全投降臣服，那麼隨時就有被報復的可能性，於是只能想盡各種手段來殲滅對方，最好是置之於死地。邱慶成深諳這個道理，因此即使面對賴成旭夫婦最後跪下哭求，也顯得很冷漠，因為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爲了在醫院的前途著想，邱慶成必須要顧及自己在社會上的形象，所以當他知道外遇對象馬懿芬懷孕時，馬上選擇自私的要對方拿掉孩子。

「別孩子氣了，妳有沒有想過，妳真的把孩子生下來，我們之間怎麼辦？我們還要不要在一起？我們怎麼在一起？我們又憑什麼在一起？」（《白色巨塔》，頁 276）

邱慶成這話表面上是關心兩人能不能繼續在一起，但事實上是希望不要在這節骨眼上出差錯，斷送了他升爲正式主任的路。但他卻沒料想到如此的薄情寡意，也爲他埋下了紅包弊案的禍根。而且到了最後，他才驚覺自己只是院長徐大明的一顆棋子，根本不可能真除成爲正式的主任，一切的努力都只是在爲徐大明心目中將來的乘龍快婿——蘇怡華鋪路，替他鏟除掉在外科的一些障礙。最終紅包弊案讓他差點落得連主治醫師跟教授的資格都沒有。

邱慶成在勸說爭取關欣接任麻醉科主任以便壯大自己聲勢時，曾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誰何嘗不跟妳一樣呢？但現實的問題是：如果妳不踩著別人的頭往上爬，就算妳不想影響別人，還是會有別人來踩妳的頭。結果，每個人只好拚命地往上爬，不管踩著的是別人的頭還是什麼。只有爬到最頂點的人，才有

資格要求別人配合妳，不要影響妳。(《白色巨塔》，頁 263)

這段話可以說是邱慶成的人生哲學，他永遠只在乎自己在體制內能不能邁向成功，爲了達成目標，可以不擇手段，就算踩著別人的頭往上爬也無所謂，「犧牲別人，成全自己」正是體制內爲了求生存的一種偏差價值觀。

人活動的目的是求生存，在體制內人與人彼此之間有不同的關係存在著，這樣的互動以依賴及合作爲主，但也不能排除有一部分是衝突及鬥爭。每個人在本位主義下，爲了自身利益而有所互動，最後自然形成了一張張人際網絡，並且常常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接下來筆者將解剖這樣的人際網絡。

第二節 人際網絡的牽扯

在寫實主義大師盧卡奇的批評理論中有「整體性」與「典型」這兩個重要概念。呂正惠爲盧卡奇《現實主義論》撰寫導言，他說：

社會是由個人的利害關係網所組成，而不是一個散漫的毫無秩序的龐大體積，……文學要透過個人的行動，把那個複雜的利害關係網呈現出來，讓人看到社會的「真相」，看到促使社會轉動的是什麼力量。那個利害關係網（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經濟關係與階級關係），就是「整體性」；透過他的行動而使社會關係網呈現出來的那個人，就是「典型」。因此可以看出，「典型」與「整體性」是相互關連的。有了「典型」、「整體性」才能夠突顯出來；而「典型」之所以被稱為「典型」，就因為他的行為可以突顯出「整體性」來。⁴⁴

⁴⁴呂正惠著〈導言〉，收入於盧卡奇著《現實主義論》（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 初版），頁 6。

在《白色巨塔》裡，醫院中各種等級的職位是一種階級關係，而醫師和病人之間也存有一種隱然的階級關係；加上醫師和病人、藥商所產生的經濟關係，這些種種交織出的複雜利害關係網就是上述的「整體性」。而小說中的主角蘇怡華自然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以他為中心，延伸出許多和其他人物的互動，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社會關係網。因為「社會關係」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唯有靠人和人之間的互動行為，才能夠具體而全盤的呈現出來。筆者將藉由蘇怡華和其他角色所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去分析這些關係在體制下呈現的人性。

一、蘇怡華和徐大明

蘇怡華是外科醫師，他之所以會和內科部的徐大明主任產生關係，起因於徐大明希望蘇怡華能以他的專長「經皮膚穿刺內植式中央靜脈輸液管」替總統女兒陳心愉手術，好解決每次需要靜脈注射或抽血時，陳心愉總是呼天搶地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想藉此機會提拔蘇怡華，將來好成為他的乘龍快婿。但這個舉動卻激怒了外科主任唐國泰，並把蘇怡華視為徐大明的人馬。他深怕死對頭徐大明會因為治癒總統女兒有功，而順理成章的接任了醫院院長的位子。因此唐國泰利用職權變更手術，讓邱慶成搶了蘇怡華要替陳心愉動的手術。

從這裡可以看出在人際關係中的微妙之處，就是縱使你無心參戰，卻常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別人的戰爭」，並被迫在權力鬥爭中表態，一定要挑邊站。就因為徐大明的牽連，無端讓蘇怡華產生了唐國泰、邱慶成這兩個敵人。其實在任何職場中都有所謂派系與鬥爭，而派系間進行鬥爭時，人際的拉攏和攻訐是必經的歷程，彼此互相利用。蘇怡華雖是外科醫師，卻被內科的徐大明所拉攏，而邱慶成表面風光地替總統女兒手術，實際上只是唐國泰借刀殺人的一顆棋子。

唐主任指著蘇怡華的背影，「像這個，本事倒是有一些，麻煩的是不知天高地厚。將來一定會有人修理他。」（《白色巨塔》，頁 26）

這是唐國泰對蘇怡華的看法，也一語成讖，後來在陳心愉的手術這件事上，用邱慶成代替他教訓了蘇怡華。而當陳心愉手術後發燒，蘇怡華發現輸液管位置不當，很可能會引發血管栓塞的併發症，建議重新裝設。唐國泰卻不管醫學專業，再一次用話酸了他一頓：

「蘇怡華要是這台刀沒有開到很不甘心，沒問題。你要是覺得自己技術很好，那也很好。你可以把陳心愉推到開刀房，拔掉我裝進去的導管，再重裝一條你自己的。如果那樣讓你很開心的話，我沒有問題。我會用外科部的名義給你召開記者會，也會恭喜你這麼厲害，」唐國泰有氣無力地說著，
「只是你自己別忘記找個好理由去跟總統報告，我可不願意在這個會議上給你背書。」（《白色巨塔》，頁 69）

這些都起因於唐國泰認定同樣身為外科部的蘇怡華，卻背叛了他，倒向代表內科勢力的徐大明。當然被迫成為徐大明的人馬也並非全無好處。蘇怡華因此和總統有了接觸，並贏得總統女兒對他的好感。

「以後我胸前會不會有一個難看的疤？」

「這麼小，」蘇醫師右手拇指、食指比劃出了大約兩公分的距離，「而且我會儘量把傷口的位置拉低。」

「多低？」

蘇怡華靠近她的耳朵，「低到妳可以穿低胸晚禮服的程度。」（《白色巨塔》，頁 16）

蘇怡華以這段俏皮的對話，讓總統女兒卸下了心防，面對要進行的手術也比較放心，並使得冰冷的病房有了一些歡樂氣氛。總統看了自然也安心不少，降貴紆尊地再三拜託蘇怡華。

總統放開了蘇怡華的手，他拉著夫人過來，一起向他恭敬地鞠躬九十度。

「一切拜託你了。」總統說。

蘇醫師嚇了一跳，慌忙彎腰回禮。

「一切拜託你了。」夫人也複誦一遍。

在蘇醫師來不及抬起頭之前，總統夫婦一起又向他行了一次九十度的鞠躬禮。（《白色巨塔》，頁 17）

後來蘇怡華並沒有替陳心愉動手術，但已在總統心中留下不錯的印象。而徐大明表面上吃了唐國泰一記悶虧，但他也將計就計，不支持重新裝置陳心愉的輸液導管，他跟蘇怡華說了「補鍋法」⁴⁵的故事：

從前中國鄉下有專門幫人家修補鍋子的工匠。做飯的人把鍋子打破了，請鍋匠來補。鍋匠一面用鐵片刮除鍋底的煤垢，一面趁主人不注意的時候，沿著裂痕把縫隙敲得更大。等煤垢刮除乾淨，主人驚見裂縫那麼大，感激地說：「今天要是沒有碰到你，這個鍋子不能用了。」等到鍋子補好了，主人高興，鍋匠也得到一個大紅包，皆大歡喜。（《白色巨塔》，頁 70）

果不其然，後來當總統知道唐國泰利用行政力量，搶走了蘇怡華的手術，才害得寶貝女兒陳心愉引起併發症，氣得決定要影響醫院院長的任命。因此，唐國泰眼看快要到手的「院長職位」就這麼飛了，承受不了刺激中風倒下，而徐大明也就順利登上了院長的寶座。接著徐大明又一路替蘇怡華鋪好路，先任命蘇怡華為外科副主任，再很有心機地讓邱慶成當外科的代理主任，好替蘇怡華鏟除掉一些唐國泰在外科的人馬。之後又利用紅包弊案的機會，讓邱慶成下台，使蘇怡華

⁴⁵ 李宗吾《厚黑學》中提及辦事二妙法：一為「鋸箭法」，另一為「補鍋法」。「補鍋法」是說鍋漏了，請鍋匠來補，鍋匠一邊修一邊偷偷把鍋裂痕敲大，然後再跟主人說這個裂痕因為被油蓋住了所以沒看見，主人就很高興多花錢把鍋再補好。

成爲正式的外科主任。

「我現在最關心的是禮拜三的派對，那時候你變成了外科主任，」他拍著蘇怡華的肩膀，「當作翠鳳的生日禮物，嗯？」（《白色巨塔》，頁 370）

徐大明這一切都是爲了他的女兒徐翠鳳，因爲徐翠鳳對蘇怡華情有獨鍾，正因爲這一點，使得蘇怡華幾乎不費力氣的就坐上了外科主任的位子。這也反應了「駙馬爺」的角色在有封建思想的體制內，依然是尊貴象徵的符碼，只不過是娶了院長千金，就能一步登天，擔任醫院裡的要角。而用盡心機的邱慶成，從頭到尾都只是被人利用的棋子，唐國泰、徐大明皆是如此對待他。

二、蘇怡華和關欣

蘇怡華和關欣是因爲同時參加了醫療服務性質的社團而相識，兩人一直保持一種曖昧的關係，但一直僅限於此。畢業後，關欣除了有一次去看在花蓮當兵的蘇怡華外，就再也沒碰面了，直到兩人又進到同一家醫院才又相遇，不過也只是像老朋友一般，沒有什麼特別。

當蘇怡華接到陳心愉的手術時，他特別拜託關欣來做手術麻醉，因爲在他心目中，關欣是最好的麻醉醫師。

「唉，」關欣歎了一口氣，「你們外科也未免太現實了吧。平時有事找不到人，現在皇親國戚來了，大家搶著關照。」（《白色巨塔》，頁 34—35）

關欣認爲蘇怡華這樣的拜託有些多餘，甚至是趨炎附勢。因爲她對所負責麻醉的病人都一視同仁，認爲不該有依社會階級而產生差異性的醫療照護，這也正比較出在醫德方面，關欣是略高於蘇怡華的。

不過如此有從醫原則的關欣，卻意外陷入醫療糾紛，要真相而不願賠償了事

的她，結果就是遭到家屬拿著遺像、招魂幡以及白布條，披麻帶孝地跑去醫院大廳抗議，她的房子裡也被砸毀得慘不忍睹。這時蘇怡華的陪伴，成了她精神上最大的安慰，患難見真情，兩人往日的情愫又悄悄被點燃。但這斷舊情復燃卻考驗著兩人，因為感情永遠是參雜了許多主、客觀因素。

在關欣方面，她有一段不堪的過去。大六時，她因為姊姊的腫瘤開刀而認識了主治醫師莊銘哲，她爲了他懷孕，甚至墮胎，但莊銘哲終究娶了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兒，繼承了他岳父的大醫院。這段往事，讓關欣心裡一直有個陰影，也讓她認清了男人在面對愛情與自身前程有所衝突時的現實抉擇。

「當時我姊姊過世了，忽然間，我的世界整個崩潰了。你是我唯一抓得住，支持我活下去最重要的心情。你讓我知道，這個世界還有人在乎我，關心我……。我需要你就像一個病人需要吃藥一樣……」（《白色巨塔》，頁 384）

那時的關欣在愛情上受挫，親情上又失去了姊姊，人在此刻自然是最脆弱的，也最需要倚靠的。她選擇去花蓮，在感情上不道德的回頭找完全不知情的蘇怡華。不過她依舊過不了自己心裡的關卡，不管是當初或現在，甚至於未來。這裡呈現出一種社會對性別的歧視，男生如果在感情上有些什麼經歷，就被當成風流韻事，但同樣的情況套在女生身上，很可能被講成殘花敗柳。另外，此時蘇怡華受到醫院院長的女兒青睞，跟當初莊銘哲的情況如出一轍，她又怎能阻礙蘇怡華的大好前程呢？

「你花了多少時間才走到這裡，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你這輩子到底還剩下多少時間？你難道還不明白嗎？我們最美好的歲月過去了。我們早已承擔不起那麼美麗的夢了……」（《白色巨塔》，頁 385）

關欣的顧慮不是多餘的，男人的事業心一向比較重，難保蘇怡華將來不會後

悔跟外科主任的職位擦身而過，甚至回頭來怪關欣過往的種種。最後關欣毅然決然辭去了麻醉科的職務，遠離巨塔內的勾心鬥角，回到鄉下嫁給在當地開業的一個寬厚老實的醫師。這裡也顯示女性往往較男性安於平凡的幸福，而不眷戀權力。

愛情終究是敵不過現實的，雖然蘇怡華聽了陳寬在面對死亡時的感慨：「認為自己的人生當初應該勇敢地追求自己內心的渴望」，這句話讓他鼓起勇氣向關欣求婚，說不管任何代價，會一直等到她答應。但最後的蘇怡華還是順勢娶了院長的女兒，當上了外科主任。筆者以為關欣代表了理想，徐翠鳳代表著現實，最後的蘇怡華是向現實妥協的。

就像當初邱慶成想找關欣當麻醉科主任，好接替唐國泰的人馬賴成旭。蘇怡華認為關欣是被利用，加上擔心她被牽扯進邱慶成的複雜男女關係，所以持反對意見。但關欣卻有一種不被信任與傷害的感覺。在對蘇怡華大吼後，她對蘇怡華說：「我選擇做我該做的事，而你總是別無選擇……」（《白色巨塔》，頁 267）這話說得很透徹，蘇怡華常以別無選擇去掩飾自身的各種真正欲望。他明明可以等待關欣回心轉意，甚至主動去鄉下找她，但巨塔裡的權力實在太誘人，他背棄了諾言，這也是別無選擇嗎？

三、蘇怡華和陳寬

一開始陳寬把蘇怡華當成政治盟友，希望兩人能在醫院裡的派系鬥爭中，能並肩作戰，為自己而戰，而不要淪為別人的棋子，莫名其妙地掉到別人的戰爭裡。陳寬曾對蘇怡華分析著醫院裡的情勢：

你每天處在這些戰局裡，可是你從來不曾仔細地想一想，像個隨風擺盪的浮萍。你的位置愈爬愈高，可是你卻像個孤魂野鬼似的，在科裡面連一個可以倚賴的朋友都沒有。（《白色巨塔》，頁 115）

在陳寬的想法中，兄弟、舊識，甚至朋友關係都是薄弱的，只有政治利害值

得真正倚賴，如果不搞派系，派系就會搞你。陳寬曾表面上好心的以匿名電子郵件提醒蘇怡華「陳心愉手術有重大變化，速連絡關欣醫師」，但事實上他也只是想利用蘇怡華在副教授的升等上幫他一臂之力。

陳寬的父親陳庭爲了兒子的副教授升等，特別請了關教授和蘇怡華喝花酒，加上以大股東的身份，特別替邱慶成提高了在康和醫院兼差的分紅，想以這三票確保過半的升等投票結果。老奸巨猾的陳庭知道蘇怡華總有一天會當上外科主任，還趁蘇怡華在接受性招待時，偷拍下照片，好做爲將來的籌碼。最後「在笑聲中，蘇怡華眯著眼睛看這對父子，他覺得有點茫然。不曉得爲什麼，剛剛大夥在一起喝了那麼多酒，而他們卻還是那麼地清醒」（《白色巨塔》，頁 162）這對父子用盡心機，涉世未深的蘇怡華卻完全不知已經被設計了。這事直到陳寬罹患胃癌後，才全盤托出。

但人算不如天算，最後邱慶成竟意外睡過頭，錯過了教師升等評議會議。而和陳庭有過節的唐國泰又強烈抵制陳寬的升等，膽小怕事的關教授不敢得罪主流，結果只有蘇怡華一個人舉贊成票，這裡也看出他重義氣、不知天高地厚的一面。陳庭認爲邱慶成是唐國泰的人馬，拿了好處又搞這一套，氣得誓死要給他好看，因此埋下了邱慶成後來因紅包弊案下台的種子。

升等失利的陳寬，後來又遭逢人生巨變，發現自己得了胃部的惡性腫瘤。無助的他第一個想到求助的對象就是蘇怡華。

陳寬激動地轉過身來擁抱蘇怡華，「我的生命拜託你了。」（《白色巨塔》，頁 316）

面對生命的衝擊，陳寬漸漸有了不同的人生態度，重新思考友誼的價值，把心房敞開，真正開誠布公的對待蘇怡華，彼此再也不是利益關係的來往。

這些以蘇怡華爲主發展的人際關係並非一條條平行線，而是彼此有許多交集的，可用其中任何一個人物爲中心，再呈現出一張人際網絡。以邱慶成爲例，他

和徐大明的關係最早是搶了總統女兒的手術的恩怨，在唐國泰垮台後，徐大明又老謀深算的收編了他，掃除在外科的障礙。關欣則一直和邱慶成有良好的互動，並在他陷入紅包弊案時，希望蘇怡華能幫忙遊說徐大明手下留情，讓他保留主治醫師和教授的職務。邱慶成同時也曾在陳寬父親的醫院兼差賺外快，並影響了陳寬的升等。

還有，像是因為徐大明以提拔蘇怡華為手段，好促成女兒徐翠鳳的婚事，這直接影響了蘇怡華和關欣的感情發展。而關欣在答應邱慶成接下麻醉科主任一職時，又間接替徐大明根除了唐國泰的殘餘勢力。由此可知，在這體制內，基於許多因素，形成了密而繁複的人際網路，彼此依存。

第三節 體制與親情的拔河

在這醫院體制內充斥著許多權力鬥爭、爾虞我詐，各種人性殘酷、醜陋的一面都展露無遺，即使是面對愛情也是如此不堪。但筆者卻發現，其中侯文詠唯有對親情的展現是最溫馨、純粹的，不管是總統、徐大明、邱慶成、陳庭，這些男性在扮演父親的角色時，都顯示出不同於平常的柔軟一面。

一、總統

總統只有一個寶貝女兒，卻是急性白血病患者。整個醫院的總統醫療團隊無不上緊發條、戰戰兢兢，深怕會出任何差錯。總統的女兒也很清楚這點，所以不希望因為自己第一千金的身份，或總統進出醫院太頻繁，而搞得大家緊張兮兮。

「哎呀，爸爸你不是答應我要去上班嗎？」一發現總統和夫人也走進來，心愉嬌嗔地嚷著，「原來你還在這裡，弄得大家緊張兮兮的。」

「好，好，等蘇醫師看過，我馬上就走。」總統有點招架不住似地退後一

步。(《白色巨塔》，頁 15)

從這段對話裡，完全看不出一個總統的威嚴，只看到一個對女兒毫無招架之力的平凡父親。心愉原本就是唯一的掌上明珠，總統平常必定寵愛有加，如今還是臥病在床，做為父親的怎敢違逆她的意思呢？無怪乎有人說：「女兒是父親上輩子的情人」，想來也只有女兒能永遠對父親保有那份嬌縱吧！

「怎麼樣？我的大小姐？」總統問心愉，「明天就請蘇醫師幫妳手術，這樣安排，妳還滿意嗎？」(《白色巨塔》，頁 16)

總統就連安排蘇怡華為心愉動刀，還要經過請示，雖然是半開玩笑，但父親的寵愛可見一斑。身為一國的總統，擁有最大的權力，卻不得不在女兒面前投誠「裝小」，這裡許多看似父親的讓步，其實正隱含著父親對女兒難以言喻的疼愛。

總統過來拉著蘇怡華的一隻手，他說：「蘇醫師，你知道我們就這一個女兒，她是我們的開心果，這是她第一次開刀，不瞞你說，內人和我急得不曉得該怎麼辦才好？」(《白色巨塔》，頁 17)

身為總統，原本應該是站在最崇高的位置，此刻卻因為擔心女兒的病情，而誠懇地拜託著首度碰面的年輕醫生，拋開政治人物慣有的城府，表達出內心的極度惶恐、不安，沒有絲毫總統該有的威嚴。這種反差，讓人深刻體會到父愛的真摯，也印證了孩子永遠是父母生命中最沉重也是最甜蜜的負荷。

總統單獨地坐在床前，看著心愉。午後的陽光斜斜地從十五樓的窗戶映射進來，陳心愉躺在病床上，輕輕地翻了一個身。總統起身幫心愉把手臂放入棉被中。他忽然感覺到經過化學治療後，她的手臂是變得如此的羸弱。

看著孩子天真的臉龐，想起即將加諸於她的化學治療，痛苦的折磨，總統忽然覺得無比的內疚。

他從來不是一個好爸爸。（《白色巨塔》，頁 71）

當年他因為政治的關係入獄，女兒是他坐牢時的唯一牽掛與心靈的依靠。在獄中他會不斷夢到以前孩子發高燒、痙攣，卻沒有醫院肯收的畫面，驚醒後暗自啜泣，因為孩子是他心中最軟弱的部分。如今他雖然貴為總統，身份改變了，但面對女兒的病卻依舊感到無助，再累積之前的種種虧欠，使得他更加內疚了。這也是身為政治人物的無奈，永遠都要把「公」放在「私」前面，甚至於是犧牲家庭生活。但現在看到女兒因為化療後的瘦弱手臂，觸動了內心的不捨，他不再是為國為民的總統，而只是個心疼女兒的父親，角色的轉換乃一種親情使然。

「王主任，你聽好，」總統語氣嚴肅地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不管我在忙什麼，醫院的狀況我要你隨時向我報告。我不只是國家的總統，同時也是心愉的爸爸。如果你再自作主張不告訴我狀況，這件事我請別人來做。我這樣說，你懂嗎？」（《白色巨塔》，頁 199—200）

手術出了問題，心愉的病情惡化，甚至還需要插上氣管內管，以呼吸器來輔助呼吸。而總統府辦公室主任王世堅卻因為擔心總統要在國民大會做國情咨文的報告，竟然沒有第一時間通知，總統自然十分震怒。從政以來，他自覺在身為父親的角色上，缺席已久，如今心愉病情加重，讓他強烈感受到做父親的責任，當然會拋開一切，只希望換回女兒的健康，此刻任何國家大事也比不上心愉來得重要，因此才會對王世堅說出如此重的話。

二、邱慶成

邱慶成雖然在婚姻中對妻子不忠，但在父親角色的扮演上可說是盡心盡力。

我的爸爸是一個醫生。每天他為了救人都要去醫院上班。他的工作很忙碌，常常忙到三更半夜，我在睡覺時才回家。早上我去上學時，他還在睡覺。媽媽說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辛苦的爸爸，我希望他不要這麼辛苦。我愛我的爸爸，我長大了一定要好好孝順他。（《白色巨塔》，頁 92）

邱慶成偶然看到國小一年級的女兒，在稿紙上以注音國字交雜，歪歪扭扭寫的作文，他內心百感交集。在女兒的心目中，他是一個好爸爸、好醫生，但邱慶成自己卻很清楚，許多時候所謂忙到三更半夜，只是去跟外遇對象馬懿芬幽會時的藉口。而在醫院的救人工作也沒想像中那麼崇高偉大，背後往往夾雜著許多名利的追求。面對外人，甚至是妻子，他都不覺得有什麼好慚愧，但唯獨看到女兒作文裡的童言童語，再對照那個完美的父親形象，不由得自慚形穢。

當邱慶成陷入紅包弊案時，新聞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著，女兒心目中的那個完美父親的形象頓時毀滅。

小敏背著他，坐在書桌前啜泣著。邱慶成走近，發現她的作業簿都被淚水沾濕了。

「爸爸，」小敏聽見腳步聲轉過身來問，「電視說的是真的嗎？」

「傻孩子，」他把小孩抱起來，「那是有人要陷害爸爸，爸爸不怕，小敏也不怕……」（《白色巨塔》，頁 331）

由此可知身為父親的邱慶成，不管什麼情況之下，永遠在意孩子對自己的看法，不願意因自身的負面新聞，而讓小孩蒙羞，也因此他才沒有以辭職來逃離風暴，怕這樣變相的默認會帶給小敏不好的影響。同理可知，到最後他之所以沒有選擇懷孕了的馬懿芬，女兒可說佔了很大的原因。有一段描寫到邱慶成在歷經紅包案、婚姻危機後，帶著全家去遊樂園玩的景象：他一手抱起已經爬到他身上去

的小敏，伸出另一隻手去牽著妻子美茜。這裡象徵著他終究是回歸了家庭，要給小敏最完整的愛。

三、徐大明

蘇怡華被徐大明視為理想的女婿人選，所以在徐大明任職院長後，刻意單獨邀請他來家裡用餐，只為了讓女兒能在自然情形下和蘇怡華相識。為此，堂堂一個院長還穿著圍裙親自下廚，一切只為了寶貝女兒的幸福。在用餐時，徐翠鳳發現蒲燒沒有放檸檬，馬上眉心緊蹙，一雙眼睛巴答巴答地望著徐大明。母親糾正徐翠鳳，她仍翹著嘴、耍性子，把那種任性的千金小姐脾氣發揮到了極至。想不到徐大明不但對女兒的無理取鬧沒生氣，還自己特別出門去買幾顆檸檬。

才幾秒鐘以前，那個深思熟慮的權謀家不曉得消失到哪裡去了，現在只剩下一個有求必應的老爸爸，慈祥和藹地消失在門的那一端。（《白色巨塔》，頁 238）

目睹這一切過程的蘇怡華當然是大吃一驚，因為他和徐大明之前的接觸都僅只在工作上，而當初在醫院的徐大明是個有威嚴的內科主任，更是能跟唐國泰爭院長的狠角色。對比於他現在變成被女兒使喚的慈父，還沒有當父親經驗的蘇怡華自然會感到詫異，而無法理解。當天晚上，蘇怡華和徐翠鳳還被半強迫地單獨約會，到了一點多的深夜，蘇怡華送徐翠鳳回到她家時，徐大明還穿著睡衣迎接女兒，這裡又再一次刻劃出徐大明寵愛女兒的形象。

還有一次徐翠鳳在拇指山山頂要鬧自殺，蘇怡華趕緊通知徐大明，兩人一起趕去，但徐大明年紀大，爬到一半已是一手扶著欄杆、一手捧著胸口，氣喘噓噓，最後只能拜託蘇怡華一個人去山頂救他女兒。

不知怎地，他的那種眼神讓蘇怡華難以忘懷。那裡面並沒有一個深謀遠慮

的院長，或者是學識淵博的內科教授。那只是一個上了年紀矮矮胖胖的男人，焦慮又無力的眼神。（《白色巨塔》，頁 303—304）

這裡又再一次透過蘇怡華的眼睛，來看老謀深算的徐大明的另一面。不管是多崇高的地位、多淵博的學識，在面對女兒有生命危險時，徐大明此刻也只能焦慮又無力。後來發現女兒只聽蘇怡華的話，甚至還說出「蘇醫師，我這輩子從來沒有求過別人……」（《白色巨塔》，頁 308）的話，只爲了拜託蘇怡華能帶徐翠鳳出去走走、散散心。一個能在醫院權力鬥爭裡獲勝的徐大明，卻獨獨對女兒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低聲下氣地去求任何能讓徐翠鳳開心的人。所以到最後，他會把蘇怡華提拔到外科主任，當成女兒的生日禮物，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四、陳庭

陳庭、陳寬這對父子一向很有城府，爲達目的不擇手段。雖然陳庭是個成功的開業醫師，賺了不少錢，但他卻希望同樣學醫的兒子，能往學術方面發展，最終可以當個醫學教授，好彌補他的缺憾。沒想到最後陳寬不但在副教授升等這一關失敗了，更意外發現自己得到了惡性腫瘤。他一直不敢把生病的事告訴陳庭，怕年邁的父親承受不了打擊，只好選擇在進開刀房的前一刻用信來告知。拿到信的前一刻，陳庭還在深思熟慮地計畫著要報復邱慶成的事，但下一秒看完了信，陳庭只覺得全身虛軟無力，側倒在車窗上喘著氣。（《白色巨塔》，頁 360）這樣的描寫，傳達了人算不如天算的嘲諷。不管是升等副教授或報復邱慶成，對陳庭都不重要了。

馬上趕去醫院探望兒子的陳庭，從蘇怡華那得知陳寬病情嚴重，生命拖不過三個月了。雖然身爲醫師，理當看慣生死，但面對自己的摯親，依舊無法承受打擊。

陳庭轉過身，失魂落魄地走向病人家屬等候區。

看著他的孤子的身影緩緩地走遠，蘇怡華不放心地追上前去，問他：

「陳醫師，你還好嗎？」

陳庭背對著蘇怡華，抬手擺了擺，頭也不回地說：

「我沒事……」才正說著，一個踉蹌沒有踩穩，整个人就昏厥了過去，癱倒在地。（《白色巨塔》，頁 362）

陳庭醒來後，血壓太低的他隨時都會再暈倒，但愛子心切的他堅持要去看手術後的兒子，最後只好坐上輪椅由蘇怡華推他去恢復室探望陳寬。但一到恢復室，他就努力從輪椅上站起來，只爲了不讓兒子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陳庭激動地掙脫蘇怡華的扶持，衝過去抓住陳寬的手，嘟囔著：

「爸爸來了。」

「爸爸，」陳寬努力地說，「對……不起。」

「手術很順利，」陳庭撫著陳寬的頭髮，「一切都很順利……」

「對不起，爸爸……」

「什麼都不要說……」

儘管陳庭強作鎮定，可是仍忍不住情緒，臉上老淚縱橫。（《白色巨塔》，頁 364）

在這一刻，陳庭、陳寬不再是那對成天只想著爭權奪利的父子檔了，生命的無常重重震撼著他們。陳庭現在只想要守護著兒子，他故作堅強，那是出於一種父愛的本能，要做孩子永遠的靠山。儘管自欺欺人，也要說手術順利，好讓兒子不要擔心、害怕。

不管是總統、邱慶成、徐大明或是陳庭，他們在金錢與權力鬥爭的體制裡爾虞我詐、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但是一旦和親情有所抵觸的時候，究竟會放下哪一邊呢？侯文詠給的答案顯而易見，人性的善惡美醜，他用權力的放大鏡一一檢

視，在文本中所流露出的親情確實可貴無價，由此看來侯文詠在潛意識中仍是儒者寬恕之道。不過親情終究不是人性的全部，筆者認為侯文詠不是一個性善論者，因為在文本中他同時點出了更多醫院體制內存在的醜陋不堪，而這都是人性的不同面向，也是下一節將要論述的主軸。

第四節 白色巨塔內的陰暗

在《白色巨塔》中，侯文詠以曾經是當局者的身份，暴露了許多在醫院這個體制內許多不為人知的陰暗面，像是醫藥勾結、醫療糾紛、紅包弊案等。雖然這不是一本揭發隱私的真相小說，沒有所謂的對號入座，但侯文詠巧妙而適當地將某些人物、遭遇和過程加以戲劇化，相當程度的反應出台灣醫學界的現實狀態。

一、醫藥勾結

藥品要靠醫院「消化」，所以，醫院對藥品的價格具有獨特的壟斷性或隨意性，而且即使藥品價格定得再高，病人也不會在治病的過程中去討價還價。所以醫藥的業務們，爲了爭取醫院這個賣藥大戶，就要不惜一切手段，打通醫院裡的大小關節，而給回扣便是最好的方法。

「你們不是有什麼超短效的肌肉鬆弛劑嗎？貴得要死，你還拜託我一定要在藥事委員會通過，我幫你們說話了，我也不曉得你拿了多少好處，現在進藥通過，你給我麻成這樣，我一點好處都沒有。」（《白色巨塔》，頁 19）

唐國泰在抱怨麻醉科主任的這段話，正點出了藥品回扣和賄賂醫師這個醫院內的陋習。藥商先要和有建議用藥權的醫師打好關係，再由他提出用藥申請，然

後在醫院專事批准進藥的藥事委員會⁴⁶上提出，而藥事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也就成爲要買通的對象了。唐國泰是外科主任，在醫院有相當的權力，想當然耳也成爲藥商賄賂的主要對象，因此才會有土城深耕醫院季院長帶著健輝藥品的總經理來拜訪唐國泰的情節安排。

「我們主要代理一些美國原廠的抗生素以及醫療器材。」方總經理補充說明，「以後要拜託唐主任多多關照。」（《白色巨塔》，頁 39）

當然，光口頭上的拜託是不夠的，錢才是關鍵。於是季院長遞給唐國泰一包牛皮紙袋，表面上是希望仰賴唐國泰的學術聲望來號召北區醫師公會舉辦的學術演講以及年會，但實際上就是行賄。

「都是自己人嘛，何必要這麼客氣呢？」那包牛皮紙袋非常厚實。唐國泰打開封口看了一眼，裡面是一紮一紮捆好的千元大鈔。

「唐主任若能答應是我們莫大的榮幸，」季院長笑著說，「這點心意是應該的，還希望唐主任不要嫌棄。」（《白色巨塔》，頁 40）

當唐國泰看到厚厚、成捆的千元大鈔，馬上說出「都是自己人」的話，果真印證了「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句俗諺。而事實上，除了藥商有所求之外，季院長也是想要唐國泰支持他爭取理事長的連任，因爲唐國泰的外科部門有五十四票，再加上各區域醫院主任都是他的學生，最少有一百票的影響力。

「現在的學生哪會那麼乖聽話？你們高估我了，我可沒有那麼厲害。」唐國泰爽朗地笑開。他緩緩地把手上的牛皮紙袋放到桌上，「不過我看面相

⁴⁶根據行政院衛生署醫院藥事委員會組織要點，醫院藥事委員會[簡稱爲藥委會(Pharmacy & Therapeutics Committee)]，主要任務是新藥引進與藥品異動之審核、用藥政策之檢討與建議等。

向來很準，季院長你不用擔心，我看你這個面相，今年保證絕對會當選連任。我說得不準，你回來找我。」

「有唐主任這麼金口一開，」方總經理雙手作揖，「我先恭喜季理事長了。」

（《白色巨塔》，頁 41）

權力往往會帶來金錢，唐國泰因為擁有外科主任的權力，自然會有人送錢上門來，他也很有把握地向季院長對連任的事打包票。果然後來在外科全科討論會的結尾，總醫師就奉唐主任命令，宣布今年北區醫學會年會，由科內統一替大家報名，並補助每位醫師一千元年費，但要大家把理事長選舉委託書交出來，由唐主任慎重地替大家作最好的選擇。唐國泰這些行為正是示範了如何操作權力和金錢的遊戲。

由於地區公會或是地區醫院，不管在衛生署的審核、學術、人力都要仰賴附設醫院，而北區醫師公會、深耕醫院擺明了是唐國泰的人馬，季院長自然不希望將來是徐大明接任附設醫院院長，因為那樣又要重新打通關係。為此，他和藥品商提供了一匹價值不菲的唐三彩馬，要唐國泰轉送給具有人事案關鍵權的醫學院院長徐凱元，而徐凱元的太太不久前才在拍賣會上競標這匹馬失利。這正是打所謂的夫人牌，想透過老婆去影響有權力的老公。

「俗語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季院長笑了笑，「這只是一個開始而已。如果你不能證明你的資源將來會是他的資源，憑什麼要他提名你呢？」（《白色巨塔》，頁 42）

季院長、藥商買通唐國泰，再由唐國泰去買通徐凱元，這就像一個食物鍊，彼此利用，並從中得到利益。書中還提到，院長盃網球場上有一個由熱心公益的藥商所發起響應募款救助非洲飢民的廣告，雖然那面牆的廣告效益有限，但許多教授及主治醫師在這裡打球，廣告又採取輪流的方式，所以大部分出錢的藥廠並

沒有什麼特別的怨言，這裡再一次明白顯示出醫師和藥商利益上微妙的關係。

院長徐凱元後來陷入醫療糾紛，他一直很擔心關欣會慫恿家屬讓病人接受病理解剖，讓事情變複雜，所以想透過唐國泰拜託麻醉科賴主任去勸關欣。唐國泰爲了爭取附設醫院院長，自然會幫徐凱元解決問題，於是就向建輝藥品籌賠償的錢。

「哪裡，唐主任不要客氣，我們做生意的人，就怕沒有花錢的地方，使不上力。我們千方百計送東西就怕對方不肯收，何況是他自己開口？」方總經理附到唐主任耳邊，「董事長特別交代，這段時間他準備了許多現金，隨時可以應急，只要有需要，你千萬不要客氣。」（《白色巨塔》，頁 140）

藥商有求必應的提供金援，當然是爲了將來更龐大的利益，如果能把唐國泰順利送上院長的寶座，就不用擔心醫院會不買他們的藥品了，這不正是替自己鋪好一條大財路？果然，爲了回報唐國泰，徐凱元提名了他，但最後的同意以及任命仍必須由校長來決定，所以建議唐國泰要幫忙校長籌募學校的經費，最後建輝藥品又出面捐了五百萬元。

天不從人願，藥商壓寶在唐國泰身上，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唐國泰中風失勢，被徐大明奪走院長的職位。藥商馬上見風轉舵，認爲邱慶成是徐大明面前的大紅人，因此極力拉攏和邱慶成的關係，想要能和新任命的院長搭上線。就這樣，一方面提供匯款單據，讓邱慶成抓住賴主任貪污的證據，好清除唐國泰在外科的剩餘勢力，一方面又送上大把的鈔票，這些最終都只爲了要和醫院的權力主流打好關係。這裡只看見藥商那種對利益的盤算，完全沒有任何道義可言。

後來，邱慶成爲了對付麻醉科的賴主任，抓到他的把柄，發現他沒有打 CVP（中央靜脈輸液管），卻謊報打了，再把這些沒用掉的 CVP 以折扣價賣回給廠商，當作新的耗材轉到醫院裡來。因爲 CVP 器材一套三千多塊，不同的廠商都希望能獨佔開刀房的市場，競爭太激烈，這是給各科主任的一種回饋。所以每個

月這家 CVP 廠商都匯入二十幾萬到五十幾萬不等的款項進入賴主任私人的戶頭。而關欣接任了麻醉科主任的位置，也馬上有醫療器材公司的人拜訪她，並承諾產品如果能進到麻醉科，將有百分之十的回饋，和邱慶成是一樣的比例。

「這是回扣囉？」關欣問。

「不是回扣……」張副總忙著解釋，「現在醫療市場相當競爭，因此總公司為了加強售後服務，特別編列了一些公關預算，關主任知道，這些預算是一定要花費的。花錢請人來做售後服務，總是不夠貼心、周到，因此……」

（《白色巨塔》，頁 317）

這裡一再顯現出醫藥勾結並不是特例，誰在醫院這體制內擁有權力，誰就有機會被賄賂、拿回扣。而藥商不管是直接送錢行賄，或是以各種巧妙手法給回扣，這些情節想必也只有身處過醫院體制的侯文詠，才可以如此鉅細靡遺的一一呈現。

二、醫療糾紛

長庚大學醫學系教授林萍章曾指出，他研究國內九十至九十四年，並以十五件法院判決確定醫師敗訴的醫療刑事案例計算，平均每三個月就有一名醫師被定罪，總計則有兩百多件醫療刑事案件，創下世界紀錄。林萍章表示，美國一百年來只有一例醫療刑事案件，日本五十年來僅十件，台灣則每年就有數百件；主因是台灣主張醫療糾紛視為「業務過失」，與很多國家視為「民事案件」不同。⁴⁷如此糾紛不斷，到底是醫生冤還是病患冤？在《白色巨塔》中，侯文詠也分別站在醫生、病患的角度去剖析這問題。

小說一開始就提及唐國泰曾為了爭取陳心愉的手術，以威脅的口吻提醒醫院的趙院長，現在的當家主播常憶如，當年在做早期乳房攝影時，醫院的 X 光科

⁴⁷ 〈世界第一 每 3 個月 1 醫師定醉〉，刊載於 2008 年 1 月 20 日，中國時報。

沒有判讀出來有乳癌，是他一手扛起來，幫忙隱瞞。由此可知，因為民眾普遍對醫學專業知識不足，所以除非鬧出人命，否則很難察覺醫師的疏失。接著又出現「朱慧瑛醫療疏失致死」事件，侯文詠在此著墨甚多，企圖以此來呈現不同的立場所看待的相同問題。

朱慧瑛進行子宮鏡手術發生意外，最後搶救無效時，幫忙急救的邱慶成馬上低聲地提醒麻醉科的主治醫師關欣：

妳最好趁現在把麻醉病歷重新整理一次，所有細節的地方都要再檢查一遍，有沒有醫療上應注意而未注意，或者處置不當的地方都要改過來。（《白色巨塔》，頁 58）

雖然邱慶成的反應是出於保護關欣，但也看出現階段的醫療環境不利於病人，一方面病人無法輕易取得病歷，即使取得也不見得完全真實⁴⁸，另一方面醫生寫的病歷洋洋灑灑，一堆英文專有名詞，大部分的人根本看不懂，萬一有不肖醫生使詐，病人也只能吃悶虧。加上醫院的醫護人員是同一陣線，因此在物證、人證方面，病人都討不到便宜。而院長徐凱元在處理的過程中，一直傾向能夠和解，因為萬一病理解剖結果是手術時應注意而未注意的疏忽，將構成法律上的過失致死。可以吊銷醫師執照，還得坐牢，更不用說院長、教授的職務。

因此院長秘書黃志雄認為由幾個醫師加上醫院，共同來分擔撫卹費用，是比較簡單的解決辦法。關欣卻不贊成賠償，她有些激動的說：「我自然有我的道義，但不是給錢。」（《白色巨塔》，頁 61）這裡顯示出她從醫的原則，就是要真相而不想只是花錢了事。她所堅持的態度，正和徐凱元的立場有了矛盾。院長一開始就以個人名義先致贈十萬元的慰問金，但隨後院長室接到一通電話，自稱是朱慧瑛的朋友，表示十萬元就打發一個醫療過失，特別是醫學院院長的醫療過失，未

⁴⁸ 根據醫療法規定，病人有「病歷摘要」的請求權，但「病歷摘要」並不同於「完整病歷」。因此醫院經常根據此法，拒絕給病人完整病歷。

免太容易了，進一步要求八百萬的賠償。院長秘書分析到：

如果一直強調病人死亡和手術息息相關，那就會是徐院長的問題。徐院長身為醫學院院長，承受了社會期望，不能犯錯，在談判上自然比較吃虧。但是如果把病患意外死亡暗示是麻醉意外所衍生出來，那麼徐院長將會有比較超然的立場，也比較使得上力量來解決問題。（《白色巨塔》，頁 90）

因此，他們希望關欣來承擔名義上的責任，而實質上的談判或賠償金都由徐院長來想辦法，並答應會照顧關欣將來在醫學院的升等。這裡看出在具有階級體制中發生問題時，一定是下面的人扛責任，長官絕對撇得一乾二淨。關欣不願這樣的陋習一再上演，即使是對方有利益上的交換，她也堅持說出自己的心聲：

我們這一行，只要盡了力，不管成功或失敗都問心無愧，畢竟醫生不是神。現在平白無故承認犯錯，就變成了過失殺人，哪怕賠了再多的錢，你還是過失殺人。從事醫療這個行業，如果心中沒有榮譽，那就不用做了。（《白色巨塔》，頁 95）

這段話正代表著關欣那種不畏強勢、捍衛醫德的態度，對於醫院體制自然是一股向上提升的力量。她在詢問律師自身的醫療糾紛時，提到了目前在台灣麻醉平均死亡率為十萬分之四，是美國的八倍，看似病人是在完全沒有保障之下，進入開刀房。但相對的，醫師也冒著失去執照、被判刑，或賠償巨額償金的危險，一樣沒有保障。這裡點出了一般人只羨慕醫師的社經地位，卻忽略從醫的風險大、壓力大，醫生的工作往往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精神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還得隨時準備應付醫療糾紛。因此事實上不僅需要在收入上尊重醫生，還需要在人格上尊重醫生。醫療糾紛時常發生，但很多問題的根源不在於醫生，而在於不合理的醫療體制。

但小說中也並非單方面替醫師抱不平。在醫療說明會時，朱慧瑛的丈夫——鄧念璋就說出了家屬普遍的心聲：

這個醫療說明會對我們實在太過專業了。你們老是圍著這些細節打轉，我們心情很沮喪，根本聽不進去。更好笑的是，從剛剛的報告聽起來，手術是成功了，可是，人為什麼會死了呢？難道說我們家屬還得向你們磕頭，說謝謝嗎？（《白色巨塔》，頁 103）

朱慧瑛的母親也說了：

我今天要來開會之前人家就告訴過我，醫學的道理非常複雜，如果醫師存心想騙我們，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就算不甘心去告醫師，醫療鑑定官官相護，我們一點機會也沒有。（《白色巨塔》，頁 106）

這些話都代表著很多民眾在醫療糾紛事件發生時，常會感覺自己對於醫療高度專業的敬畏感與信任感被破壞，而產生一種無助和無奈的心情。不過在關欣說明時的開場也講出了從事醫療工作者的心聲：

有時候我也懷疑，每次的默哀到底能挽回什麼？就像下一次，我同樣無法阻止死神從我手中奪走生命一樣。可是，是不是從此不要再從事醫療這個行業了呢？請原諒我用沈默浪費了大家的時間。這樣的默哀與其說是為了死去的病人，還不如說是為了我自己。默哀讓我體認到自己的無能以及感受死亡的哀痛。也唯有那樣，我才能繼續在這個行業奮鬥下去。（《白色巨塔》，頁 105）

醫生的工作和大眾的健康、生命息息相關，所以一開始就被賦予了神聖、崇

高的地位。但關欣的話說出了醫生永遠是無奈的，因為他們每天都有可能面臨著失敗，而這失敗往往攸關人命。層出不窮的醫療糾紛，往往造成醫生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在診療過程中保護自己，而保守治療或許對病人不利，但也是醫生現階段保護自己的無奈之舉。

在醫療糾紛處理過程中，病人或家屬往往得面對長時間、層層裁示的繁雜文件處理，卻始終無人與之對談的困境。而且就算有人出面處理，如果沒有特殊的身分地位，經常也無法與有決策權的人面對面的談。因此只好透過媒體的公布，來對醫師或醫院造成壓力，增加當事人談判籌碼。

於是鄧念瑋找了一群人拿著朱慧瑛似笑非笑的遺像、招魂幡以及白布條，披麻帶孝地跑到大廳示威抗議，白布條上用黑色的大字寫著「徐凱元草菅人命」、「關欣血債血還」，整個醫院大廳看起來像個靈堂，如此灑狗血的方式自然吸引了媒體的關注。他們還甚至跑到關欣的家裡，把客廳整個破壞的像浩劫餘生，到處是翻倒的桌椅、壁櫃、栽在地面上的電視機。滿地是破碎的玻璃以及壁櫃裡掉出來的飾物，浴室、廚房、臥室也慘不忍睹，連梳妝台上的大面鏡子也被人用紅色的唇膏大大地寫著「血債血還！」。這些動作都是為了對醫院、醫師施壓，以非理性卻極有效率的方式來討回公道。

但關欣還是希望家屬讓病人接受病理解剖，能知道問題所在，好在下次發生同樣的問題時可以避免這種災難，這也是教學醫院的責任。關欣跟朱媽媽說：

如果你們真的莫名其妙拿了賠償，讓這件事和稀泥草草了結，朱慧瑛才真正是平白無故地死了。沒有人曉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下一次，同樣的意外很可能會再發生。（《白色巨塔》，頁 150）

關欣堅持瞭解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好避免同樣的悲劇再度發生，畢竟人命關天，並不是金錢所能衡量。到後來病理解剖的結果是「空氣性肺動脈栓塞」，雖然院長秘書認為最後法院的醫療鑑定都跟附設醫院有合作關係，對院長徐凱元

有利，但徐凱元還是決定直接請律師寫和解書，答應鄧念瑋的八百萬賠償金。他嘆了一口氣說：「人在我的手上活生生地死了。你不是醫師，很難瞭解我的感受。」（《白色巨塔》，頁 191）由此可見他雖然一開始只想賠償了事，但最後面對自己醫療上的疏失還是有相當程度的良知，也再一次顯現從醫者的無奈感。

尤其當朱媽媽衝進門診室和徐凱元的對話，更是能讓人從醫師、家屬雙方的不同立場來看待這件事，各有各的苦處。

「醫師是一個令人內疚的行業。」徐凱元說，「它承受了太多不可能的期望。」

「我不想聽你抱怨醫生怎麼樣，我只想要你真正的感受。」

「如果我感到內疚，對妳的痛苦會有幫助嗎？」徐凱元問。

朱媽媽搖搖頭。

「我覺得累了，」徐凱元攤開雙手，「我只是個平凡的醫生，我不是神。不管妳決定要殺我、告我或者是要我賠償，如果會讓妳覺得舒服一點，我的內疚也許會少一點。」

沈默持續了一會。

「你說得容易，就算我殺了你，你賠償得再多，或者你受到法律制裁，我的痛苦能夠少一點嗎？」朱媽媽閉上眼睛，左右搖晃著頭，「這個孩子從小早產，我把她帶到這麼大，你們有沒有一個人問過我的感覺？有沒有一個人在乎過？」（《白色巨塔》，頁 210）

最後雙方終於能體會對方的心情，徐凱元激動地重複著說對不起，並把手搭上淚流滿面的朱媽媽，朱媽媽也伸出手去抓住他的手，彷彿經過了一生一世那麼久。侯文詠這樣情節的安排，正傳達出在醫療糾紛中，如果彼此能多一些同理心，也許就能解決在體制上的不足之處。

三、紅包弊案

醫療體系往往是龐大而複雜的，因此病患充滿了不確定與不安全的感覺，醫師好像變成能主宰你生或死的上帝。民眾心中不確定醫師會不會盡力照顧，只好靠送紅包來換取心安，希望醫師能對自己好一點，如果不送紅包總覺得不放心，擔心自己會受到差別待遇。另外爲了要指定大牌醫師開刀或獲得較好的診治，更想辦法走後門送紅包，以獲得較佳的待遇及診療。這種醫院的紅包文化是文化的關係，根植於社會文化脈絡的紅包文化，存在於台灣社會的不同體制中，例如向民代關說需要紅包，這種文化呈現了一種工具性的人情，以金錢上的私相授受來達成目的。因此除非改善醫病關係，否則要全面杜絕醫院的紅包文化是很困難的。

醫生收紅包的文化其來有自，從唐國泰年輕時，當老主任讓他獨立掛名開刀，可以單獨去訪視病人，他就開始收到大小爲數不等的紅包。到現在一大堆病人送的香腸、肉乾，常常都發霉了。還有滿櫃子的罐頭、洋酒，擺得沒地方擺。

所以當唐國泰垮台，邱慶成接任代理外科主任時，也開始發現他的辦公室出現了水果禮盒，裡面都有相同六萬六千元的紅包，這也就是外科主任公訂的紅包行情。而紅包上寫著病人的姓名、床號，正是希望醫生能多多關照。

如果你不明白請各個醫師開刀的紅包分別是什麼行情，只要去問醫院樓下水果店的老闆就知道了。（《白色巨塔》，頁 246）

這句玩笑話反映出醫師收紅包並非特例，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隨著醫生的職位不同，紅包的行情也有所差異。主任醫師通常是由學經歷完整或資深主治醫生來擔任，所以一般名氣都會較高，加上病人認爲他們看過多一點的病例，通常比較厲害，因此指定外科主任的手術往往最多，而這些手術可以拿到紅包又不用報稅，收入自然可觀。甚至於當邱慶成因爲被唐國泰的人馬抵制，無法調度麻醉科的人力，家屬還誤以爲是因爲沒給紅包，馬上把一個裝了錢的信封塞進他的上衣口袋，連忙鞠躬，怪自己太不周到了。

這樣的紅包文化行之有年，直到馬懿芬爲了報復邱慶成在情感上辜負了她，才以記者的身份揭發了他被病人指控醫療不當的事，以及收了六萬六千元的紅包。邱慶成的個人事件演變成整個醫院的紅包弊案，最後成了社會事件，而這種瘋狂的社會力一旦爆發或被挑起來是很難收拾的。新任的院長徐大明遭到波及，面對記者的質問，他也說出了醫生的心聲：

徐大明笑著解釋，「只是，公立醫院醫師的待遇和一般私立醫院比較起來，不但工作量大，薪水也低。他們往往都是最優秀的，也最辛苦。現在這個待遇的問題沒有解決，動不動就要拿醫德問題、司法問題扣帽子抓醫師收紅包，弄得醫師像逃犯似地，這……恐怕不太公平，也非病人之福。」

「徐院長，你這種說法社會大眾恐怕很難接受，你們的醫師就算收入再低，在社會上都還是屬於高所得……你這樣說只會引起更大的反感。」

「可是作為一個醫師，養成的時間比別人多，也比別人辛苦，這是不爭的事實……」

「你說哪個行業不辛苦呢？」

「問題是，你們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得到齊頭式的平等，這和法西斯主義有什麼兩樣？再說，這樣做，只會把醫生和病人關係弄得更緊張，立場更加對立……」（《白色巨塔》，337）

徐大明從醫師的立場去說明醫師會收紅包的原因，因爲按照經濟規律，成本高的產品，價格也應該比較高，因此讀醫學院七年，加上嚴格的醫生升遷制度，一個醫師所付出的金錢與時間成本遠高於其他行業，那麼收入也應該相對地多於其他行業。要有好的醫療品質，醫師的培養和鼓勵是必要的，但現在健保制度下，醫師收入普遍都有減少現象，造成把持不住的，就可能會做些收取紅包等不法圖利的事。

而邱慶成的老婆也替他深感不平，認爲他這輩子救了那麼多人，從來沒主動

開口跟病人要過紅包，即使病人不送紅包也照樣開刀，如果這些病人現在控訴邱慶成是那麼的理直氣壯，那麼當初他們卑躬屈膝、彎腰鞠躬送紅包來時，又是什麼樣的心態呢？（《白色巨塔》，頁 334）當初病人送紅包是爲了特權，想得到比別人更好的照顧，現在的控訴只因爲醫師沒有滿足他們的需求而要報復。這些理由也許都不夠充足，但正點出了醫院紅包文化內中的矛盾之處。

第參章 《危險心靈》——教育體制的探討

侯文詠在他第一部長篇小說中處理了最熟悉的醫院體制後，緊接著就把關懷的眼光投射在下一個體制——教育。侯文詠曾寫到：「三十年前我是一個國中生時，我覺得周遭有很多不合理事情，可是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國中生，一點能力都沒有。四十歲的時候，我變成了一個作家。因為不願意讓那個當時曾有的心情就這樣消失了，我決定作一點事情，於是我開始著手創造了謝政傑，以以及關於《危險心靈》的故事。」⁴⁹由此可見，教育體制一直是他很關心的議題，即使在求學路上無往不利，他依然對這樣的制度感到不合理。

從小到大，我們接受了不知多少大人給的獎勵與懲罰，這些獎勵與懲罰的背後正是某種價值標準的灌輸與規範，但是回過頭來看，到底是誰在制定這個價值標準呢？這個標準為何就一定代表著唯一、絕對的真理呢？學生到學校讀書，為的又是什麼？是學習生活中有用的知識，還是被訓練成爲了考試的機器？學校成了禁錮思想的監獄，從小學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就像十二年的監獄刑期。

《危險心靈》的故事發展是以一個國中三年級學生謝政傑爲主，他從一開始單純的學生生活，到因爲上課偷看漫畫而被處罰在教室外上課，這一切他原本早就習以爲常了，不曾有過任何質疑，但同學汝浩的媽媽看見後卻大吃一驚，趕緊通知了謝政傑的媽媽。事情的發展開始超出預期，最後一直演變成大批群眾上街頭抗議與政治操作、媒體介入，爭取再次教育改革。藉著文本中的情節、對話，從老師、學生、家長的不同角度去看待學校教育，引導讀者去進一步思考教育體制的問題。

侯文詠在他的官方網站〈內心話〉自述說：

⁴⁹侯文詠發表於公視留言板的文章〈我是侯文詠，危險心靈並沒有結束……〉
<http://tw.myblog.yahoo.com/tapu7269/article?mid=521&prev=557&next=481&l=f&fid=5&sc=1>

危險是相對的，就因為主角小傑的心靈很危險，因此他才會招惹出這些事，並且承擔這些事情。很多安全、乖乖牌的心靈只是默默承受，他們可能感覺不到這些承受的背後是多麼龐大，必須像小傑這樣具有危險心靈的挑釁才可能把背後這龐大的一切暴露出來。糟糕的是，構成背後這更龐大的一切，其實是更多更危險的心靈，包括父母、老師、政治人物等等，這已經是整個社會整體性的問題。⁵⁰

這段話點出了《危險心靈》中的「危險」其實指的正是教育體制的危險，文本中小傑的班導只不過是整個病態教育體制的代表而已。當大家都乖乖的、無意識的遵循著台灣現今教育的遊戲規則時，新聞媒體、教育部、學校、老師、家長、學生也都成爲了教育問題的共犯結構。

在文本中，侯文詠刻意安排了高偉琦、艾莉和一些中輟生一起幫助小傑，他們都不是乖乖牌，而是在台灣這樣教育體制中所認定的問題學生、「危險」份子。但諷刺的是，靠著他們在挑戰和質疑權威的過程中，卻意外形成一股企圖挑戰體制的紅線的力量，去勇敢反抗僵化的教育體制。

本章將分成四節，第一節要探討教育體制中的強制性；接著在第二節中說明這樣的強制性是涵蓋對知識價值的認定；第三節則剖析這樣的教育體制背後所強調的功績主義式平等是有其問題的；第四節則從文本中不同的個人焦慮去闡述教育這更大的公共議題。

第一節 教育體制的強制性

哈利斯說所謂的「義務教育」是向全體兒童提供的一系列（被國家）認爲是合乎理想的經歷。⁵¹全國的兒童、青少年在人生最重要的時期是交由他人安排，

⁵⁰ 參見侯文詠的官方網站 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aut_2_001.htm

⁵¹ 哈利斯著；唐宗清譯，《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台北：桂冠，1994年初版），頁122。

去做那些被規定好的事，他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個人喜不喜歡也不重要。義務學校教育就是兒童的人生第一課，它告訴兒童：他們必須把生活中最有價值的一部分交出來。⁵²這是孩子受法律控制的第一段經歷，而正好也是人生重要的性格養成期。

學校裡的課程同時具有強制性，由社會結構中的上層者來決定要學什麼，其中學生的能力或興趣一般是不予考慮的。除了知識、技能外，還包括反覆的灌輸孩子在社會關係中的規範、價值觀、習慣等……。因為這種學習是在老師監督關係下進行，所以往往學生喪失了對學習情境的控制能力，一旦沒有老師或不在課堂，學生就放棄了控制並組織自己的學習經歷的想法。這種概念漸漸的內化：別人最瞭解他們應該學習什麼。對學生而言，他們相對的是沒有價值和權力的，他們必須執行那些更有價值和「合法」權力的人的指令。哈利斯在《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說：

學校教育好比一個「精心設計的鐵路系統」，處於這個系統中的人們受到極嚴格的「訓練」去順軌道運行，以致他們寧可「停在鐵路上並在鐵軌上生鏽」也不越軌。⁵³

學校成了一種在教師監督之下學習強制性課程的機構，就像一條鐵路，學生只有遵循的份，絕不允許越軌的行為發生。因此才會出現像中輟生艾莉這種學生，她不喜歡讀那些無聊的國文、數學、理化……，也覺得學校電腦老師很混，根本學不到她想要的東西，但無奈的是就算學校教育的內容跟不上時代，一點也吸引不了學生，學校自己不檢討，反而把學生統統抓回去關在教室裡，強迫輔導，還要寫什麼記錄、報告。⁵⁴

張淑敏認為小傑和體制的衝突開啓了《危險心靈》的故事發展：

⁵²哈利斯，《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頁 122。

⁵³哈利斯，《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頁 124。

⁵⁴侯文詠，《危險心靈》，（台北：皇冠，2003年初版）頁 165。

「衝突」貫穿著整個故事情節，小傑的英雄旅程因「衝突」而展開，思想受到不同理念及想法的啟發，進而為生命開啓了另一個窗口，在沈痾難解的教育制度中反抗冒險，接受各式各樣不同的磨難試煉，啓程後他的生活重心將他從原先所認同的制度及熟知的社會隔離，轉到一個陌生及未知的領域。⁵⁵

《危險心靈》中的主角小傑，原本就是在這樣制度下接受教育的平凡國中生，一開始他並沒有想過挑戰這個體制，但意外的，因為導師一次處罰（在教室外面上課），引發一連串的對教育的衝擊。當班導在羞辱他之後，又拐彎抹角地羞辱他母親時，小傑忍無可忍的衝上去把班導推倒，並大叫著：「升學班就怎麼樣？好學校就怎麼樣？我不想被你處罰，不想被你控制……」（《危險心靈》，頁 56）從這一刻起，他開始對學校的強制性做出了反抗，如同侯文詠所說的：謝政傑在我的筆下，從一個主流教育價值的追隨者，變成了一個主流教育價值的懷疑者。⁵⁶文本中透過一個國中生的角度，去讓讀者省思教育體制中種種不合理的強制性。

這些教育問題設定於故事情節之中，小傑順著內心的召喚而反抗這樣的一言化教育制度，站出來說出了國中生心裏想說卻又不敢說的話，侯文詠將小傑這個想像人物置身於當代真實的環境氛圍中，讓他在想像的世界中去冒險，同時傳達作者對教育的理念，對目前的教育制度做一場想像式的抗爭。⁵⁷

當小傑在教妹妹數學的過程時，他發現所謂改革數學、改革課程，往往只是讓簡單的事變得複雜，使學生愈來愈討厭數學而已，但學生只有接受的份，因為這樣的教學改革具有一種強制性，不由得你不學。

⁵⁵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頁 53。

⁵⁶侯文詠，〈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台北：皇冠，2010 年初版）頁 229。

⁵⁷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頁 78。

「老師說我們學的是新數學，新數學比較厲害，不可以背九九乘法表。」

「什麼新數學？」我問。

「就是建構式的數學。」

「那妳算一次給我看，讓我們來看看妳的新數學有多厲害？」

她先把八加八得到十六，十六再加八得到二十五，二十五再加八就變成三十三了。

「實在太厲害了，」我說，「妳每次都要用這麼厲害的方法來算乘法？」

「老師說不這樣寫會扣分。」（《危險心靈》，頁 24）

「建構」本身的精神在於強調要讓學生自行建構數學的意義，但如果是依然用那種傳統強調「標準」的教法教學，不照著老師的唯一解法就扣分，那這就完全和建構式的精神相違背了。不管任何教學，都應採取開放的態度去激發學生的創意，好比一個數學題目出來，就該讓學生想出各種不同的可能演算方法，而不該強制性的侷限學生的思考模式或學習方法。

除此之外，學生接受教育的時間也有其強制性存在，不允許個別差異，或特殊情況，一律要在相同的年紀去學習相同的課程，教育成爲了一種特定時間的「義務」工作。

我們現在的規定強迫每個學生在六歲到十五歲期間一定要接受教育，可是並不是每個人的情況與條件都能符合。我覺得問題重點不是中輟，而是中輟以後不再有機會讀書了。你看，我們現在的這些規定，規定學生的修業年限，大家一定要在幾年內畢業，否則就要開除學籍……（《危險心靈》，頁 295）

在小傑的看法裡，教育制度不該強制去規定學習的年紀，因爲這是極不合理的做法。好比說每個孩子大腦成熟的時間是不一樣的，這與其先天基因有關。然

而，成熟晚並不代表笨，只代表時候未到。但如果不管頭腦開竅的快慢，就硬要相同年紀的學生去學習、理解一樣難度的課程，這對部份開竅慢的學生就是一種壓力，而過多的壓力只會讓孩子因恐懼而逃避學習，進而影響其學習成效。

另外，中輟也不是件絕對的壞事，如果能在這段時間去摸索個人的興趣，也有其意義所在。學習應該是一輩子的事，學校應該是永遠保持開放，讓不同年紀的人在工作一段時間後，等他需要知識時又可以隨時回來學習，這是一種主動式的學習。而不是像現在的情況，讀書好像只是年輕時候，不得不做的苦差事，等到取得文憑、找到工作，就不用再讀書似的。如此一來，讀書成了一种強制性，學生的學習變成被動的，這種情況演變成一進入像大學這樣較開放式的教學環境，學生就無所適從，或是「由你玩四年」。

而在學校裡還有具強制性的各種規範，學生在學校的一切都是被管理的，他們必須服從的是鐘聲，鐘聲決定何時上課、何時下課、何時吃中餐，一切都在規定好的作息時課表，根本不顧慮個人的差異性。活動被限定在不同的指定區域(操場、教室、走廊、實驗室)；服裝要穿制服，而且長、短袖是要按學校的換季規定，而非個人對氣溫的感受；頭髮也往往有所規範，不准染或燙，甚至是長度都有要求；上英文課是不准做數學題，學習必須按表操課，不能有個人意願；和老師說話要用正確的方式，不可逾越那種無形的階級。這些規定是無窮無盡的，甚至是種類似「監獄」的形態。

「遵守規則」已成爲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而這規則是由他人所制定，也不管是否合理，一旦違反了，便會受到懲罰和責罵。學校中的老師是控制者，學生是受控制者，學生必須承認自己缺乏控制，進一步認同這種過程的總體框架，並接受這些規章制度。如此才能在學校取得成功，也就是所謂的「好學生」，守規則成了一种被高度肯定和有價值的性格特徵。所以艾莉才會覺得「學校的一切，好像只爲了能夠達到他們需求標準的那些好學生而存在的。你只有達到他們的標準，長大才能變成了和他們一模一樣的勢利眼。如果你達不到標準，或者不想當勢利眼，你就活該被當成失敗者、垃圾，永遠不會有人在乎你……」(《危險心靈》)，

頁 187)

而當小傑看到訓導處獎懲公告欄上自己被記的大過，又想起之前幾次月考前三名時，他的相片也曾貼在相鄰的教務處成績優良公告欄，他突然有了體悟：

這些與其說是獎懲，還不如說是某種價值標準的灌輸與規範。遵守這種價值的人得到表揚，違反這種價值的，就得到一定的懲罰。但是，到頭來是誰在制定這個價值標準呢？這個標準是不是就代表絕對的真理呢？（《危險心靈》，頁 130）

以小傑被處罰在教室外上課來說，他顯然是違反了「上課應該要專心」這個價值標準，但這個標準根本不符合人性，誰能做到每堂課都分分秒秒專心呢？更何況有許多上課比他還要混的同學，為何卻一點事也沒有？難道只因他不像趙胖父子倆願意花時間、花錢對老師表示輸誠？其實如果他乖乖「服從」老師的威嚴也就沒事了，就是因為小傑去懷疑反抗這些規訓和老師的威權時，讓老師感受到一種「以下犯上」的威脅性，深怕其他同學也群起效之，所以他選擇嚴懲小傑，只爲了要殺雞儆猴。以學生的立場來看待老師這個角色，在《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有段生動的描述：

我對老師存有刻板印象，覺得老師是一堵牆，是一本「憲法」，無法撼搖，絕對正確，有著如來佛的大手，即使我是一隻頑皮的野猴子，也反抗不了，只好說服自己，該安守本分的做某些事情。而老師似乎永遠在說服我，永遠在要求我「應該」做某些事情，即使是偶爾善意的關心，背後也隱藏著絕對的價值判斷。⁵⁸

⁵⁸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台北：寶瓶文化，2004年初版），頁 37。

這段話正說出了許多老師在教育體制中，一直企圖鞏固自己不可被學生懷疑、挑戰的威權地位。在一個班級中，往往是由導師個人的喜惡、價值觀來判斷一切，像是教室髒亂與否？或是上課秩序如何？甚至於學生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這都是導師個人主觀的看法，但卻成了全班的唯一標準。事實上，老師的人格並不一定比學生高，老師的知識與經驗也非絕對不可挑戰。威權的老師，常因要緊盯著學生的言行而產生焦慮，同時學生的服從也僅建立在懼怕被處罰，而非瞭解到規範並不是實踐老師的意志，而是維護全班的共同利益與秩序。

當小傑去思考他的記過公告背後所蘊含的教育體制中，那種「上」對「下」、威權式的強制性規範時，他有了一段帶有嘲諷意味的剖析：

無論如何，「下」不該冒犯「上」，不管是「上」說的話不合理，或者是「上」既有的好處太離譜了也一樣。……「暴力」也好，「態度傲慢」也好，即使「上」和「下」犯了同樣的錯誤，但因「上」擁有獎懲的權力，而「下」沒有，因此「上」可以以「暴力」和「態度傲慢」種種規範來制裁「下」的冒犯。這是為了避免將來還有一些不知好歹的「下」隨便犯「上」所不得不採取的措施。至於規範合不合理，有沒有必要要求老師或者其他「上位者」一起遵守，那就一點都不重要了。

大家應該認清的是：我們每天在學校努力學習的所謂真理與價值，不過是方便「上」管理「下」時的藉口罷了。請大家千萬不要信以為真。……只要大家夠努力，用功讀書，得到更高的分數、考上更好的學校，將來賺更多的錢，或是升上更高的權位，自然就會擁有權力，搖身一變，從「下」變成了「上」，真理自然就屬於你了。……（《危險心靈》，頁 131—132）

學校裡，老師就是「上」，學生理所當然的是「下」，所有學校立下的標準、規範都只針對「下」有其效用，對「上」完全沒有作用，只因獎懲的權力握在老

師的手裡。小傑被指控所犯的「暴行」、「態度傲慢」，這些罪名完全不能套用在班導身上，即使他也同樣對小傑動了手腳、對小傑的母親態度不佳。更重要的是，「下」對「上」絕不可有一絲懷疑或抵抗，像小傑這樣拒絕認錯，惹來媒體，搶走了校方的裁判權，還威脅了許多人背後說不出來的利益，這可是「罪該萬死」。

這樣的教育制度引導了學生的意志走向，並使之納入規定的管道，只是學生常常並不自知而已。在學校這無形但有限的範疇內，學生是非常的渺小，也非常淺薄。當求學過程中，漸漸內化了制度化的價值，以為只要靠得到更高的分數、考上更好的學校、賺更多的錢、升上更高的權位，就可以在既定的地位和權力位階上往上滑動，由「下」變成「上」，好讓自己的外控能力提高，以做為保證意志自由發展的證明。

當像小傑這樣的「下」產生了個人意識，開始不遵循制度，而去思考、反抗時，對整個在制度內的人而言，不管「上」或「下」都造成了一種不確定的恐慌，所以小傑才會有一種感受：

還是他們把我假設成某種發動心靈戰爭的恐怖分子？我的挑釁逼大家不得不團結起來用冷漠當武器來圍堵、反擊我，好讓某種原來他們相信的事情不至於解體？（《危險心靈》，頁 263）

在一個僵化的制度裡，不管是「上」或「下」都已經被制約了，他們對學校體制存有一種預期心理，這會讓身處其中的人有某種安全感，因此潛意識中自然抗拒改變。而當高偉琦被小傑的精神感動，並因此在訓導主任和生教組長汽車上刻字時，他要的也就是要喚起大家來改造台灣的教育。

「你對教育環境和體制的不滿是什麼？」

「大人強迫我們接受他們的標準和想法，可是他們卻從來不接受我們的。」

「大人為什麼不肯接受你們的想法？」

「因為他們不喜歡改變，他們害怕。」（《危險心靈》，頁 248）

上述中，是記者和高偉琦的對話，正說明了「改變」並不是人人都喜歡的，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喜歡改變，他們害怕改變後的情況會比現在更差，而且安於現狀往往是比改變還要來的容易。人們看到許多和體制與權威相牴觸後的下場，因此從小被教育要服從、相信體制與權威的信念與要求，然後能在體制的遊規則中得到利益，並享受體制對於服從者的獎勵。他們是這樣長大的，自然就如此要求著下一代。

文本中還透過一封在美國讀書的台灣留學生給小傑的郵件，去分析到美國和台灣教育制度本質上的差異性：

在美國受教育，沒有人逼你讀書，你覺得你是為了自己讀書；然而，在台灣你卻是為了某個外在的目的而不得不讀的。……這裡的老師對小孩子真的是很尊重小孩——他們讓小孩子像小孩，也讓小孩子用小孩子的方式生活下去。……你可以感受到他們用小孩的方式對待小孩，接納小孩，並且允許小孩用自己的方式去創造不同的世界。（《危險心靈》，頁 237—238）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不管是學習的動機、方式，甚至是目的，都具有一種無形的「強制性」。所有的小孩都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他們只能接受這個制度的安排，成爲一個個標準化的「好學生」，如果抵抗就被貼上「壞學生」的標籤，被整個制度所懲罰或遺棄，而這標準則完全是由大人所預設的。學校無法接納和包容每個孩子的個別差異，就只像製造罐頭的工廠，以一致性、標準化來規範學生，更以大人的尺度來要求他們的表現。難怪小傑會把學校聯想成酷刑迫害的監獄：

有沒有人想過，有沒有可能監獄禁錮的只是無形的思想？能夠酷刑迫害的

也不只是看得見的刑具？小學六年，國中三年，高中三年，如果一間間應該傳出學生嘻笑聲的教室，聽不到嘻笑的声音；應該充滿健康活蹦身軀的操場，看不到活蹦亂跳的身影，那麼它跟長達十二年的監獄刑期有什麼差別？（《危險心靈》，頁 181）

學校就像一座另類的監獄，監控著每個學生的行為與心靈。它們都是用一座建築物把一群人困起來，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必須待在像牢房般枯燥沈悶的課堂上，承受著無聊的講解，沒完沒了的考試，成績不好以後就沒前途之類的疲勞轟炸……，這些就等同監獄裡的酷刑伺候。學生如同犯人，穿著一樣的制服(囚衣)，在既定的時間內，一切依既有的規則行事。老師像獄卒，隨時導正各種不符規定的行為，而各種標準化知識與價值的灌輸就像另類的「感化教育」，讓人漸漸失去自我意識與個人判斷能力。從小學到高中，長達十二年的無形禁錮，直到畢業（服刑期滿）之後才能釋放。

教育被建構得如此具有強制性，最後連「知識」也被二元化，刻意區分出是否具有價值？學生是否應該去學習？這背後所蘊含的問題究竟為何？將是下一節筆者所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第二節 有「價值」的知識

小傑在抗爭中要求教育能以學生的立場去規劃，學校才能讓人有衝動天天去上課，學習那些自己想知道的，而不是專家或老師覺得學生應該知道的，知識有沒有價值不該由學校決定。就像人可以選擇吃什麼、不吃什麼，但為何卻無法選擇學什麼、不學什麼？如果有些東西大人無法有理由說服小孩學習，那它自然會從文明裡面消失。

文本中安排一段讓中輟生艾莉展現電腦長才的情節，但她完全不是在學校學

的，而是在網咖混，爲了開網站來賣大補帖、盜拷、賣藥、援交……，讓那些亂七八糟的勾當全部網路化，在有如此的強烈學習動機下，她整天啃著電腦相關書籍，越學越好，甚至想再去讀技術學校或大學來精進這一方面的知識。這雖然是一種反諷，但也是一種印證——知識的價值決定於自己所需。

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關係的總體結構中，有兩件事實際上是有保障的：第一，義務學校教育保證了孩子就讀於學校，這樣就使孩子與其他的知識來源相隔離；其次，傳授知識的資源（resources）占壓倒優勢的比例被集中在學校中。因此，唯有學校才傳授（有價值的）知識這一「事實」就從社會結構上得到了保護，而學校教育本身也因此從社會結構上得到了保護，並由於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而理所當然具有了價值。⁵⁹

學校傳授的知識被宣稱爲「唯一有價值的」，其實是因爲它建立在人們普遍認定學校的學歷證書對未來生活取得成功極爲有用，但只有考試合格才能讓人繼續待在學校並獲取更高一級的證書，而考試的內容又以學校傳授的知識爲主，那麼很弔詭的，學校決定了哪些是有價值的知識。

在《危險心靈》的書中，一開頭就舉了一個學測的數學考古題，對於脫離學校已久的人而言，也許根本看不懂，只因爲生活中沒有運用的機會。因此，大多數人都對數學抱持無用論，認爲脫離學校後只需簡單的加減乘除即可在社會上立足。的確，四則運算是一般人所需具備的基本常識，不過這只要有國小的程序就夠了。但只因爲數學在升學考試中佔了重要的一環，它就變成有價值的知識，不管你喜不喜歡，從國小到高中都必須學它。

尤其台灣的數學教育又偏重於精確而快速的計算解題，爲了應付升學考試，花了很多時間熟背各種公式，在幫孩子做技術上的熟練之餘，卻常忽略了數學裡很重要的一些能力，好比說推理能力。在如此功利與機械式的教學活動裡，學生

⁵⁹哈利斯，《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頁 166。

是不太容易體會到數學的美好。這些爲了考試而必須學習的知識，佔去學生生活的極大部分，就像小傑所說：這些對你來說也許不痛不癢的事情，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切。而我們的生活，是過完那些重要的一切之後，剩下來的。（《危險心靈》，頁 5）語氣中充滿了無奈感，因爲一旦不是出於自願，那麼學習就會變得很枯燥乏味。

而本來應該比較相對有趣的文學，也因爲變成一題題死板的國文考題，讓小傑寫得心浮氣躁，不知所爲何來。

所謂文天祥從容就義根本就是文天祥白白去死。更不用說千秋萬世之後，莫名其妙地讀著課文的我們這群可憐蟲，爲文天祥的白白去死到底又白白地浪費掉了幾千萬、幾億，甚至幾兆個小時的生命？（《危險心靈》，頁 33）

小傑以小孩的角度大肆批評這樣過時的國文課文，他搞不清楚選這樣的課文到底是什麼目的？因爲以現在的標準來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說穿了也就像是一種政黨輪替。更令人受不了的是，從這樣的一篇文章，卻延伸出一堆記憶性的題目（例如要你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不是孟子講的話，而是文天祥說的），把學生折騰個半死。如此的國文教育，學生如何會對文學感興趣呢？

學生需要的國文教育，應該是要能幫助他們嫻熟語文運用、豐富生活中的語彙、文藻，並能夠順暢地使用國語文來表達自我、與人溝通。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接近現實的、生活的語文情境，進一步從文學中培養想像力和創造力，讓他們具有文學欣賞的能力，提高人文涵養，而非去記誦一堆零碎的片段文字。如果我們的教材只是在學生的腦子裡，填進許多枝節知識，這樣非但無益，還會影響了他們對學習的興趣和態度。再加上中、小學的教學大都是以老師講授爲主的灌注式，使得學生養成被動式的聽和記憶，更懶得運用思索能力。

小說透過這樣的數學、國文考題，來反映這些被定義爲有價值的知識，其實

和生活是多麼脫節，但學生爲了考試又不得不唸，完全沒有選擇的權利。就像書中所寫：就算養豬，你給幾百萬隻豬都吃同樣的飼料，也有吃不慣的豬。你說他們爲什麼都要上同樣的學呢？（《危險心靈》，頁 105）這樣的比喻也許失當，但事實上也正說出學校教育中那種對知識唯一的標準化，有其不合理之處。而一旦教育和生活實用脫節，學生即使現在學了，將來畢業後還是會遺忘。因此，教育應該要和生活的經驗相聯結，而非讓學校的學科變成紙上的假東西。

這支遠征軍的主力就是十五歲以下的青少年。歐亞大陸從這頭跋涉到另外一頭再回到家鄉，需要的差不多是十年的時間。大部分成年男子需要養家活口、照顧後代，這些青少年年輕、有創意，而且沒有家累，這一路十多年的征戰與沿途的經驗造就他們的能力與見識，等他們二十多歲回到故鄉時，就成了能征善戰的戰士。（《危險心靈》，頁 121）

小說中提到成吉思汗建立了歷史上最強大的帝國後，靠著一支十五歲以下的少年軍團，就幾乎佔領了大半個地球。十五歲正是現在中學生的年紀，或許他們因爲征戰並沒有時間受過什麼正統的學校教育，不過因爲這樣的生活所累積出來的能力與見識，又何嘗不是一種知識呢？而且還更爲實用。反過來看，現在台灣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學歷文憑自然不等於實際上的能力，因此就算念到碩士、博士還是常找不到工作。就如同小傑的感嘆：

現在電視上是一些不景氣、失業增高，碩士、博士找不到工作的消息，連碩士畢業生也跑去跟小學畢業生爭搶清潔隊員工作的職位了。看著電視畫面上他們扛著沙包拚命衝刺好通過體能測驗的樣子，我有點難過，不曉得國中、高中、大學研究所多讀的那十幾年書能派上什麼用場……（《危險心靈》，頁 221）

此外，學校傳授的這些所謂有價值的知識，往往忽略生命教育與心靈探討，讓學生在被訓練成考試機器之後，卻常常是對人生的意義感到茫然。所以小傑會感慨：

如果聖經的故事只是神話，學校教的才是真正的知識，為什麼這些知識一點也沒有讓我看到真理、看到生命中的道路，或者是黑暗中的光？我不明白，難道只有這些瑣碎的知識才是重要的嗎？否則，為什麼學校從來不教我們思考並且疑惑：人為什麼活著？活著又有什麼價值？什麼才是值得追求的？為什麼學校只要求我們領先，成功，卻從來不教導我們如何追隨內在的價值，如何懂得愛與分享？難道這些也都是神話？（《危險心靈》，頁173）

台灣目前的學校對生命教育是相當忽視的，孩子從小就開始進入了高度的競爭環境，只知道不斷背誦教科書裡的知識好考得高分。讀書的目的只爲了求取更高的學歷，期待能以此換來到一份好工作、好收入，甚至於好的婚姻。但這種以功利爲前提的讀書方式，卻不能讓人對生命有所感動與體驗。學校以升學爲導向，教育變成一種業績競賽，爲了講究效率只好不停的把任何考試所需的知識盡量的填鴨進學生的腦袋，沒有任何喘息機會，更沒有發揮創意的空間，也不許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爲考試是要求唯一的、標準的答案，學生只能接受制式的考試答案。

台灣教育制度的背後，讓學生面對一個狹窄競爭的空間，爲了分數斤斤計較、自相殘殺，使人迷失在升學考試的競爭當中，而對生命的本質感到茫然，心靈往往空虛與貧瘠。的確，生命教育是無法讓學生考高分，但卻能使人內在更豐富，達到超越現實的自我層次。這樣的知識不是要人學識淵博，而是要讓人能發自內心的去思索生命。否則一再壓抑自己追求生命的初衷，最後將會對生命的感受變得遲鈍，甚至無法感受到生命存在的價值，失去了對生命的熱情與嚮往，只

剩下一具沒有靈魂的慾望肉體。

她引用了法國一個叫作布爾迪厄的社會學教授的理論，說明教育的功能除了「複製」知識給下一代之外，事實上，教育還挾著政經社會賦予的資源與正當性，「複製」了某種隱藏在教育內容背後的階級與社會結構給下一代。（《危險心靈》，頁 169）

小說裡還藉由郝老師寫的一篇專欄，分析到學校傳授這種單一標準的有價值的知識，其背後的含意除了是一種知識的複製外，更是一種社會和文化不平等的複製。學生在接受這被認定有價值的知識時，同時也就接受了隱藏在教育體系背後的「結構」。這種結構就是那種冷酷無情、上下分明的階級關係與封建結構。大家各憑社經人脈資源，競爭分數，爭奪卡位成爲「上」位者。學校教育制度存在著這樣一種論述形式，在「論述」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意圖支配他人、建構制式知識且排他性極強的「真理意志」（the will to truth），藉由知識體系與社會機構，來形成「論述」的主體位置與「權力意志」，使知識成爲某種普同概念及合法的產物，以便創建效用及理性與懲戒的規訓（discipline）。⁶⁰

這樣的教育體制，有著統一而不可動搖的標準，無論從外在的知識體系，或到內在的意識形態⁶¹都是制式化的，並有極強的排他性，不容挑戰與懷疑，讓學生接受著唯一的真理。學校裡所教的知識就以一種理性、合法性存在著，以此教育學生，好在無形中鞏固擁有「論述」權者的位置。

⁶⁰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85。

⁶¹提出「意識形態」此一觀念，最重要的理論家是馬克思（Karl Marx）。馬克思認爲統治階級往往透過社會關係的生產，來複製、鞏固其既有利益，使其統治得以自然化與合法化，而「意識形態」就是這種複製社會既有關係，將原本不對等的社會資源分配視爲理所當然的論述實踐。統治階級不僅只會透過外在的支配與宰制，來確保其政體的有效性，還透過觀念和「意識形態」的製造與生產，來形塑國民對統治階級的忠貞與認同，統治階級也會利用「意識形態」的宣傳，使各個階級各居其位，接受已被提供之再現與定位方式的架構思考。因此，「意識形態」在馬克思的觀點中，除了意味著扭曲和不真實的再現方式，「意識形態」也是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因爲這些被支配的底層階級，透過媒體和文化體制的制約，不斷在每日生活中吸收「虛假意識」，將剝削和異化視爲不容質疑。

義大利的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在他的《獄中書簡》 (Prison Letters) 中提出這個概念，主張支配階級往往會透過非武力和政治的手法，藉由家庭、教育、教會、媒體與種種社會文化機制，形成市民共識，使全民願意接受既有被宰制的現況。「霸權」在這樣的意義下，儼然是社會文化規範和標準的推動者，它不只是一種柔性的說服手段而已，更經常透過複製統治階層所彰顯的社會利益，來使統治的威權暴力合法化和正當化。

因此，「霸權」是深刻織縫在日常生活紋理當中的，透過教育和宣傳，它不只是會使人們在意識形態的呼籲和召喚 (interpellation) 中，把許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態度視為理所當然，它也同時超越於所謂的政治經濟體制 (如國家或市場) 之外，在常民生活中形成微妙且無所不包的力量。⁶²

這裡可以更清楚瞭解到學校教育往往就是支配階級所使用的非武力手法之一，讓人民從對知識上的共識，進一步形成意識形態上的共識，把主流文化所認定的價值，以一種知識的包裝來柔性說服人民。教育制度中的教科書裡，那種單一價值認可的知識標準，正是以這種綿密的監督及無所不在的言語官檢體系，使某種制式的知識價值與觀念，深植於社會的無意識中，成為理所當然的必要規範，也使每個人都在這樣鋪天蓋地、無所遁形的論述網脈下，形成其主體與客體間複雜糾纏的權力位置。⁶³

因此，在上位者可以藉由學校教育來掩飾「霸權」的本質，以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去推動各種規範及標準，使各種威權暴力變得合法化、正當化，並被視為理所當然。比方說歷史教育就是形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而歷史

⁶²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130。

⁶³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85。

教育與歷史教科書就常常是以當權者為主體的史觀，甚至於編造歷史搞個人崇拜。

所以如果學生、家長甚至是老師對教育的方式和內容沒有懷疑或者思考的權利，我們怎麼能夠確認我們受的教育內容合不合適？是不是受到政黨或特定的意識形態的控制？（《危險心靈》，頁 81）因此小傑也才會把我們的學校教育比做電視，它長時間佔據了我們的時間和注意力，我們得分清楚每天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哪些算節目？哪些算廣告？而廣告背後想推銷給我們的商品或者觀念到底是誰分到了好處？那些好處又是什麼？

小傑參加了現場 Call in 節目，和主持人討論到對台灣教育的不滿之處。他主要是認為學生每天必須接受的教育，卻沒有經過學生的同意，也沒有用學生的立場去規劃，這是很不合理的。對他而言，知識是否具有價值去學習，應該由學生的需求來判斷。

「因為這麼一來，我們學的都是我們想知道的，而不是專家或者老師覺得我們應該知道的。然而現在所有這些我們不得不學，不得不考的東西並沒有經過我們的同意。」

「為什麼要經過你們的同意呢？難道你們自認為比專家更知道你們該學哪些？不該學哪些嗎？」

「專家為什麼會比我們更明白自己的需要呢？」我說：「我們吃什麼、不吃什麼都得經過我們的同意，為什麼學什麼、不學什麼，就得由專家來決定呢？」

「就算食物也必須考慮到營養和均衡啊，」主持人說：「這樣假設好了，假設有些東西你們真的應該學，可是你們卻不想學，那該怎麼辦？」

「那就給我們理由，說服我們啊。」

「假設好了，」主持人說：「假設無論如何，大人都無法說服你們呢？」

「那麼，」我笑了笑說：「有一天，這樣事情就會從我們的文明裡面消失。」

（《危險心靈》，頁 291）

這樣的論調看似弔詭，但其實很合理。學生應有權利選擇哪些知識需要學習，以獲取他所要認知的知識能力。如同馬斯洛⁶⁴認為認為學習必須是內發的，因為生活遇到的各種需求、問題，使得學生從內在主動想學習的知識才有其價值，教師扮演的角色是輔導者。學校的教師常誤以為只要將所謂專家挑選過、組織好的知識提供給學生，學生就應該學習。事實上知識的「價值」並不存在於教材表面，而是教師能啟發學生使知識個人化，從而獲得價值。

即使教育體制在本質有上述種種的爭議性，但捍衛體制者還是強調教育權利的平等是其不可抹煞的貢獻，也就是指教育機會「起點」上的公平。但事實真是如此嗎？筆者將在下一節做一番剖析。

第三節 功績主義式的假平等

所謂「功績主義」是以個人的能力做為依據，讓學生在公平機會的競爭下，被選擇、分配至社會各階層上。因此，學校教育可以突破社會階級的壟斷，開放社會流動的機會，而消除了社會的不平等。派深思主張傾向於教育的功績取向（meritocracy），認為教育體制可以根據個人的成就表現，給予不同的籌賞，站在立足點的平等上，以不同孩子的成就表現與個人努力表現，決定未來的社會位置，這種站在起跑點的平等是認為教育提供了一個相同的機會，重點在於個人的施為。因此，教育也普遍塑造出一個提供社會流動與平等進步的形象，讓人們相信可以藉由教育體制來達到某種程度的機會均等。⁶⁵

⁶⁴被譽為人本心理學之父的馬斯洛，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創始人，也是心理學第三勢力的領導人。他對於學習與教學有兩點主張：其一，他認為學習不是外鑠的，而是內發的；學生本身生而具有內發的成長潛力。其二，他認為教師的任務不只是教學生知識，而更重要的是為學生設置良好的學習環境，讓學生自行學習。

⁶⁵袁蕙晴，〈課程轉化下教育公平性與文化再製理論的對話〉，《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 23 期，2002 年 5 月 15 日。

事實上，學生在一般智能或智力優勢是有所差異，但學校卻把能力和智力畫上等號，用標準化的考試或智力測驗加以評量，這種「功績主義」使學校擴大了這類特定優勢的比例，為認定需要更高智力的工作崗位挑選學生，於是智力優勢成了衡量一個人將來生產力價值的唯一指標，接著那些工作又附帶較高的社會地位、經濟特權和其他特權，在這樣的循環之下，學生在學校的成績評量優勢，變成認定將來個人出社會的優勢。

台灣教育制度雖然號稱五育並重，但「獨尊智育」也是不爭的事實，關鍵在於升學的錄取標準，這是因為考試升學是以「智育選才」的方式，而且侷限於課本的知識和標準答案。學校為为了提高升學率，當然只注重應試需求了，這樣完全用智力標準來評量學生，造成學校裡許多在美術、體育方面有天分，但只因數學、英文不好，就被視為次等的學生。社會只報導少數出身窮困的學生，透過考試獲得社會地位，卻沒想過有更多人靠著一技之長翻身。光看考試成績，把技能取向的學生用智育的分數評量，當然也就無法培育出多元人才。

而且只看智育的表現，導致許多學校的藝能課、體育課大都被拿去考試或學科的課業複習，更別說對品德教育的忽視了，所謂五育均衡發展，不過是一紙空談。這種只肯定單一標準的智育成就，造成學生的立足點太少，自我價值難以建立。而如此以成績掛帥的升學主義，也常常只是教導出一群智育出眾，卻缺乏行動力，對社會冷漠的學生。

「我跟教務處查了一下你的成績，」他說：「你有兩個學期還曾經拿過第三名，你跟其他的壞學生不一樣，你何必這樣作踐自己呢？」（《危險心靈》，頁 76）

當訓導主任在處理小傑和導師的衝突時，說出了這樣的話，這裡正看出了學校以智育來對學生做僵化的二分法，只重視成績優秀的學生，對落後學生則採取放棄的態度，甚至有成績不好就等於品性不好的偏見，嚴重污名化那些智育成績

較差的學生。老師有這樣的成見，成績壞的就是壞學生，導致有些成績好的同學也跟著看不起成績差的同學。其實社會上有成就的人未必是智育最優，而且學生的好壞更不該由智育的表現來判定，但許多家長仍舊無法打破「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迷思，學校作法也違背多元教育的宗旨。侯文詠在小說中分別從所謂後段班的老師和學生的角度，來看待這種以智育為標準的功績主義式的平等是多麼不合理。

另一則新聞則報導了一個國中後段班的導師帶著他的班級來參加抗爭，並且疾聲批評我們的學校失去人格養成的功能，已經淪落成為功利、成績、考試、競爭的殺戮戰場了。

「你這樣把學生帶出來，難道不擔心學校或者是家長方面的壓力？」

「我想就算我沒有帶他們，他們自己也會來的。這些孩子在學校已經學不到東西了，或許來這裡會讓他們有機會找回自信心吧，」這個戴著眼鏡的年輕老師說：「我已經豁出去了，我願意接受任何的處分。我不在乎，我只是心疼這些孩子……」說著他的聲音已經有點哽咽。（《危險心靈》，頁272）

智力優秀的學生往往集寵愛於一身，相對地，在學校課業跟不上的孩子多半被放棄。學校只注意到有沒有培養出成績優異的學生，所以集中了大部份的資源，去照顧成績較好的前段班，卻忽略了將程度較差的學生拉拔起來，讓他們留在後段班，放牛吃草，這樣的教育制度被極度扭曲了。一所學校，只關心有多少人考上明星高中，縱使有許多功課不好的孩子什麼都沒學到，他們也漠不關心。這些後段班學生正是教育制度下的犧牲品，常會覺得自己被社會放棄，甚至變得自暴自棄。而社會貧富差距往往是由於教育差距所導致的，只要這樣的教育差距存在，貧富差距是無法改善的。

學校應該給予後段班學生真正需要的東西，比方提供職業技術課程，以及多

元化的教育方式。正因為智力成就較差的學生可能受到先天或後天的不利因素而不及他人，因此學校更應該給予較佳的學習環境，而非剝奪其權利，並且嘗試利用多元化的課程，協助他們找出智力以外的才能或興趣。

在他之後是幾個國中學生在舞台上滿身大汗地表演街舞。在他們跳完舞之後，一個國中生有點害羞地對著麥克風說：「我媽媽一直覺得我是個不聽話的壞孩子。我當然也很想聽她的話，孝順她，可是她只要我讀書，從來不知道我也會這些。我希望她在電視機前面能夠看到……」他說到這裡停頓了一下，後面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就哭了。（《危險心靈》，頁 283）

許多課業成績差的學生，往往會被老師、父母否定，日子久了也就失去學習的信心與興趣，連帶地影響對自我的肯定，造成智力程度差的學生對自己的能力全盤否定，認為自己一無是處。學校教育應利用多元化的課程內容，培養學生個人興趣、激發不同的潛能，肯定每個人獨特的天賦與才能，並且讓學生懂得欣賞他人的優點和給予尊重。唯有培養學生能發展個人專長，藉以建立自信心，增加學習的興趣，才能使學校成為學生嚮往的地方。否則就會如同艾莉所說：

報紙說台灣的中輟生已經突破一萬人了，而且以每年百分之六十的速度很快地增加。如果學校只想教成績好的學生，就讓中輟生自己管自己好了。這樣一邊一國，看到最後哪一國人比較多？（《危險心靈》，頁 293）

而且所謂以「功績主義」來促進社會階層流動，這種公平性往往只是一種假象，因為學生在學校的智力優勢表現，是跟家庭的經濟階級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一個優裕的家庭是可以提供較好的讀書環靜、資源（例如補習、家教），讓小孩在學校的學習處於優勢地位，這對家庭經濟弱勢的小孩哪裡公平呢？又舉例來說，各項免試入學的甄試看似多元，但家境富裕的人能讓孩子學各種才藝來獲

得獎狀，並砸大錢來做出精美而豐富的申請資料，窮學生根本沒有機會，將更難翻身。這樣的不平等，在小傑所處的班級可見一斑。

我們班是一個特殊又神秘的班級，每個同學的家長都大有來頭。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話，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這個留言這麼好笑。此外，我們班另一些同學是屬於家長不太有來頭的那種。我猜想他們真的是常態分班被編進來的。雖然家長不太有來頭，可是他們自己很有來頭，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是怪卡。所以說到最後，我懷疑根本沒有常態分班這回事。我們班有一半是人情班，另外一半是拿全校三年級怪卡排行榜上的名單拼湊出來的。
(《危險心靈》，頁 7)

因為小傑的導師是禮仁國中升學班的數學明星老師，許多政商名流，包括前行政院長、前台北市教育局局長的小孩，都曾經受教在他的門下。家長認為要挑名師，孩子的受教權才會受到保障，所以爭先恐後，不管用關說或種種方式就是要把小孩送進他的班級，而這些有特權可以選班級、挑老師的家長自然個個大有來頭，在社會上屬於社經地位較高的。如此一來，學校的名師都教有錢有勢的學生，對那些沒錢沒勢的學生公平嗎？

我記得從國小開始，我就被她抓去拜託過一個又一個的老師，讀她能打聽到最好的班級。每年春節、端午節、中秋節以及教師節，更是大包小包的禮物提到學校去，用各種硬性、軟性的手段強迫老師收下。我一直以為所有的人讀書都得那樣，直到國小四年級，有人在我的課桌椅上寫了「特權」以及許多不堪的字眼之後，我才曉得並不是天下所有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危險心靈》，頁 51)

每到要編班的時候，許多家長就紛紛拜託學校的老師、民意代表來關說，像

小傑的媽媽這樣做，極可能造成孩子認為沒有特權可以依靠，就無法生存，或是認為反正自己有靠山，就可以有恃無恐的後遺症。除此之外，爲了提高小孩的成績，家長會長還主動幫忙向學生收費，並且安排場地，好讓大家去導師那補習。

「不會吧，那些題目大部分不是都考過嗎？」

「都考過？」我嚇了一跳，「什麼時候考的？」

「對噢，」趙胖想起了什麼似的自言自語地說：「我差點忘記了。」

「忘記什麼？」

「沒什麼啦，」他支吾了一會兒，好不容易終於說：「我忘記你已經不去班導那裡補習了。」（《危險心靈》，頁 37）

別的同學在班導那裡補習，寫過一模一樣的考卷，考得再爛成績也有八、九十分，小傑因爲沒去補習，只考了七十六分，就被大肆羞辱，內心自然感到憤憤不平。他原本期望校長能主持正義，但期望終究落空。校長當時出於善意邀請在校園遊蕩的他聊天，出發點雖是好意，卻帶著某種說服的企圖在裡面，希望他反省自己。那樣的方式與態度，是會讓青少年覺得很不真誠。師長應該在還沒弄清楚真相之前，心中先存有一份來自心中真正的接納，而不要直接給予教導，更不要先預設立場去批判。

「別的同學早就做過了同樣的題目，我沒有做過，所以考試成績不好。」

我在做最後的掙扎。

「你為什麼不做呢？」他抬起頭，淡淡地笑了笑。

「因為大家放學後都去老師那裡補習，」我理直氣壯地說：「只有我沒去。」
我不知道校長是不是想這麼說：「你為什麼不去呢？」可是校長沒有說，他只是停了下來，臉上表情起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危險心靈》，頁 48）

根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考核辦法第六條規定，老師是不能參與校外補習的，查獲一定記過處分，但身為學校裡最高行政長官的校長，卻因為怕得罪家長會長、名師而默許這樣的情況發生。所以有些主科老師會選擇在學校課堂隨便講講，再利用學生放學後額外收費補習，其對象大都是所教授的班級學生，如果又兼任了導師，班上學生補習的人數相對會來得多，只因為怕導師會因為自己沒有去補習而故意找麻煩，小傑即是一例。他因為沒去導師那補習，沒事先寫過相同的考卷，就遭到不平等的待遇。雖然小傑是因為不喜歡班導上課的方式，自己選擇不想去補習的，但如果今天換成一個貧窮的學生，家裡能有錢讓他一個月花四千元去補習嗎？

小說中的艾莉就是在這樣教育制度下的犧牲者。她是一個中輟生，生長在一個不健全的家庭中，父親做生意失敗後整天喝酒、大吵大鬧，母親受不了便跑掉了，而父親為了躲債就把她交給祖母和叔叔扶養，自己跑到大陸另起爐灶。寄人籬下的艾莉長期受到嬸嬸的種種惡意對待，並且還被要求去申請各種學校的補助。

從註冊費、校外教學的費用到中午的便當，我所有的東西全是補助的。我每次拿補助單去蓋章，看到總務主任，雖然他不說話，可是從他皺眉頭的樣子我就可以感覺到心裡一定在想：又是妳這個麻煩鬼來了。（《危險心靈》，頁 189）

正因為這樣，她的自尊心大大受損，加上不喜歡同學那種可憐又夾雜看不起的眼光，漸漸地，她在學校的朋友愈來愈少。在一次班上同學丟了錢，老師懷疑是她偷的，便把她叫到辦公室詢問，要她誠實承認。她很不高興，在沒有任何證據之下，只因為窮，便被認定是小偷，於是她和老師起了衝突。後來被請到學校的嬸嬸也認定錢是她偷的，於是便自認倒楣地賠錢，並將她毒打一頓。

嬸嬸賠錢等於跟人家默認錢是她偷的，她不曉得要怎麼去面對老師和同學，

於是她便開始逃學。常流連網咖的她，透過其他混網咖的朋友學會許多電腦技能，當她後來覺悟想繼續進修更高深電腦的知識時，卻因為已被貼上壞學生及中輟生的標籤而受到學校的排擠，甚至想轉到別的學校同樣是不願接受她，於是她只能繼續中輟下去。

難道只因為妳的父母親，妳就一輩子都被貼上標籤？是不是一旦妳被貼上壞學生或者是中輟生的標籤，就不再有人相信妳也想要努力向上？是不是就沒有人願意再給妳機會了？（《危險心靈》，頁 193）

艾莉正代表著那些弱勢家庭的學生，說出了心中的不滿，在這種教育制度下，公平往往只是一種假象。唯有家庭的社經地位越高，小孩才會得到更多教育的優勢。像趙胖的老爸因為是學校的家長會長，所以就可以挑班級、挑老師，甚至於安排導師在他的公司替兒子和其他同學補習。而高偉琦把訓導主任及生教組長的車刮得傷痕累累，卻只因爸爸是前省議員，就輕易得到學校的原諒。連小傑考慮轉學時，也見識到了那種教育制度中的不平等待遇。

我本來以為這一幕雪中送炭的劇到此為止。沒想到謝委員竟然要助理聯絡義廉中學的王校長，當場拿起電話，就在我們的面前大刺刺地公然關說起來。更誇張的是，不到三分鐘，謝委員就搞定了任務。

「王校長說沒問題。」他對我說：「他歡迎你隨時轉到義廉中學去就讀。」
（《危險心靈》，頁 315—316）

一通立委的關說電話，學校就輕易答應了小傑的轉學。拿來對照艾莉一心想復學，卻因她缺乏一個有錢有勢的背景，就像皮球一樣被學校踢來踢去，這對一個想重新回到學校去學習的小孩來說，情何以堪啊！

就在這樣充滿強制性又不公平的體制下，文本中的每個人物都有他們感到焦

慮的部分，表面上雖然只是個人事件，但筆者以為侯文詠正企圖透過這些個人事件去探討其背後所隱含的那個更大公共議題——教育體制的問題。

第四節 個人焦慮與公共議題

侯文詠所使用的敘事手法，並不單純只是對學校教育加以質疑，他並沒有在敘事中對小傑的反抗能力加以美化，也並不是在說小傑如何利用一連串的行動來達成對教育體制的反抗，而是回過頭來質問，學生如何在無法避免的惡劣教育環境中，作出界定自我人格的種種決定，並且捍衛學生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尊嚴。

侯文詠在本書大玩小題大作的寫作手法，也大玩社會學轉換觀點的能力。書中更屢見侯文詠或明或隱的援用社會學觀點……侯文詠彷彿藉由本書大玩社會學的想像力。米爾斯曾說，所謂社會學的想像力，就是一種轉換觀點的能力，讓人可以同時認清事件的個人焦慮與公共議題。舉凡所有能夠引發個人焦慮的事件，其實通常包含著更大的公共議題。⁶⁶

《危險心靈》的主軸一開始是小傑的個人問題，他是個被班上同學、老師認定愛搞笑的學生。這樣類型的孩子，通常在台灣教育體制裡，會歸類成調皮、不乖的學生。因為在學校裡，只有當孩子服從、整齊、安靜才會被讚賞。但對於「調皮」，在《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有不同的解讀：

惡作劇在學校總是免不了，孩子不調皮那才奇怪，只是有時候調皮得讓人傷腦筋。不過我認為青少年的創造力就在裡面，這時候大人的引導就顯得很重要了。一般體制學校，比較常用規則束縛，因為那是最省時省力的方

⁶⁶王乾任，〈我讀侯文詠的《危險心靈》〉，《社教雙月刊》第 116 期，2003 年，頁 45。

法，所以爬圍牆記大過一支，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不能爬；所以染髮記小過一支，但是那個理由由不得你辯證……。⁶⁷

在一堂導師的數學課中，小傑因為偷看漫畫而被罰站在講台前面聽課，接著又因為搞笑被踢到教室外面去，後來站在外面卻盯著籃球場上體育課的女生看個不停，所以最後連人帶課桌椅被驅逐到走廊。這些行為充其量只能說小傑是個調皮的學生，但就因為他不被這些學校常規所束縛，所以就背負著一堆罪狀：不專心上課、頑劣不堪、目無尊長、不知悔改……，總而言之就是一個壞學生了。這些都不是小傑存心的，但在這個學生一切都被管理的教育體制中，如果有點自由意識的，是很難不犯規的。

你大概不難理解為什麼我會把班導惹成這副德行。我並不是存心的，很多時候，連我自己也沒有辦法控制。我的內心根本就是仙人掌，不管我試圖說什麼或者是寫什麼、畫什麼，到最後它們全都變成了仙人掌的刺，螫得別人哇哇叫。（《危險心靈》，頁 10）

這是小傑內心的獨白，但也同時反映了許多學生被認定不守規矩時的無奈。在台灣的教育體制中，「教訓」與「管理」佔了很重要的部份，唯獨缺乏一份寬容心，不懂得孩子接受到大人真正的寬容，會在心中埋下一顆種子，它也許在很多年後才發芽，長成枝葉茂密的大樹。⁶⁸凡事都只想「立竿見影」的教育方式導致為了要求有效率的標準化管理，學生是不能有任何和學校規矩所相違背的觀點。老師總是以上對下的命令方式對待學生，告訴他們不能做這、不能做那，但卻很少花時間說明為什麼不能，如此一來，學生學會的是盲目服從，而非理解道理。

⁶⁷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頁 50。

⁶⁸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頁 84。

全人中學的招生簡章有段話：這是一所專為十一到十八歲的青少年而辦的學校。學校重視五個理念：人類過去知識的通識理解、人格特質的自我實踐、審美趣味的養成、創造能力的釋放、批判能力的培養。每個孩子不同的觀點在此都能被尊重、包容與啟發，大人與小孩的關係是朋友，互相聆聽與辯證。讓孩子不僅在心智上成熟，也在人格上有正向的發展，大人們會給予很長的等待，讓孩子們逐漸成熟。所以孩子快樂而有自信，不需太多的教訓與管理，最後他們擁有的能力是真實的，而不是被訓練出來的。多年來，我目睹了這裡的孩子如何經歷挫敗、惶恐、勇敢、自律、堅持……，最後他們帶著希望和能力走向屬於自己的人生。⁶⁹

其實就像全人中學所抱持的理念，教育是需要時間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應該像朋友，能夠互相聆聽與辯證，並尊重與包容不同的觀點，如此孩子才能快樂而有自信的逐漸成熟。小傑的處罰事件會擦槍走火，並不是一個特殊個案，而是侯文詠刻意要點出的公共議題——台灣的教育問題。問題不只是在小傑的班導身上，老師只能算是整個教育體制的代罪羔羊，所以他會覺得「電視、報紙上面討論的都是學生的權益怎樣怎樣，教育的改革應該怎樣怎樣，講了半天，從來沒有人關心老師的權益，好像這一切活該都是老師錯了一樣。」（《危險心靈》，頁 200）

的確是這樣，小傑的班導教書快二十年了，他在這個教育體制中，一直沿襲著傳統的教育方式，教出了許多後來當醫生、法官的學生，還得到一堆感謝牌，自認是個被家長學生最愛戴的老師，所以他當然無法察覺身處的教育體制是否有問題，但其實從他的自我感覺良好就可以看出一些教育問題。首先，教育的目的難道就為了培育學生將來能從事被社會所認定的高尚職業？再來，那些感謝牌的背後也只是代表著用打出來的高升學率，這種算業績的方式不是一種價值扭曲的教育嗎？

⁶⁹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頁 30。

因此，教育問題絕不是單一面向，而是種共犯結構。當小傑焦慮的想：

如果所有教育列車上的乘客，包括新聞媒體、教育部、學校、老師、家長、學生……全成了謀殺案共犯的兇手時，這一切該怎麼辦才好呢？如果應該陳情，兇手能為受害者主持正義嗎？如果應該抗議，我們又如何去抗議自己呢？」（《危險心靈》，頁 280—281）

這段文字明白指出了所有教育問題的共犯，彼此環環相扣，每一個人都是加害者，卻又有不得已的苦衷，整個共犯體系牢不可破，因為誰都不認為自己有錯，也都為各自立場辯護。一旦抵抗其中的一小部分，很難不觸怒其他的部分。所以當小傑試著想對抗這出了問題的教育體制時，自然會遭到各界的壓力，而且會有一種找不到問題源頭的無力感，因為問題不是單一方面所造成的。作者也沒有想在文本中把問題的矛頭指向誰，而是提供各種教育的面向，讓讀者思考整個問題。而小說中正是藉由小傑的處罰事件裡不同的個人焦慮，去呈現教育制度的種種問題所在。

小傑身處在一個選擇有限的教育體制當中，從文本中可以感受到對於他而言，國三的生活是主要的焦慮源頭，他質疑著：為什麼生命只是沒完沒了的讀書考試讀書考試，我的人生難道不能有別的了嗎？（《危險心靈》，頁 60）在家裡，媽媽對他說：「你已經國三，馬上就要考學測了。這個時候，每個人都拚死拚活地在用功，你看看你自己在幹什麼？」（《危險心靈》，頁 31）在學校，班導教訓他時也說：「你已經國三了，你只要把自己管好，把自己的成績弄好就行了。」（《危險心靈》，頁 54）甚至於連去網咖店，老闆也推心置腹地提醒他說：「都國三了，用功點吧。」（《危險心靈》，頁 18）

「國三」像一個無形的枷鎖，讓小傑無法掙脫，生活彷彿除了讀書之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升上國三，每天不停的考試與念書，已經疲乏得像機器人一樣，在學校就是念書、考試、挨罵的不斷循環過程。對於這樣的無奈感，他開始選擇

用搞笑來掩飾自己的內心焦慮，因為活在這個世界當然大家都想發熱發光，可是你只有兩種選擇，要嘛你搞笑，不然你就發瘋發狂。（《危險心靈》，頁9）

這裡可以看出小傑在學校的壓力來源，像是面對老師的責罰、頻繁的考試、同儕的競爭，以及父母的期望……，這些都變成他焦慮的來源，也因此埋下和班導產生衝突的導火線。所以最後會有這樣的師生衝突，與其說是小傑對他的班導不滿，不如說是他國三長期累積的焦慮感一次爆發，而其背後的意義則是他所處的教育體制出了問題。他之所以後來會放縱自己，越過那道好學生和壞學生的界限，嘗試去PUB、嗑藥、被警察追捕，其實也都是為了麻痺這種體制內的個人焦慮。

同時，小傑的媽媽也有她的焦慮，她就像普遍的家長一樣，對小孩的成績、升學感到焦慮。因此她從國小就想盡辦法幫小傑挑班級、送禮巴結老師，只為了讓小孩享有她認為最好的學習環境。所以當初知道詹老師是個明星老師，即使他的教學方式不正常，還是想盡辦法請託，把小傑送進他的班級裡，只為了確保國中畢業後能考上好的高中。然而當小傑被老師處分在教室外面，她又開始焦慮小孩會因為這樣的處罰而跟不上學習進度，因此即使明明對處罰有意見，她還是拚命跟老師陪笑道歉，甚至希望小傑再回去班導那裡去補習，好讓一切回歸「正常」，若非小傑意外的和老師起衝突，她應該會繼續讓小孩過這樣的國三生活。

父母的心態如同張淑敏所言：

「意識型態」一旦形成社會文化，而這些信條便如同烙印印入廣大民眾的心中，任何人想要反抗都會和社會及週遭的人事物產生衝突、對立和矛盾的種種現象，於是在基於保護孩子的情況下，父母寧願被教育制度的共犯結構給綁架，也不願意反抗，只是希望自己的小孩在順利平靜的教學環境中成長，追求社會制定的成就標準。⁷⁰

⁷⁰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頁98。

而後來小傑的媽媽會找媒體的朋友幫忙，一開始也只是爲了想要一個公道，並非真正想對這樣的教育體制有所改革。這從小傑被學校企圖貼上壞學生標籤時，她直覺用兩學期都是全班第三名的成績單來做爲小傑不是壞學生的佐證，就可看出她其實並沒有跳出這樣的教育制度框架。

看著掃描器綠色的光線掃過成績單，我心裡想，我不就因為受不了天天考試、分數……這一大堆事，才惹來這麼多麻煩？怎麼到頭來，還是得靠著成績單才能證明我自己？（《危險心靈》，頁 177）

小傑的無奈，正反映出他媽媽潛意識裡，依然認同這樣制度下的唯一標準。父母爲何如此看重小孩的學校成績？答案就如同小傑的父親所說：「做父母的當然都希望孩子能夠比別人卓越，可是內心又覺得很矛盾，逼你們讀書，怕你們現在不快樂，不逼你們讀書，又怕將來對不起你們……」（《危險心靈》，頁 182）這話說出了普遍父母的焦慮心態，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成龍、成鳳，深怕孩子在競爭激烈的社會中成爲弱勢的被淘汰者，爲了讓孩子將來有足夠的競爭力，因此一開始就不能讓他們在學業上輸給別人，因此在學校的成績也就成了出人頭地的唯一指標。

而小傑的班導身爲名師，升學率自然是他最主要的焦慮，每個家長都想盡辦法、透過各種關係，想把小孩擠進他的班級，這看似風光的背後，又何嘗不是種壓力呢？

「你們的家長天天拜託我，送我禮物，有什麼用呢？你們不想讀書，難道我天天生氣，你們的成績就會變好嗎？」（《危險心靈》，頁 39）

「別的導師禮拜天早上帶著女朋友去動物園，去植物園，去花園、去茶園、去果園……我是不是在家裡等著接你們電話，等你們數學有問題來問我？」

為什麼我不等女朋友的電話，等你們的電話？你們比較漂亮嗎？你們家比較有錢嗎？還是我是你的爸爸、媽媽，上輩子欠你們的？到底是你們要考學測，還是我要考學測？我這樣逼你們，我錯了嗎？」（《危險心靈》，頁40）

「我不要看到這樣的成績，我要忘掉這種惡夢。我再給你們一次機會，同樣的題目重新再考，我要看到你們每一個人漂漂亮亮的成績。你們的成績漂漂亮亮，你們的人生也漂漂亮亮。就像當初你們的父母漂漂亮亮地把你們交給我一樣，我的責任就是把你們漂漂亮亮地護送到未來。」（《危險心靈》，頁43—44）

當班導一邊用考卷一邊抱怨這些話時，就不難感受到他內心的焦慮了。許多老師剛開始教書時，對教育都懷有很高的理想，但最終為何還是向現實低頭，使自身淹沒在升學率至上的主流價值中呢？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不管學校或是家長對「好老師」的普遍的定義，往往就是能將多少學生送進所謂的明星高中、明星大學。老師會因為教出很多考上第一志願的學生，使得其教學名聲立刻水漲船高，甚至對於許多家長而言，這樣高績效的老師，就是所謂的「名師」。

小傑的班導身為「升學班」的老師，在逼孩子念書的同時，也給了自己莫大的壓力，在這樣不正常的責任感和榮譽心的驅使下，他走火入魔似的付出時間、精力，只為了換取學生的升學考試成績優良，好不辜負眾多家長的期望，也才能讓他繼續保有「名師」的光環，以及其背後龐大的補習利益。也因此學生的考試成績自然會牽扯他每一根緊繃的神經，焦慮的感覺隨時一觸即發。可悲的是他並沒有去省思這一切的問題所在，卻只把這樣的焦慮轉嫁在學生身上，就因為他對自己太有自信了。

我帶了這麼多年的升學班，哪一年不是升學率最高？我敢講，就算教育部

長、大學教授或者什麼教育專家來，也沒有我這麼瞭解你們。我為什這樣管教你們？那是因為我太瞭解你們了。如果你受不了，當初何必來拜託呢？什麼學力測驗、推薦甄試、分發入學，那可不是我規定的。你以為每天輕鬆愉快地搞什麼常態編班、愛的教育、人本教育我不會嗎？這樣大家高高興興的混水摸魚，你們就全考得上好學校了。（《危險心靈》，頁 55）

當他在面對小傑的媽媽質疑時，他很有自信的說了上述這樣一段話。他認為自己憑藉良心教書，對得起家長，對得起學生，更對得起這個社會。他用自己覺得最有效的方式在幫助孩子，更何況這些孩子都是拜託進來他的班級，他從來沒有強迫過任何人接受他的想法。

這裡看出老師往往傾向依他自己的發展模式來塑造學生，而大多數老師求學過程都很順利，在這樣本身求學背景的限制下，造就學校成為大型的升學補習班，因此小傑的班導心中，會認定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好學校也就不足為奇了。而當小傑母子倆想透過媒體的力量來挑戰他的教育信念時，讓昨天明明還是家長學生最愛戴的他，今天忽然成了報紙上形容的十惡不赦、人人喊打的老師，這自然會令他產生一種威脅感與權力競爭的焦慮。

除此之外，客觀的大環境也令老師不由得不焦慮。「教改」原本只是一種為了改善教育本質的手段，但十幾年來層出不窮的教改行動，本末倒置地把「手段」變成了「目的」，常讓人感覺到好像是為「教改」而「教改」，不論有形或無形中都增加了老師的負擔。偏偏身處第一線的教師又沒有發言權，只能被動地執行長官朝令夕改的政策。因此小傑的班導對於家長指控他扭曲教育環境時，自然大感不平。

這個扭曲的環境不是我造成的，我也改變不了這個扭曲的環境。空喊理想的老師、家長很多，無奈的教育人員更多，我只是務實地教導小孩怎麼在這個扭曲的環境下求生存而已。我敢說，就算換了再多的教育部長、甚至

總統，十年內也不可能有人能夠改變這樣的環境。到時候，你的孩子大學都畢業了，妳還在抱怨教育環境扭曲？（《危險心靈》，頁 119）

就如同小傑的班導在最後選擇辭職時，對記者用哽咽的聲音所說的話：「我只是一個受害者……」（《危險心靈》，頁 310），他在這出了問題的教育制度中，只因爲一件處罰學生的事件，就無辜的成爲整個體制的代罪羔羊。但事實上，在整個教育氛圍當中，「老師」早已是一個工具化的角色，其目標就是完成教學任務，以達到學校、家長所期許的分數、升學率，如此又怎能要求一個老師爲台灣的教育問題負全責呢？

侯文詠對教育問題，並沒有簡化爲粗糙的二分法：改革者或被改革者。他的思考可能是，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加害者可能是莫名其妙的「教育體制」。⁷¹從上述種種，筆者以爲在文本中的每個角色，都是因爲這個扭曲的教育體制而引發其個人焦慮。侯文詠再藉由一個處罰事件，使這些個人焦慮有了交集，甚至是衝突，以突顯其背後所隱藏的更大公共議題。

⁷¹游常山，〈侯文詠：追求下半輩子的幸福〉，《30 雜誌》：9 月號，2004 年。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47&auth=10080&keyword=%e4%be%af%e6%96%87%e8%a9%a0>

第肆章 《靈魂擁抱》——媒體體制的探討

在接連創作兩本探討體制問題的長篇小說後，一向是媒體寵兒的侯文詠在《靈魂擁抱》中選擇了回過頭檢視媒體這樣的體制。

小說中的俞培文是位知名的暢銷作家，不過近幾年來由於網路新興作家的竄起，使他在文壇的聲勢大不如前。直到一篇溫馨短文——〈靈魂的擁抱〉在網路上不斷被轉寄，讓俞培文又紅了起來，不但教育部打算收錄教科書中，連總統都在媒體前公開引用，俞培文也將錯就錯，讓出版社將文章收入他的新書之中。

就在此時，一位自稱是他死忠粉絲的女子——王郁萍出現，說她正是這篇短文的作者，並希望俞培文能繼續用他的名字刊載她的文章，這無理的要求讓俞培文從此陷入了困境，他深怕一切的謊言都將隨時被揭發。書中的主角俞培文，可說是典型的媒體造神下的產物，他爲了這炒作出來的名氣與掌聲而迷失了自己，但謊言又像泡沫般脆弱。

其實，侯文詠不單單在《靈魂擁抱》中探討媒體，另外在《白色巨塔》中的醫院體制和《危險心靈》中的教育體制，都可以看到媒體如何把無形的手伸進到不同的體制中，影響其發展與結果。

蘇嫻雅批評台灣的媒體，她說：

媒體到底是什麼？當要爭取新聞自由時，它被高高戴上「第四權」的帽子，儼然政府的監督者與公共利益的捍衛者；當面臨自身生存發展問題時，它是企業，是特殊企業；而在爭取廣告或收視率時，它又變成商品，純粹以市場為導向。⁷²

媒體掌握了社會脈動，無論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都是在記錄、傳達社會

⁷²蘇嫻雅，《煞不住的下衝列車：台灣媒體批判》（台北：米羅文化，2004年初版），頁1。

現象，反映了社會真實，所以無冕王理當是獨立監督制衡政府第四權角色，肩負相當大的社會責任。但事實上，正如身為媒體人的吳若權所說：

「媒體」不是一個東西，它是由許多活生生的人組成。包括：股東、經營者、受雇職員、甚至還可以延伸到閱聽大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無法掌控的私慾。⁷³

從《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到《靈魂擁抱》，這三本小說中可以觀察到，媒體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白色巨塔》裡，不論是醫療糾紛，或醫生收紅包的事件，都是因為透過媒體而產生巨大的影響，因為媒體的鏡頭有放大事件的效果，媒體本身，就是一個放大鏡。不只是影像，幾乎所有的事情，透過媒體揭露，就會被放大。好的，變得很好。壞的，變得更壞。沒什麼的，變得有什麼。有什麼的，變得天大不了。這，就是媒體的放大效果！⁷⁴讓當事人無所遁逃，甚至最後造成醫院內部的人事動盪。

而在《危險心靈》中，媒體成為學生對抗教育體制的主要發聲管道，從一個單一學校處罰事件，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竟演變成一場教育改革的群眾抗爭運動，最終教育部長也因此下台。一直到了《靈魂擁抱》，媒體躍升為小說主要探討的主題，侯文詠把台灣的媒體生態赤裸裸的展現在讀者面前，讓大家思考在這個體制內的種種問題。

隨著新的知識經濟體系與科技發展，我們看到的是新階級（new class）的生成，這些新的菁英階級，即是知識與媒體資訊的擁有者，他們不一定是資本家，大部分反而是技術官僚與知識分子，……並利用媒體的操作與

⁷³吳若權，《「媒」事來哈啦——吳若權的媒體經驗分享》（台北：富邦文教基金會，2006年初版），頁67。

⁷⁴吳若權，《「媒」事來哈啦——吳若權的媒體經驗分享》，頁116。

控制，進行更完密的支配。⁷⁵

所謂的社會菁英階級往往掌握了媒體資源，像是報紙、電視、網路等各類型的傳播媒體，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並潛移默化地支配著社會大眾的認知、態度和行爲，對於思想及觀念的形成，更具有相當地影響力。對於媒體的威力，胡元輝曾在其著作中做出如下形容：

她可以讓人在旦夕間揚名立萬，也有辦法讓人在不旋踵間身敗名裂；甚至，一言足以興邦、一言亦能喪邦。⁷⁶

本章分爲四節，將試著從不同的面向去解構媒體，第一節要從聳動的標題來討論媒體失真的問題；第二節就接著指出在「失真」的媒體背後，到底有怎樣的共犯結構？第三節再說明這樣的體制下，人們是如何攀登媒體的邊；最後第四節則要探討一旦攀登上了媒體的邊，就必須接受媒體所派定的角色，其因果關係爲何？

第一節 聳動的標題

現在的媒體爲了吸引更多的閱聽大眾，在下新聞標題時，總是有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感覺。爲了增加收視率或閱報率而刻意製造不實新聞，然後在聳動的新聞標題後面只要加上一個問號，就可以完全規避責任，完全泯滅了自身的新聞專業和道德良心。一則新聞的標題搬出一個大問號，有可能是對所報導的內容中，找不到確切的證據，來支持記者他的假設或聽聞。或者在報導的內容中，有部分確定爲真實，但還有一部分是難以判斷真假的。不管原因爲何，這都是一種

⁷⁵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頁 43。

⁷⁶胡元輝，《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台北：商周，2007 年初版），頁 108。

不負責任，有虧職守的表現。

而且聳動的標題，也許能吸引讀者短暫的注目，但卻無法掩飾新聞內容的貧瘠。⁷⁷而在《靈魂擁抱》中就出現了好幾個聳動的標題，都只是企圖引起更大話題性，好得到更多人的目光。而筆者發現，由這些標題，也可以一路找出小說情節的脈絡，可視為小說的主要情節大綱。因為小說中的主角俞培文是個名人，情節以他為主軸發展，其中越重大的事件，自然越會在媒體中出現。筆者將列舉文本中出現的新聞標題，並加以論述。

俞培文：作家代言廣告，是踐踏自身價值判斷的行為⁷⁸

俞培文在接受報社記者的採訪時，談到了「代言」的話題，他認為歌手演員去代言商品比較理所當然，觀眾也可以完全理解那跟他們唱歌、演戲一樣，只是個表演。但一個作家如果因為收了錢，而去代言商品，就等於放棄了獨立思考的立場，讀者將無法信任這個作家的價值判斷。

原本這只是一個平常的採訪，但報社編輯卻去故意讓標題變得很挑釁，因為當時另一個竄紅的小說家——開膛手，正好在代言某個分時度假飯店別墅的廣告。而開膛手的代言廣告和俞培文的採訪又刻意被放在報紙同一個版面上，其中外加一張暢銷作家 VS. 網路才子的比較表，從學歷一直比到家世、身高、外貌以及銷售數量。就這樣，兩個人因為媒體刻意的興風作浪下，結下樑子。

作家俞培文公開指責網路才子開膛手的作品是毫無價值的垃圾（《靈魂擁抱》，頁 51）

開膛手藉由自己主演的舞台劇，邀約俞培文出席觀賞，俞培文誤以為這是對

⁷⁷吳若權，《「媒」事來哈啦——吳若權的媒體經驗分享》，頁 15。

⁷⁸侯文詠，《靈魂擁抱》（台北：皇冠，2007 年初版），頁 40。

方一個在表達善意的行爲，沒想到卻中了圈套。開膛手早就通知媒體來採訪，只爲了炒作兩人的恩怨，好讓自己能繼續保持在鋒頭上，畢竟在媒體中，保持高曝光度是必要的，否則所謂的「名人」，多如過江之鯽，一不小心就很容易被大眾給遺忘了。

被設計了的俞培文自然是氣憤難平，加上記者的逼問，他終於忍不住在攝影機的鏡頭下，第一次公開批評開膛手的作品是垃圾。就這樣，開膛手的目的達到了，這個話題可以繼續延燒下去，他的新書也就有宣傳的賣點。對媒體而言，也樂見如此的發展下去，因爲名人互罵在台灣的媒體上，永遠可以吸引閱聽大眾的目光，一切只爲了刺激「收視率」、「閱讀率」。媒體與名人相處久了，就難免太過熟悉，新聞性也就不夠了，加上媒體還不斷地讓新的名人輩出，因此名人在媒體上基本是各領風騷一兩年，甚至僅有五分鐘的熱度。所以那些熱度甚高的名人如果一時沒有更好的素材，就會製造各種話題以求自身在媒體的熱度。

價值之爭？理念之爭？意氣之爭？暢銷作家互嗆

俞培文：開膛手的作品全是沒價值的東西

開膛手：俞培文所謂的價值根本就是自淫（《靈魂擁抱》，頁 64）

俞培文和開膛手繼續透過媒體向對方叫陣，想藉由攻擊對方的缺點，來間接突顯自己的優越。媒體一方面批評文化界，認爲這樣的作家，只爲了賣書以及宣傳造勢，而不惜斯文掃地，互相叫罵，甚至大打口水戰，教人不敢苟同。但卻忘了自省：媒體正是這種現象的幫凶。媒體根本不管是價值之爭、理念之爭或意氣之爭，他們要的只是一個有賣點的衝突，雙方知名度越高，用詞越犀利，這個衝突就越有看頭。

媒體人完全不管所謂的新聞專業與道德，只想把每個事件處理成一則則「可口」的新聞。而對於俞培文和開膛手這樣的名人來說，爲了馳名而製造各種爭議，這樣持續被媒體關注，從而活在媒體的新聞報導中，要遠勝於以廣告的形式存在

於媒體中。而且這種不斷靠爭議、話題來維持知名度，自然要比憑真才實學來得輕鬆、快捷。

真誠的擁抱？身體對身體，靈魂對靈魂（《靈魂擁抱》，頁 84）

有一篇網路文章〈靈魂的擁抱〉莫名其妙的暴紅，不斷被轉寄，署名是俞培文所寫。但事實並非如此，那不但是他寫的，俞培文甚至認為這篇文章沒什麼品味，很弱智、粗糙。他的經紀人卻認為〈靈魂的擁抱〉所帶來龐大的人氣，正是銷售量每況愈下的俞培文所迫切需要的。而俞培文也陷入兩難，不知對這篇被視為他的代表作，是「默認」流俗呢？還是「否認」更加媚俗？

最後連總統都引述了〈靈魂的擁抱〉的內容，並且被媒體拍下和反對黨領袖那種各懷鬼胎，卻還互相擁抱的照片，來呼應文章的論點。隔天，這張照片都佔據了各家報紙的頭版，並下了個可笑的標題。「真誠的擁抱？」點破了政客慣於在媒體前演戲，所以說新聞節目播出的內容，不一定是真相。其中，大都是以在鏡頭前表演的成分居多。

只許新歡玩抱抱 不准舊愛獻殷勤

主播劈腿名作家 卻告記者性騷擾（《靈魂擁抱》，頁 231）

電視台的夜間當家新聞主播宋菁穎，她是俞培文的超級大粉絲，很著迷俞培文的作品，也自認從中得到很多的收穫。後來因為一次的專訪，兩人有了交集，宋菁穎因為被〈靈魂的擁抱〉所感動，而要求了一個所謂的「靈魂擁抱」。這兩人的曖昧行為激怒了宋菁穎的愛慕者——電視台採訪中心的記者彭立中。

彭立中長期的熱烈追求宋菁穎，卻被宋菁穎視為一種騷擾，甚至要循法律途徑，告他「性騷擾」。因此彭立中便提供報社，他所偷拍到宋菁穎和俞培文的擁抱照片，並提供單方面的說法，認為自己是被拋棄的舊愛。雖然報社也平衡報導

了宋菁穎的說法，但從下的標題就可以知道，編輯顯然更喜歡彭立中的說法，因為那樣的新聞才有賣點。這也正反應了現在媒體所要的新聞標準——腥羶色，而且最好是「有圖有真相」，但事實是如此嗎？

也許事件的主軸並未報導得很離譜，但記者常寫出了過度渲染的情節，加上商業環境競爭激烈，媒體常疏於或故意忽略對新聞做必要的查證。所以隔天出現在媒體版面的事實就被嚴重扭曲了。難怪社會大眾普遍的有「反新聞」情緒，因為不管報紙或電視的新聞往往犯了不正確、捏造、忽略公益和侵犯個人隱私……等錯誤。

尤其是媒體在宣揚發揮知的權利之餘，卻嚴重地不尊重一個人有「不被人知的權利」。胡元輝對這提出了疑問：「媒體在意的究竟是『知的權力』，還是『以知為名，以窺為實』的消費手法？」⁷⁹眾多資訊的本身，構成了一個迷陣，對於閱聽人而言，問題不在於資訊處理困難，無法得到「清楚的信息」，而是這些信息並沒有為許多重大新聞事件畫出一幅「清楚的圖像」——沒有為社會大眾提供他們周遭環境中比較接近實情的「真相」。⁸⁰媒體為閱聽人所建構的真實，往往跟客觀存在的真實相差甚遠。

處女主播與氣質作家的靈魂擁抱（《靈魂擁抱》，頁 379）

宋菁穎開記者會，主要是為了控訴彭立中的騷擾與造謠，也表示自己雖對俞培文的作品孺慕，但彼此關係僅止於新聞事務上的幾次會晤，並無所謂的「男女關係」。她甚至拿出「處女膜完整，未遭受破壞」的診斷證明，來推翻彭立中的謊言。也再一次和俞培文大方擁抱，示範什麼是「靈魂擁抱」。

如此麻辣的情節，媒體豈會輕易放過？報紙上自然以斗大的標題來強調「處女主播」這個話題。尤其台灣男人對「處女情結」的觀念仍是很深，接下來大眾

⁷⁹胡元輝，《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頁 42。

⁸⁰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台北：九歌，1997年初版），頁 38。

會熱烈的討論也就可以預期的。筆者觀察到，像台灣的前主播侯佩岑要結婚時，就有媒體以「侯佩岑處女出嫁 公婆喜贈 2 億豪宅」當新聞標題，可見這種炒作「處女」議題的新聞在台灣媒體是確有其事。而媒體這種報導，不正是物化女性的兇手？標題是新聞編輯們展露才華，嘔心瀝血之作，也代表他的意見，但這些標題，卻往往誇大失實，簡直是種「新聞暴力」。

王郁萍：當他答應和 10592 人

靈魂擁抱時，我忘情地吻了他

作家俞培文成全癌末病患心願 今起展開靈魂擁抱活動（《靈魂擁抱》，頁 446）

明明是在王郁萍的逼迫下，俞培文不得已和她擁吻，但在被狗仔拍到照片後，爲了保護俞培文，王郁萍對記者編出一個謊言，說俞培文將爲了完成她死前最後的心願，要跟 10592 個人靈魂擁抱。他們倆先靈魂擁抱，俞培文再去抱 10591 個人，那麼 10592 個靈魂代表著超越她的生命，更豐富、更無限、更永恆。俞培文爲了保護自己，也昧著良心，附和王郁萍說的都是真的。

這個荒謬的說法，原本只是個謊言，卻諷刺的成了新聞標題，甚至最後變成實際的慈善活動。而俞培文成全癌末病患心願的正面形象，也就這樣被塑造出來。這情節的安排，完全反映了在媒體中，許多公眾人物的完美形象，都是靠操弄媒體包裝出來的。

靈魂的擁抱 再度炒紅俞培文

政客主播粉絲名流愛擁抱 作家身陷風暴以行動化解爭議（《靈魂擁抱》，頁 447）

在這一連串的新聞炒作下，俞培文的新書《靈魂的擁抱》在一片外國文學熱

賣中，異軍突起，長踞各大書店暢銷排行榜第一名。這說明了在媒體中只要話題、風波不斷，就可以刻意操作，讓自己的作品成為眾所注目的焦點，進一步反映在銷售量上。如此的「市場經驗法則」，讓大家瘋狂想擁有高知名度，而不去管是好或是壞的知名度。因為「有新聞就是好新聞」，當記者像偵探般喜歡無時無刻來探測你正在做什麼事或正準備做什麼事的同時，也就代表著你的一種重要性，也就是你具有新聞價值。這種觀念雖然扭曲，卻活生生存在我們的媒體體制內。

為什麼？俞培文問：為什麼？

愛的擁抱不敵暴力的執迷？（《靈魂擁抱》，頁 501）

宋菁穎親自為俞培文的「靈魂擁抱」活動站台，兩人將在聯合醫院的大廳，和到場參與的朋友擁抱。這個舉動當然激怒了彭立中，他已經拼湊出事情的真相，知道俞培文所謂的靈魂擁抱只是一場偽善的鬧劇，他極端且偏執的想用生命去保護宋菁穎的完美，讓她免於謊言、偽善與墮落了。所以彭立中也去了活動現場，領了號碼牌，排隊去參加「靈魂擁抱」。最後，他趁機用預藏在側背包裡的水果刀，狠狠的刺了俞培文兩刀。被逮捕後，面對在場的攝影機時，他仍堅持自己是最真實的方式在愛宋菁穎。

這樣的新聞自然成了報紙的頭條，因為裡面有名人、性騷擾、因愛生恨的情殺等，這些都是可以刺激報紙銷量的元素。而標題用痛批方式的報導字眼，民眾的情緒才會被帶動。其實俞培文的想法只是：「為什麼是我？」但報紙卻看圖說故事，把這話解讀成「愛」是否能夠戰勝「暴力」？於是，俞培文的生死被媒體塑造成了一種英雄式的精神象徵，而所謂的「靈魂擁抱」也就引起社會更強烈的共鳴。

這個一開始就是個謊言的活動，越演越荒謬了。許多新聞不正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嗎？許多媒體人在還未釐清真相之前，就急忙以主觀的想法去拼湊、報導新聞，讓整件事無可避免的失真。比方現在媒體報導「體罰」的模式都大同小異，

通常有一位學生疑似被老師體罰，家長發現後，往往自行或透過民意代表，向媒體投訴或召開記者會。媒體一逮到這個具有「新聞價值」的題材，總是來不及深入查證，就聽信片面之辭，做大幅度的報導。

偉大的作者因偉大的讀者而存在

兩大作家破天荒出席喪禮 化解宿怨為讀者靈魂擁抱（《靈魂擁抱》，頁539）

因為俞培文和開膛手都有在把柄在王郁萍的手裡（俞培文的〈靈魂的擁抱〉是王郁萍寫的，而開膛手曾經玩弄王郁萍的感情），所以被迫一定得出席她的喪禮，好取回不利於自己的證據。這兩個虛偽的人，爲了自私的目的，做出虛情假意的動作，明明一切都是謊言，卻在未查證真相前，就硬生生的被媒體美化了。

這樣的媒體體制下，一方面，讀者無法認識所處環境的真相，喪失了「知的權利」。另一方面，對於新聞事件的是非，已經被記者先下了定論，也就剝奪了讀者「判斷的權利」。也許王郁萍的行爲有不妥的地方，但相較於俞培文和開膛手，她卻真實的多，如此一個小小的書迷，卻被兩個虛偽的大作家拿來炒作自己的「偉大」形象，而媒體的可信度低落也就可見一斑了。

當媒體的聚焦都在聳動的標題上，且不斷地重複播出以提高收視率時，閱聽大眾自然被徒具新聞聳動價值，卻忽略新聞事實全貌的媒體所影響。但在這樣「失真」的媒體背後，到底是怎樣的共犯結構呢？筆者將在下一節做深入的探討。

第二節 媒體的共犯結構

沒人可否認，媒體無所不在，媒體出現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是當代生活經驗的主要領域。我們無法逃脫媒體的呈現（presence）與再現（representation）。

⁸¹我們依賴主流媒體來獲取娛樂及資訊，藉此得到安全感與日常生活經驗的連結，以確保自己對社會的了解與大多數人是一致的。正如林信男在其論文中所言：

新聞報導之於社會大眾，猶如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正因為人們不可能親身參與世界上發生的所有事件，因此媒體便透過報導的方式，讓人們得以認知、理解他們所身處的世界。⁸²

而媒體的亂象是一種共犯結構，絕非非單一面向。台灣地小人稠，媒體頻道之多，在惡性競爭下品質低落，新聞頻道二十四小時的放送，其中有真有假、有操作，也有炒作。以主播宋菁穎的性騷擾事件和俞培文再度翻紅為例，從媒體經營者開始，到報導的記者、評論的「名嘴」、收看媒體的民眾，以及節目背後的廣告主，甚至於當事人本身，都是造成整起事件沸騰的共犯。

主播宋菁穎控告彭立中性騷擾的事件，由於她是名人，自然變成了熱門新聞。名人的八卦新聞往往是收視率的保證，而在媒體眼裡除了收視率，容不下其他，更別說要保護當事人了，偷窺名人成爲一種商業行爲。媒體不斷加大偷窺尺度，不論大、小媒體，大家一起來講名人八卦成爲了全民運動。而這些名人的公眾形象往往仰賴媒體勝於其自身的言行舉止，他們只會注意媒體呈現出來的自身形象。

換句話說，媒體剝奪了他們的人格，使他們淪爲媒體形象。當然，了解媒體手法的名人往往也懂得利用媒體，替自己服務。例如公眾人物常以較具有衝突性的個人事件，吸引到媒體的注意，再經過各大媒體廣爲報導後，無需花費到任何宣傳費，就成功利用媒體來提升自身的知名度，而「高知名度」正是名人重要的無形資產。

⁸¹ Roger Silverston 著；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03年初版），頁2。

⁸²林信男，〈從語藝觀點看「慾照事件」的媒體角色與新聞敘事〉，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頁14。

就像俞培文由於一篇掛他名字的網路短文熱烈轉寄，在媒體大幅報導後，連總統也都在致詞時引用了一段，加上他又公開和另一個作家開膛手在平面媒體展開筆仗，並和主播宋菁穎傳出緋聞，如此多重的媒體效應下，他的知名度越炒越高，馬上被大遠文化出版集團的汪總裁親自高規格召見，看過無數作家起起落落，深懂媒體的他向俞培文說：「我絕對嗅得出來，你人生新的一波高潮就要開始了。」（《靈魂擁抱》，頁 87）這話果然沒錯，俞培文和宋菁穎曖昧不明的擁抱照片一張張在媒體曝光，文壇才子和美麗主播的緋聞，自然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再加上彭立中對他橫刀奪愛的指控，使得整件事變成連續劇般精彩可期。

俞培文一方面留給大眾無限的想像空間，一方面又堅持是呼應新書的「靈魂擁抱」，釣足了媒體的胃口，讓自己維持著媒體的高能見度，也達到宣傳新書的效果。而俞培文在處理王郁萍的危機時，更是懂得操作媒體，化危機為轉機，把自己變成一個為癌症病人圓夢的愛心作家，舉辦所謂「靈魂擁抱 10592 人」的活動，吸引了更多媒體的關注。後來在這場充滿謊言的活動中俞培文被刺殺，他又順勢靠這意外成為媒體裡以「愛」戰勝「暴力」的精神象徵，知名度達到最巔峰。由此可見，名人就像一件商品，時時刻刻需要靠媒體來炒作自身的價值，而媒體也需要名人提供源源不絕的八卦題材。

媒體和名人的關係非常簡單，媒體利用名人的高知名度來增加新聞報導的可看性，名人則是利用媒體來宣傳新作品，兩者互蒙其利，沒人吃虧。就如同俞培文的經紀人小邵所說：「宣傳就是這樣嘛，不要看得太嚴重啦，反正作家最重要的是作品，至於宣傳，只要引起觀眾興趣，目的就達到了，你不能事事要求完美啊……」（《靈魂擁抱》，頁 12）

很多名人在有新作品推出時，為了讓自己的消息能登上新聞版面，就故意製造一些勁爆話題，表面上是媒體自己挖出來的新聞，但其實都是名人們自己設計、安排好的題材，藉此炒作新聞以達到宣傳的目的。像俞培文的新書《靈魂的擁抱》就因為書名的高度曝光以及後續的話題性，這些效應不斷地提高首刷的印量。就這樣，名人替媒體帶來話題，媒體也幫名人創造新聞價值與利益。

宋菁穎是電視台夜間當家新聞的主播，由於台灣近年來的電視主播都朝「明星化」發展，美麗的女主播自然是媒體的寵兒，但她的性騷擾案也因此就變成一種「新聞」和「娛樂」的複合，極具話題性。當別的媒體紛紛拿來當頭條，此時就出現一個尷尬的處境：她要不要播報自己的新聞？在整個事件中，宋菁穎既是受害者，卻也是媒體者，當她自己變成被報導的主角時，格外諷刺，有種媒體自食惡果的反諷。在宋菁穎和主編的爭吵中，可看出那種媒體只追求時效性、收視率，不顧真相的陋習：

宋菁穎愈看愈生氣，走進辦公室，抓起桌上的電話就打給主編。電話接通之後，她說：「彭立中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新聞報導講究的是客觀與平衡報導，我總不能不給他解釋的機會吧？」

「那明明就是胡說八道，為什麼我還要播報我已經知道不對的新聞？一個主播在播報台上播報她確信是錯的新聞，這合乎新聞倫理嗎？」

「有人控訴別人性騷擾，被控訴的人為自己辯護，這些都是發生的事實啊。我們報導事實，怎麼會違背新聞倫理呢？」

.....

「我是當事人，但我也也是主播啊。妳想想我的立場，一個主播，明明知道什麼是真相，什麼是謊言，卻還要假惺惺地堅持什麼平衡報導，妳想她心裡感受會是什麼？我如果連自己確信的真相都不敢堅持，將來還會有人相信我報導的任何新聞嗎？」

.....

「宋主播，我們從事的行業叫做『新聞』。如果不講時效性，怎麼叫做『新聞』？妳仔細想想，妳過去報導過的新聞，哪個告來告去的新聞沒有兩造？哪個兩造沒有不同的說法？如果每條新聞都要等到調查結束才報導，或者會不會對誰造成傷害，妳說我們新聞還要不要播？」（《靈魂擁抱》，頁 266

—267）

爲了要在專業上表現得無懈可擊，宋菁穎終究選擇親自播報這則性騷擾的新聞。但她一邊報導，一邊覺得荒謬，在這媒體的體制裡，一切只是裝模作樣的所謂平衡報導，假惺惺的所謂新聞正義，冷血殘酷的所謂客觀中立。就如同她所說的：「我真的厭惡透了這個本身墮落，卻拿著虛偽的高道德標準要求別人的傳播媒體……」（《靈魂擁抱》，頁 239）依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規定：雇主處理性騷擾之申訴，以及調查，應該以秘密不公開的方式爲之⁸³，電視台的高層主管一方面表示自己不方便多說，可是另一方面卻又爲了收視率的考量，派了記者去大挖新聞，再脅迫身爲主播的當事人在晚間新聞裡面獨家播出，這樣的玩兩面手法不是很卑鄙嗎？

到最後，宋菁穎終於忍不住在主播台上大聲反擊，控訴彭立中的糾纏，以及社會、媒體的偽善。宋菁穎如此利用「媒體」去控訴「媒體」時，顯得很弔詭，因爲她在這樣的體制中已經很久了，但卻從沒反省過。如今自己成了媒體的受害者，才提出指控，難道忘了她也曾經是扮演加害者嗎？通常只要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表現出一副很超然的樣子，甚至是袖手旁觀，但是一旦自己權益受損了，馬上大聲嚷嚷，直喊不公不義。所以有傳播學者立刻指出她這點矛盾：

如果覺得媒體有問題，為什麼自己從不反省，只在媒體做出對自己不利的報導時，才跳出來指控媒體？我要請問宋菁穎主播，難道過去妳播報新聞的時候，媒體就不偽善了嗎？如果媒體偽善，妳身爲主播，難道不也是偽善嗎？為什麼那時候不跳出來申訴，現在媒體講到妳了，妳才出來申訴？我不明白妳的邏輯是什麼。身爲一個主播，如果真的無法忍受妳播報的新聞，就應該向公司反應啊，反應再不行，妳就辭職啊！哪有人像妳這樣，

⁸³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三月六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1)勞動三字第 0910010443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5 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不戰不降也不走，繼續占著播報台，反過來向觀眾控訴媒體偽善，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妳自己一點責任也沒有嗎？（頁 305—306）

面對網路新聞的興起與普及，加上電視新聞台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播放新聞，新聞報導的競爭更趨激烈，媒體喜歡一窩蜂的追逐新聞，所以一天當中的新聞訊息，往往都被同化集中成那幾則。而新聞事件中的有關人物就會受到緊密的訪問、報導和所謂的專家分析。而這些「專家」正是一群所謂的「名嘴」，他們可以討論政治、經濟、教育，更可以大聊名人八卦，簡直是「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們無需真實知識的累積，只要靠麥克風和攝影機即可塑造出權威形象，再藉著製作單位的腳本，及其主觀的臆測，就能在鏡頭前大放厥詞。所以俞培文看了一個叫「麻辣開講」的節目在討論著他和宋菁穎的話題後，會有所感慨：

本來我還以為談話性節目會維持一個形式上的平衡，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點也沒有想到是這些完全不瞭解內情，也沒有做過什麼功課的人，憑著報紙的印象，就可以這樣做出聽似有理，但卻完全扭曲的開講和謾罵。（《靈魂擁抱》，頁 308）

這些號稱「專家」的人總是以斷章取義的方式截取他們所要的，在沒有嚴謹的佐証之下就侃侃而談，只要言論越偏激、爆料越辛辣，越能提高收視率。媒體這種以收視率為唯一考量的新聞觀點，往往會變成如宋菁穎所言：在這樣的觀點之下，你看不到深刻的內容、人性的轉折，沒有任何深入的評論、專業的分析，更別說價值判斷了。（《靈魂擁抱》，頁 75）為了迎合大眾胃口，新聞也就逐漸走向綜藝化。

新聞事件的真相，時常出現大逆轉。閱聽大眾若在一開始接收訊息時，就立刻信以為真，事後又沒有像收看連續劇一樣「觀賞續集」，漏掉後續的

媒體報導，就很可能產生錯誤認知。更何況，現今媒體經常為了刺激「收視率」、「閱讀率」，或「搶獨家消息」，在來不及查證的狀況下，刊登錯誤的消息，並且以「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方式設計新聞標題，再經過「以訛傳訛」的傳播效果，導致假象變成真相。⁸⁴

這樣的情況正發生在宋菁穎的事件上，爲了衝收視率、搶獨家的商業考量下，記者不經查證，也不想瞭解真相，就把一件「性騷擾」寫成了「主播劈腿」，只因爲以這樣的方式來包裝新聞才更具話題性。媒體總是喜歡以最大戲劇性來向閱聽大眾呈現一樁事件，然後就忘了它，又端出另一樁事件。這種不專業的記者，也正是媒體的共犯結構之一，而且爲數不少，經常充斥整個版面。今天的許多記者似乎不甘心充當純粹報導新聞的角色，而要加入主筆的陣營，結果是：極大部分的新聞讀起來都像一篇一篇的社論。⁸⁵

媒體花那麼多時間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最終導向的卻是他們所猜測臆想的事件上。新聞的產製是一種透過主觀判斷、選擇、建構新聞故事並對閱聽眾進行說服的過程。⁸⁶嚴格而言，客觀的新聞報導是不存在的，客觀只是新聞記者應該力求追尋的一種東西。一個人的生理、心理、閱歷、社會和文化等條件，都不允許他保持客觀，這些條件都是使人墮入主觀的陷阱。⁸⁷但也不該乾脆完全放棄客觀報導，忙於從事鼓吹和煽惑了，因爲新聞記者的職業，讓本身具有權威感和說服力，對於閱聽人的態度和價值觀，甚至於行爲都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在做任何報導時，都不可不慎。

除此之外，媒體體制的問題，閱聽大眾也難辭其咎。因爲廣告主依賴收視率來決定其廣告價格或對媒體的投放比率，因此媒體被收視率牽著鼻子走實在是身不由己。而閱聽大眾正是左右收視率的關鍵，因此當大家喜歡看八卦、刺激效果

⁸⁴吳若權，《「媒」事來哈啦——吳若權的媒體經驗分享》，頁 20。

⁸⁵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頁 24。

⁸⁶林信男，〈從語藝觀點看「慾照事件」的媒體角色與新聞敘事〉，頁 9。

⁸⁷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頁 124。

的節目時，在競爭激烈的市場裡，各媒體爲了生存自然會去滿足觀眾的需求，當需求越大媒體就越強勁，掉入了一種惡性的循環。只要爭取不到觀眾，達不到可賣廣告的收視率，再好的節目也會被腰斬。

因此，不管是媒體經營者本身不知長進、無力反抗大環境，或是因爲閱聽大眾缺乏媒體識讀能力，還是收視率掛帥的市場機制，外加名人與媒體之間存在的互利機制操控著媒體世界，他們都是形成媒體亂象的共犯結構。接著筆者要繼續討論在這樣價值扭曲、是非顛倒的體制下，人們又是如何擠進媒體的窄門，攀登媒體的邊？

第三節 攀登媒體的邊

掌握媒體往往就代表掌握了解釋的權力，換言之，誰掌握了媒體，誰就掌握了發聲工具；誰掌握了發聲工具，誰就有定義事件的權力。媒體所代表的，不是媒體本身傳播的角色而已，更重要的是隱藏在媒體背後的霸權意識形態。很多時候，弱勢人物和群體卻是很難在媒體的體制中掌握發言權，所以很多事件透過媒體的報導是會失真或偏頗的。

「攀登媒體的邊」在必須靠大眾媒傳與外在環境接觸的今日，幾乎是所有企圖影響別人的團體與個人所努力以赴的一件事。……媒體山峰的攀登者，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夜以繼日都在生產足以吸引記者注意的資訊，甚至製造足以吸引記者採訪報導的事件，讓記者代為生產資訊，這些都是媒體上「新聞」的建材。它們有新聞「價值」，卻可能是片面的，歪曲的，甚至虛幻的。⁸⁸

⁸⁸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頁 39。

媒體由少數人所經營和控管，這是屬於社會權力結構的一部分，在社會結構中越上層的人，往往擁有越多的資源，爲了達到特定的目的，自然可以透過新聞代爲生產特定資訊，在運用、操作媒體這方面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是弱勢人物或群體，則有難以攀登媒體的困境。

在《靈魂擁抱》中有兩條主要的情節，一組是俞培文和王郁萍，另一組是宋菁穎和彭立中，中間又穿插俞培文和開膛手。而在事件的發展中，可以看出誰攀了媒體的邊，誰就有解釋事件的權力。就如同彭立中所說的：

這個世界沒有不說謊的人，好嗎？我不在乎俞培文說不說謊，也不在乎我自己說不說謊。我無法忍受的事情是：俞培文明明說謊，卻抬出什麼「靈魂」、「道德」的旗幟，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那才是比謊言還要可惡的謊言。根本沒有道德良心這回事。正因為它們不存在，因此符不符合道德、良心全都靠大家認定。可是大家認定又是怎麼一回事呢？爲什麼你跟名流談道德、談靈魂、談良心，永遠談不贏他們呢？那是因為他們擁有你所沒有的發言權與詮釋權。（《靈魂擁抱》，頁 426—427）

在社會上，人們總喜歡談道德、談靈魂、談良心，無論什麼事都會拿來高談闊論，但無論怎麼談，最後判斷是非的標準，通常是沒有標準可言，往往是一種自由心證，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受媒體影響。因爲如果你有「名氣」，在媒體制度中就代表你有「發言權」，而有「發言權」的人正是對事件有「詮釋權」的人。《靈魂擁抱》中名氣較大、擁有發言權的正是俞培文、宋菁穎和開膛手。讀者以客觀、全知的角度知道小說中的真相，但這三個人卻各自從維護自身利益去向大眾詮釋「真相」。

一、俞培文和王郁萍

俞培文知道〈靈魂的擁抱〉不是他寫的，也認爲其中的結論太草率，良知

告訴他應該鄭重否認。但隨之而來的名氣實在太炫目、太誘人了，「照說我應該站起來，嚴肅地向汪先生表示『〈靈魂的擁抱〉根本不是我寫的東西』才對，事實上那也應該是最後的一次機會了，可是我卻不可思議地聽到自己的聲音說：『好啊。』」（《靈魂擁抱》，頁 88）他順水推舟，把文章當成自己所寫的，讓出版社把〈靈魂的擁抱〉選入他的新書中。這一步錯，使他以後因為怕王郁萍揭發真相，而身不由己的做出蠢事。

俞培文一方面受不了王郁萍的騷擾，但另一方面他又要裝得很喜歡王郁萍，甚至被迫和她擁吻，並且幫她修改文章繼續掛「俞培文」的名字發表，這一切都只因他有「把柄」落在王郁萍手裡。一個侵權的作家遇上了一個瘋狂的書迷，整件事情充斥著謊言與利用，原本是如此不堪，但俞培文卻因為身為名人，掌握了發言權，而在媒體對整件事做了不同的詮釋：

「靈魂擁抱」的概念來自俞培文新書的一篇文章……二十九歲身患肺癌的王郁萍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大受感動，鼓起勇氣去參加俞培文的新書發表。她第一次見到俞培文就以書迷兼末期癌症患者的身分，首度對俞培文提出以行動落實這個理念的建議。俞培文表示：「我本來也有幾分猶豫，可是她讓我看到在生命的有限裡，無限的可能性。特別在她陷入昏迷之後，我很後悔，我覺得寫了〈靈魂的擁抱〉這篇作品的我，欠了她，也欠了所有的書迷一個靈魂擁抱。感謝老天她終於甦醒了，讓我能夠真的開始去做。」
（《靈魂擁抱》，頁 446—447）

俞培文在報紙上這整段的訪問，除了名字沒錯，還有王郁萍真的得了癌症之外，其它的都是謊話連篇。雖然媒體常說「有多少證據，說多少話！」，但在新聞報導中出現的，常常只是證據的一部分而已，而且也可能被當事人刻意扭曲或美化了。局部的真相，往往誤導閱聽人，失去了理性判斷的空間。因為媒體的影響，俞培文搖身一變，成爲一個對普通讀者如此用心，又和自己書上的性情一樣，

真正表裡一致的好人。甚至認為他的〈靈魂的擁抱〉跳脫了文學的範疇，落實到實踐的層次。這種情節的安排，正是侯文詠要嘲諷媒體的荒謬性。

現在新聞版面和時間都很寬裕，需要大量的資訊來填滿，有些專業能力不足的記者就靠那一些廉價的資訊來滿足自身工作的要求。所以新聞媒體應該先理性地追求「報導正義」，而不是急著成為特定人物的發聲筒，否則在查證不夠嚴謹的情況下，媒體很可能變成有心份子操弄的工具。

二、宋菁穎和彭立中

記者彭立中鏗而不捨的追求心目中的女神主播宋菁穎，而這位完美主播卻對他的瘋狂追求感到反感。其實感情是很主觀的，如果今天追求者換成宋菁穎的偶像俞培文，那麼就不會被控訴成性騷擾了。由於宋菁穎是電視台夜間當家新聞主播，相對彭立中只是個小記者，兩者知名度的落差，宋菁穎當然也就在媒體上有較多的發言權，換言之，她是比較容易攀登媒體的一方。

宋菁穎對彭立中的性騷擾指控是她個人的感受，訴諸媒體公審尚且說得通。但不管她在主播台上疾言厲色的控訴一切，或是在電視台的媒體室召開記者會，這都是利用她的媒體職務的優勢。如果今天換成是個普通的小老百姓，哪來那麼多的發聲管道？或者該說媒體根本也沒興趣吧！在這裡，就可以看出彭立中對事件的詮釋權是相對弱勢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彭立中性騷擾的指控，宋菁穎在記者會中還澄清了她和俞培文的情誼不是「男女關係」，並說彼此的會晤僅止於新聞事務，沒有任何曖昧行爲。光這一點上，宋菁穎就在透過媒體說謊了。因為事實上，在他們第二次碰面時，就已經有擦出一些愛的火花：

我再沒多說什麼，帶著宋菁穎隨著音樂搖啊搖。她身體溫暖又有彈性。風吹過她的髮絲，一陣一陣地撩撥。我的身體起了反應，我相信她一定也感受到了，可是我們只是沉默。

「俞大哥。」宋菁穎問：「如果我說我愛上了你，你會怎樣？」

我被她這麼露骨的告白嚇了一跳，但仍然保持鎮定地說：「妳在開玩笑吧？」

「你說呢？」

「妳跟報紙可不是這樣說的，」我故作輕鬆地說：「妳應該是在開玩笑吧？」

宋菁穎沉默了一下，才說：「就當我在開玩笑吧。」（《靈魂擁抱》，頁 247—248）

這番調情的對話，宋菁穎完全採取主動，難道她會不清楚彼此早有曖昧的情愫產生？甚至到後來，宋菁穎還有做過更大膽直接的告白：

「我有一種預感，錯過現在我們就永遠失去了。」

「妳想過這樣做必須付出的代價有多大嗎？」

「我不在乎。」

宋菁穎說著吻上了我的頰，爬上了我的唇。儘管理智上我很清楚，可是我仍不自主地抱緊了她。我可以感受到她的舌頭在我的唇齒之間的熱情，我甚至情不自禁地熱情回應。

不能這樣，我心裡想。

「我們不能這樣！」我推開宋菁穎，「這樣下去我們都會受到傷害的。」

「我真的不在乎，俞大哥。只要你願意，我明天就去辭職，我們遠走高飛，到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

宋菁穎抱緊我，一雙溫熱的唇又貼了上來。她的溫存裡有著堅定，堅定裡又有著一股無可抗拒的吸引力，不再有恐懼，也沒有孤獨，不再有眾人的目光，也不再有任何的禁錮，我們是無所不在的自由……（《靈魂擁抱》，頁 333）

最後，俞培文畢竟還是克制了自己的欲望，拒絕宋菁穎的求愛。因為他深知媒體的遊戲規則，如果他們才對媒體那樣說，現在又這樣做，會被認定說謊，而一旦如此，接著就是身敗名裂了，所以俞培文當然要保持他在媒體中那個誠實的形象。他比宋菁穎理智、老練多了，縱然無奈，他們之間的感情也要緊急煞車。

宋菁穎明知她和俞培文的關係是曖昧的，但在她大膽示愛的隔天，她卻召開了記者會，在她的聲明中的第四點，自欺欺人的否認這一切，她說：

彭立中混淆視聽，企圖扭曲本人和俞培文先生的情誼為「男女關係」。本人從年輕時代就閱讀俞培文先生作品，雖然對俞先生的作品孺慕，但僅因新聞事務，與俞先生有過幾次會晤，彼此友好，從沒有過彭立中所謂「男女關係」。（《靈魂擁抱》，頁 345）

宋菁穎的聲明中，前三點都在指控彭立中對她的性騷擾和誹謗（說兩人有超出普通友誼的關係），但不論彭立中說了多少的惡意謊言，但單就宋菁穎和俞培文的關係，彭立中說的正是事實。但宋菁穎卻選擇在媒體上說謊，她掌握了發言權，重新詮釋了她和俞培文的關係。這樣做，一方面維持自身完美的主播形象，另一方面也怕大眾會因此而採信了彭立中所有的話。俞培文當然知道這個道理，所以也在媒體前演起戲來：

他歉意地接過了麥克風，沉默了一會兒，開始儼然地說：「我和宋菁穎小姐只見過幾次面，我們是很普通的好朋友。宋小姐是一個很認真的新聞主播，她在這個「性騷擾」事件中是受害者，希望大家能夠發揮新聞的道德勇氣，不要再隨著彭立中的說法起舞。」（《靈魂擁抱》，頁 346）

另外為了解釋兩次被拍到的熱情擁抱的照片，宋菁穎和俞培文還一起在媒體鏡頭前，示範所謂的「靈魂擁抱」，並說這是一種人和人之間真誠、信任的擁抱。

宋菁穎故意抱了一會兒，好讓咔嚓咔嚓的快門聲音繼續響著。直到攝影記者拍得差不多了，她才放開俞培文。這種操弄媒體，美化自身形象的作法，不正是身為媒體人的宋菁穎所擅長的？由此可知面對所謂的名人，不論媒體犯的是「以偏概全」、還是「以全概偏」的錯誤，媒體呈現的都只是事實的一部分，並非全部面貌。試著從不同角度探討，包容不同的觀點，完整的真相才會浮現。⁸⁹

三、俞培文和開膛手

媒體喜歡拿同性質高的人來互相比較，最好讓彼此有點煙煙硝硝味，更能刺激閱聽大眾的興趣，好增加收視率或閱報率。由於俞培文和開膛手的年紀想仿，作品也都算暢銷，所以兩人常被拿來相提並論，甚至是比較。因為這一點，再加上俞培文也不欣賞開膛手在媒體的強力自我行銷風格，因此對於媒體常故意邀請兩人一起同台，他總是敬謝不敏。但最後在媒體刻意的興風作浪下，兩人還是結下了梁子。

報紙並打鐵趁熱，做了一張暢銷作家 VS. 網路才子的比較表，把活生生的人拿來物品化，然後在這兩個人的名字下，依照學歷、家世、身高、外貌以及銷售數量來做比較，再蓋上幾個「勝」和幾個「敗」的紅章。並寫了一篇關於雙方發生種種風波的側寫，而消息來源卻全是未經求證的網路、傳言。

這樣的作法自然激化了彼此的擁護者，互相在對方的官網非理性的留言、謾罵，這種憤怒和抗議當然是以「粉絲捍衛偶像」的成分居多，很少人是理性的就事論事。這也反應了當代媒體中，所謂的「網路暴力」，它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匿名和暴力成本低，網友的想法是：一分鐘註冊個 ID，誰也不知道我是誰，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也許不少人曾為網路時代輿論力量的強大欣喜不已，但卻忘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網路雖然是虛擬空間，但並不是大放厥詞者的天堂，它也需要道德的規範，只是很多上網者忽視了這一點，造成網上總是充斥著非理性和語言暴力。因為網

⁸⁹吳若權，《「媒」事來哈啦——吳若權的媒體經驗分享》，頁 44。

路上大都是匿名發言，讓人誤以為法律就不能制約網上的違法行為，大肆地造謠誹謗、毀壞他人名譽，甚至侵犯個人隱私權，造成了許多嚴重後果。

由於俞培文和開膛手都是名人，可利用的媒體資源自然比普遍人多很多，連彼此私人的開罵也不例外。一開始是開膛手在《台北日報》副刊登了一篇對俞培文充滿敵意的文章，創下了副刊文章在網站最高的點閱率。俞培文表面上客氣地認為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時代，作家當然有權利表達各自的看法。但事實上，四天之後，他立刻在同樣的版面寫文章來反駁開膛手，而且還是主編特別抽換稿件，空出版面的。

如此利用大眾媒體來解決私人恩怨，若非兩人皆是名人，豈能如此？而這樣的筆戰除了賭一口氣外，往往並沒有什麼意義可言，因為不同意識形態的筆戰最容易變成各說各話，而且任何的論述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影響到我們的意識形態，既然無法改變，那麼因之而產生的對立自然也無法改變。

另外，在王郁萍的喪禮中，俞培文和開膛手也掌握了媒體的發言權，為了掩飾自己的齷齪行徑，而重新詮釋他們和王郁萍的關係。明明一個是掛名侵權，另一個是玩弄讀者感情，卻都美化成因為王郁萍是個偉大的讀者，而造就了他們這樣偉大的作家。相對而言，王郁萍從頭到尾，在媒體中就是個弱勢者，只能任人利用、糟蹋了。

不管是俞培文、宋菁穎或開膛手，他們攀登上了媒體的邊，在鏡頭前擁有了解釋事件的權力，但這權力的背後同時代表著他們必須扮演媒體所派定的角色，做出媒體所期望的反應。這樣的情形，筆者將在下一節來論述其中的因果關係。

第四節 媒體的「角色派定」

媒體有聚焦功能，可以讓大眾去關注特定的人、事、物，正如徐佳士所言：

大眾傳播媒介也許很難說服你去相信什麼，但它們卻能指引你去注視什麼；大眾媒介也許很難叫你怎麼去思想，但是它們能夠安排你去想一些什麼，因為它們能引導你去談論什麼。這樣一種影響人的認知的功能，被叫做「議題設定」（譯為「話題」設定可能比較妥切）。這個理論中隱含著一個假定：現實世界上萬事萬物在那兒發生、在那兒演變，人們所能看見的，只是媒介的聚光燈所照射的角落而已。⁹⁰

在現實世界中被聚光燈照射到的人物，都因此而賣力扮演好一個角色，以免辜負了強光的青睞。這就是說對於閱聽人來說，媒體為他們設定了話題，而新聞中被報導的人物，媒體也似乎一一指定了他們的角色，讓他們乖乖地扮演起來，這也可稱為媒體「角色派定」的功能。所以在《靈魂擁抱》中，不管是主角俞培文、宋菁穎，或是開膛手、彭立中、王郁萍這些配角，他們在媒體裡的一言一行都算是一種媒體所賦予的角色扮演。

對於一個被報導者，大眾媒介有協助他建立或加強他的「自我觀念」或「自我形象」的效果。其原因與「媒介可授人（或事）以地位」的老理論相同，因為媒介是被視為有權威的，被視為受到大家尊重和信仰的。當一個人自我觀念或形象還不夠確定或不夠明顯時，他可能因媒介對他的肯定描述，而變得確定明顯起來。其次，一旦一個人的「自我觀念」或「形象」變得已經很清楚時，根據「自我依預期而行動」（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原則，他就會在實現自我觀念或自我形象的驅力下，扮演被媒介所派給的角色了。⁹¹

就如同宋菁穎對俞培文新聞的認知：總統既然把名氣的仙女棒點在俞培文身

⁹⁰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頁 28。

⁹¹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頁 31。

上，作家本身又充滿了粉絲對罵、對手叫囂、愛恨爭端的賣點，新聞媒體當然不會輕易放過。不管是什麼領域的報導，新聞裡的人物毫無選擇全被處理成低俗喜劇裡膚淺的丑角，拿著蛋糕彼此砸來砸去。（《靈魂擁抱》，頁 75）所謂的名人，只是一種媒體制度中的角色扮演，而企圖影響公眾的各方人物，也就紛紛擠上媒體舞台拋吻獻媚，讓民眾為之神魂顛倒。筆者將一一探討《靈魂擁抱》中的主要人物，分析他們是如何在媒體的影響下，根據「自我依預期而行動」的原則去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一、俞培文

俞培文曾是個出書叫好又叫座的暢銷作家，但後來銷量情況卻一年不如一年，變成經紀人口中「滿腹牢騷型」的作家。

我抱怨節目主持人為什麼不肯好好讀我的書，總是繞著什麼最有價值的單身男作家、喜歡的女明星，再不然就是什麼星座、八卦之類的問題發問。
（《靈魂擁抱》，頁 12）

這裡點出了媒體的一個現象，那就是不關心作品本身，而喜歡挖一些相關的名人隱私，因為現在的媒體需要辛辣、需要勁爆的新聞。不單是文學界，連唱片業或電影圈都是這樣，因此一旦推出了作品，勢必要學會炒新聞，如此才會得到媒體的青睞，一方面維持自身的高知名度，一方面也可刺激作品的銷售量。俞培文的經紀人小邵把他歸類成是「滿腹牢騷型」的作家。

「你嫌很多東西不高級不想寫，但是再低級的事情都能讓你抱怨連篇。只可惜那些抱怨不能賣錢，否則，跟你的作品相比，你的抱怨顯然更豐富更精采。」

（《靈魂擁抱》，頁 13）小邵對俞培文的這段話，正是一針見血，自命清高的俞培文不願流俗，不管是他的書，或是面對媒體的態度，他都還沒有辦法找到最適合的角色與定位，不願向現實妥協的他，自然難以避免的發牢騷。

直到一個契機出現，小邵發現了一篇網路熱門文章，署名是俞培文。當俞培文第一次看到〈靈魂的擁抱〉時，單純認為這是篇結論草率的作品，甚至讓他雞皮疙瘩掉滿地。此刻，他還沒想到要這將會讓他再次嚐到走紅的滋味。面對俞培文急於和這篇作品撇清關係，小邵提醒他「不管你覺得自己是多麼偉大，多麼高貴的作家，容我提醒你，人氣，是你目前最需要，同時也是最缺乏的東西……」（《靈魂擁抱》，頁 18）這時的俞培文還在堅持自己的原則，想扮演真實的自己。但以經紀人的立場，自然是希望他能藉著這現成的機會，去扮演一個有人氣的作家角色。

另外，俞培文也同時要處理媒體替他製造出的競爭對手——開膛手。在媒體的激化、操作之下，他的角色勢必要和開膛手有一番廝殺，不管是鏡頭前的唇槍舌劍或是報紙上的筆戰，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所主動提供的舞台。當俞培文收到開膛手寄來的舞台劇的貴賓券時，爲了化解之前的風波，他選擇出席舞台劇首演，並刻意露出燦爛的笑容大方讓記者拍照，好證明自己是很有風度的。由此可見，一開始他選擇在媒體的形象是休休有容，但這不是媒體所樂見的。媒體喜歡簡化，喜歡二元對立，喜歡衝突，這樣他們才有賣點。他們認為大眾只喜歡看衝突場面，場面越火爆越有「新聞價值」。

在開膛手的設計下，新聞記者逮住了出席舞台劇的俞培文，並故意問一些挑釁的問題，想激怒俞培文。讓雙方最好像潑婦般隔空對罵，甚至鬧到就像仇人一樣。

攝影機正拍著，我知道我愈是這樣說，就愈掉進開膛手設計好的圈套裡。可是我就是無法控制。我甚至必須用很大的力氣，才能壓抑那股顫動，一字一句清楚地說：「他全部的作品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垃——圾。」（《靈魂擁抱》，頁 48）

台灣地方太小、媒體太多，導致競爭太激烈，爲了搶那些所謂有「新聞價值」

的衝突畫面，攝影記者不顧一切，舉起笨重的攝影機，嗜血地如同機關槍一樣，快速槍殺彼此的信任感，而讓這些口水戰熱鬧登場、一播再播的正是媒體的操作。俞培文身不由己的被媒體賦予了角色扮演，和開膛手在文壇從此誓不兩立，這樣的激化對立，正好讓媒體有挖不完的八卦。

意外地，總統致詞時也引述了〈靈魂的擁抱〉，並和反對黨領袖爾虞我詐地相互擁抱。總統的演講綁架了〈靈魂的擁抱〉，〈靈魂的擁抱〉又綁架了俞培文，讓他成為整個可笑的謊言的一部分。但弔詭的是，卻因為新聞效應，他的新書訂單在通路追加了一萬本。這樣的發展，讓俞培文的堅持有所動搖了。一開始，他還想向大家宣布，〈靈魂的擁抱〉不是他寫的文章，要跟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撇清關係，但這爆紅的滋味讓他迷惑了。

今天那個叫做「俞培文」的人似乎轟轟烈烈發生了很多事情，很多人也對那些事情有各種不同的觀感和意見。可是事實上，做為俞培文的「我」除了例行的工作行程之外，卻什麼事也沒有做——甚至連〈靈魂的擁抱〉都不是我寫的。

所謂俞培文「好的知名度」是我嗎？「壞的知名度」也是我嗎？為什麼同樣的事發生在俞培文身上，卻存在著好壞不同的知名度？這些落在俞培文這個名字頭上所有的一切都等於我嗎？還是我對俞培文這個名字擁有的一切可以不用照單全收？（《靈魂擁抱》，頁 73）

此時的「俞培文」是個媒體所塑造的角色，而由真實的俞培文以媒體、社會大眾所期望的方式去扮演著。他有想過召開緊急記者會，大張旗鼓地宣布〈靈魂的擁抱〉不是他寫的，但又怕會引來總統支持者的不悅，對他群起攻之，甚至掉進更麻煩的政治口水與泥淖之中。而且如果整個社會氛圍都認定了〈靈魂的擁抱〉就是「俞培文」的代表作，那他這樣的否認，會被認為是一個忠於自我的作者？還是無所不用其極炒作知名度的作者？此刻，對於「俞培文」這個角色，他已經

不能完全由自己作主了。

接著俞培文和大遠文化出版集團的汪總裁見面，結果原本預定的出版延後了一個多禮拜，新書的書名也改成了《靈魂的擁抱》。由於書名的高度曝光以及後續的話題性，使得「靈魂擁抱」這個名詞變成了時髦的詞彙。這些效應不斷地提高首刷的印量。爲了乘勝追擊，出版社特別爲他在各地的大型書店辦造勢簽名會。俞培文已經完全接受自己就是寫〈靈魂的擁抱〉而走紅的這個作家角色，也陶醉在這角色所帶來的名利之中，自願陷入這個量身打造的框架裡。

其實我應該把電視關掉的，可是我卻目不轉睛地看著，像成癮似的無法讓自己的視線離開。我感覺到自己全身顫抖，一股怒意不知如何發洩。最後我決定打開手機電源，開始撥電視螢幕上顯示的那個電話號碼。（《靈魂擁抱》，頁 309）

因爲一篇網路文章而再次走紅的俞培文，爲了文如其人，當然要維持自身完美的形象，因此也就不能有緋聞纏身，以免讓所謂精神層次的「靈魂擁抱」淪爲一種男女情慾的肉體接觸。所以當 c a l l i n 節目討論著他和宋菁穎在門口擁抱的照片，並質疑「靈魂擁抱」時，俞培文本能性的要去提出解釋，好讓「俞培文」這個角色繼續給社會正面的觀感。不過當他和主持人一番對話後，他卻又後悔自己的生活爲何要被媒體所操控。

我忽然覺得很後悔，說穿了這些讓我輾轉反側的所謂是非與正義原來只是別人茶餘飯後的消遣。（《靈魂擁抱》，頁 312）

這裡正說出了身爲名人的悲哀，因爲透過媒體傳播的效果，常會在無形中增加言論的說服力。經常上電視發表高見的「專家」，討論著名人的一言一行，明知道他們所說的只能做爲片面的參考，不能當成聖旨，全盤接受，但還是會在乎

這些言論對自身會有多少影響。如果最後忍不住，選擇自投羅網在媒體中為自己
去辯護，那只會提供更多聳動的題材讓媒體來大肆渲染。

**「她是我的書迷，得了末期癌症，時日不多了。我應她家屬的要求，陪她
吃飯，滿足她最後的夢想和希望，她快死了，」**（《靈魂擁抱》，頁 411）

在面對〈靈魂的擁抱〉的真正作者——王郁萍出現時，俞培文選擇了繼續掩飾一切的謊言，他也因此被王郁萍不斷地要脅。而到最後在彭立中窮追不捨，就要揭發真相時，俞培文被迫在媒體面前扮演一個對書迷充滿愛心的作家。因為王郁萍特殊的末期癌症身分，讓她俱備一種先天上的道德優勢，就像是弱勢團體或受難家屬一樣。傳播媒體是很奇怪的，只能對高高在上的人當落水狗打，如果報導對象已經是受難者，那麼任何試圖在他們身上開玩笑或扒糞的，是很容易遭到反噬的。

**九點鐘，王郁萍和俞培文在聯合醫院大廳展開了第一個擁抱。王郁萍戴著
假髮，臉上略施薄妝，刻意換上了那天在黛芙妮穿的夢幻公主裝，坐在由
王郁馨推著的輪椅上。本來是俞培文準備彎下腰去和她擁抱的，但她堅持
要站起來，於是只好由王郁馨和另外一個護士小姐攙扶著她站起來，把她
送到俞培文的懷抱裡。**

**在他們的身後有一個活動的看板，看板上面是可以翻動的五組號碼牌，顯
示著第 00001 個擁抱。當王郁萍和俞培文抱在一起的時候，鎂光燈閃閃爍
爍，現場所有的人都在拍手。由於王郁萍是那麼虛弱，因此第一個靈魂擁
抱看起來不像兩個人互相擁抱，反而比較接近是俞培文抱著一個垂危的病
人。可是愈是那樣，愈讓畫面有了更生動的感覺。**（《靈魂擁抱》，頁 451）

謊言越扯越大，王郁萍爲了保護她的偶像俞培文，她在媒體前編了一個感人

的故事：「一個偶像作家，爲了完成癌症末期的粉絲最後的心願，把文章中的理念化爲行動，期盼藉由彼此擁抱，讓靈魂超越有限的生命。」這樣灑狗血、賣弄傷感的新聞，正是投媒體所好，因爲新聞媒體報導這類事件，往往能引起大眾的同情與關注，是一種溫情主義⁹²的發酵。

俞培文順理成章的扮演著媒體所預定的角色——充滿愛心的偶像作家，對扮演弱勢者的王郁萍伸出援手。他會去看重病中的王郁萍，其實是怕她會將握有的把柄說出去，逼不得已日日夜夜都守在她身邊，但社會大眾卻誤以爲他是去探望書迷，對他大大的讚賞，並貼上慈善家的美名。在鏡頭前，王郁萍的情況越悲慘，越能突顯俞培文的高貴情操，也就越能激起大眾的同情心，並繼續鎖定媒體的報導。

我的生死存活化成了「愛」是否能夠戰勝「暴力」的精神象徵。醫院大廳裡，點起了大大小小祈求我恢復健康的蠟燭，不時有人專程而來，為我祈禱，並且在那裡互相擁抱。政黨領袖紛紛發表聲明，同聲譴責暴力，並且支持靈魂擁抱的精神。（《靈魂擁抱》，頁 502）

在「靈魂擁抱」的活動中，俞培文被彭立中用刀狠狠刺傷。這明明是因爲私人的感情恩怨，媒體卻又把俞培文塑造成對抗暴力的正義化身，「愛」和「暴力」如此的簡化成二元對立，讓觀眾像看連續劇般一目瞭然，所有角色一分爲二，一下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而彭立中自然是被媒體分派到飾演暴力的反派角色。

最後，在王郁萍死去前，她都沒戳破俞培文的謊言，並且早就偷偷把所有不利俞培文的證據燒掉，這一切只爲了保護她心中的偶像，對開膛手她也是如此。因此俞培文和開膛手這兩個偽君子，得以繼續扮演媒體所設定的角色——因爲偉

⁹²溫情主義是指勞動運動初期，資本家及宗教家所提倡的主義。主張勞資紛爭應以情誼相勉，和衷共濟，而謀求整個事業的發展。後以溫情主義指責人過分顧及情誼，感情用事而因私廢公。

大讀者而存在的偉大作者。媒體得知他和開膛手都將出席王郁萍的喪禮，於是早就在禮堂外架起一整排大大小小的攝影機，兩人也各自發揮「媒體魅力」，聲淚俱下地在攝影機和眾人之前，表演完致詞，最後甚至來個大和解的「靈魂擁抱」，稱職的扮演好媒體中的那個自己。

二、宋菁穎

宋菁穎雖然是電視台夜間當家新聞的主播，但她心裡卻明白現在的主播不跑新聞，也不能有太多的意見，只是花瓶或者好看的讀稿機罷了。這跟台灣新聞台主流的「編播分離」有關，新聞的製作生產過程，與主播幾乎毫不相關，主播只需要聽從總編的指示，照本宣科把新聞一則一則地播報完畢，即告收工。主播的專業能力變得英雄無用武之地，漸漸地不被重視，也沒有重視的必要性。

久而久之，台灣主播變成膚淺的明星化，所謂的新聞專業已經被商業行銷手法踐踏殆盡，尤其女主播更只被視為花瓶的效果，提供一些娛樂和美觀，談不上什麼專業形象。雖然她如此無奈地認為自己每天只為了收視率搶一些荒腔走板的新聞，讀稿機似地播報著連自己都不以為然的報導，但卻又捨不得卸下女主播的光環，只好繼續扮演著媒體中的美麗花瓶。

這樣美麗的女主播往往專業不在於新聞，而是在外表與儀態上，促使女性觀眾認同與欽羨，並引發男性觀眾對其性幻想。彭立中即是一例，他被宋菁穎的形象深深吸引，並展開一連串的熱烈追求。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不領情的宋菁穎卻把這些追求的舉動視為一種性騷擾。最後她甚至向公司的「性騷擾防治委員會」提出申訴，並召開記者會。

電視台新聞部的孫經理對彭立中分析，不管女權、弱勢都是當前的政治正確，也是法律正確，一旦扯上政治正確，女性變成了弱者、受害者，男性是加害者，沒有人會同情的。而在媒體的分派角色裡，宋菁穎正是扮演著被害人，彭立中自然是加害人。當然追求或騷擾都是主觀的認知，但任何有政治正確的地方，恐怕就沒有真正的正確了。所以在有氧舞蹈的教室裡，宋菁穎對彭立中的跟蹤、

騷擾大喊：「變態！色狼！」時，當有個新聞同行的同學拿著手機相機拍照，她開始尖叫：「變態！色情狂！」這行為正是反應她潛意識裡要在媒體前扮演一個稱職的無助受害者。

宋菁穎和俞培文原本一開始就互有好感，但爲了全盤否定彭立中的指控，他們就得壓抑對彼此的情感。否則就會如同俞培文所想像：這條新聞很快會變成一條淺薄可笑的「娛樂八卦」。宋菁穎會變成一個「輕佻」、「花心」又「勢利眼」的劈腿者，我所寫的〈靈魂的擁抱〉則變成了一個笑話。大眾無窮無盡的窺視、八卦慾很快淹沒宋菁穎對彭立中所有的「性騷擾」指控。（《靈魂擁抱》，頁 247）

因爲彭立中對媒體的說法是自己身爲宋菁穎的舊愛，而俞培文則是宋菁穎劈腿的新歡，他的行為絕非性騷擾。偏偏媒體報導又常是簡化的二分法（對／錯、真／假），因此如果俞培文真的和宋菁穎公開戀情，那麼新聞報導就極可能傾向彭立中所言全是事實了。那麼宋菁穎要如何面對報紙上的緋聞？又怎麼對彭立中的說法在委員會上提出反駁呢？

由於宋菁穎告彭立中性騷擾的事已經變成了熱門新聞，別的媒體一直拿來當頭條，宋菁穎所屬的電視台也勢必不能避開播報這條新聞了。

這樣播報時，她忽然覺得一陣說不上來的荒謬湧了上來。她現在在幹什麼呢？她又是誰？是新聞報導裡那個長期受到騷擾的宋菁穎嗎？還是這個故作客觀冷靜的新聞主播宋菁穎？那個宋菁穎是這個宋菁穎嗎？如果是的話，她怎麼能夠忍受這個宋菁穎事不關己的態度和表情？如果不是的話，這個宋菁穎又是什麼呢？是讀稿機？還是另一個本位主義、事不關己、怕事推託的「共謀」？（《靈魂擁抱》，頁 282）

這時的宋菁穎陷入了兩難，因爲她被媒體分派到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一個是弱勢的受害者，另一個是客觀、中立的新聞主播。如果她選擇逃避自己播報這則新聞，那麼她的專業形象就會被大打折扣，掉入社會對女性的一種較情緒化的

歧視框架。但是當她硬著頭皮坐上了主播台播報性騷擾案時，她又覺得自己變成冷血殘酷、恬不知恥，在看戲的人了，好像自己也加入了凌虐「被害者的宋菁穎」的共犯行列。這裡正突顯出宋菁穎在媒體體制中的角色轉換是有其困難之處。

身為媒體人的宋菁穎當然嫻熟媒體的操作，爲了絕地大反攻，扭轉自己在性騷擾案中的劣勢，她選擇召開記者會。記者會一開始，本來還有幾個記者交頭接耳地竊竊私語，不過當大家拿到宋菁穎的「診斷證明」時，現場忽然安靜下來，裡面寫著「處女膜完整，未遭受破壞」。以這份報告證明她和彭立中不可能存在所謂「超出普通友誼」，也證明了彭立中的說詞全是惡意的謊言。

這裡再次印證了媒體報導中的簡化的二分法，只要能證明彭立中的一句話是謊言，那麼他就會被歸爲說謊的一方，接著他所有的說詞皆不可採信了。宋菁穎把自己的隱私公諸世人，無疑是要讓彭立中一招斃命，因爲在社會大眾的認知裡，一個女性是不會拿自己的貞操來開玩笑的。

俞培文走過來拉著宋菁穎的手，向大家介紹說：「我要向大家介紹我的好朋友，V T V晚間新聞的宋菁穎主播。她今天特別來為『靈魂擁抱』這個活動站台，從早上十點到十二點鐘，歡迎所有的朋友也和我好朋友宋菁穎小姐『靈魂擁抱』。」

說完轉身相向，開始熱情地「靈魂擁抱」。一時鎂光燈閃爍個不停，群眾都給他們拍手。……

「因為俞大哥是我的偶像啊，他『靈魂擁抱』的想法我很贊成。這個世界有太多的誤解與隔閡了，我相信人與人之間只要願意，一定能夠去除掉這些障礙，彼此真心擁抱。」（《靈魂擁抱》，頁 493）

宋菁穎成功地繼續扮演媒體所分派的角色——專業的新聞主播，她化解了彭立中給她帶來的危機，並且極力撇清和俞培文有任何男女的曖昧關係，以免她專業的形象會被緋聞、八卦所淹沒。她還選擇力挺俞培文的「靈魂擁抱」活動，一

方面好證明自己當初和俞培文被拍到的是種心靈對心靈的擁抱，另一方面也藉由參與這樣的公益活動來讓自身形象更正面。當鎂光燈閃爍個不停時，她已完全進入媒體所設定的「宋菁穎」角色中。

不管是俞培文或宋菁穎，人在媒體的制度化中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人，而是被歸類化的「角色」，並要求人的行為必須依其「角色」的概念範疇，有一定的行為表現模式。人類需要一種可掌握的預期，否則心理上會產生焦慮、恐懼，而媒體的「角色派定」正好滿足此一需求，它讓個人的行為在約定的範疇中，變得可預期、可計算，有相當程度的保證與規則化。

第五章 侯文詠小說中對體制的批判

筆者在前面已分別探討了侯文詠三本長篇小說中，對醫院體制、教育體制、媒體體制的論述，也點出了在這些體制當中有何缺失。接著在這一章當中，將要歸納這些論述，進一步探究侯文詠是怎樣解讀「體制」本身，並加以批判的？本章共分爲四節，首先是以侯文詠在其小說中的角度去省思社會體制；第二節則要討論因爲從醫而看慣生老病死的侯文詠，在小說中是如何以「死亡」來衝擊這個體制？第三節則是由侯文詠在文本中的自我投射，來探究這樣的體制批判與其個人經歷有何關聯性？最後一節再從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懷，來看侯文詠如何以其長篇小說來影響體制？

第一節 社會體制的反思

侯文詠在他的自傳性散文《我的天才夢》中寫到：

我們所賴以成長的這個理性的進步文明，必須靠著競爭與比較做為原動力，因此，我們從小在這樣的教養之下長大，內化了這樣的文明慣性，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不斷地和別人比較效率、物質與成就的累積……的習慣。久而久之，人不知不覺地依賴這樣的參考座標，理解自己在這個社會相對性的存在。（《我的天才夢》，頁 178）

從《白色巨塔》、《危險心靈》，一直到《靈魂擁抱》，筆者認爲侯文詠對人被不同的制度所桎梏是不以爲然的。這些制度都是所謂理性的進步文明下的產物，其本質都含有一種競爭性與比較性，導致在制度內的人們得經由不斷地和別人比較效率、物質與成就的累積，這樣以外控社會資源的多寡來界定自己在社會的存

在價值。人喪失了自身獨立存在的絕對價值，而淪落為制度所構成的座標當中，一個相對的點。

侯文詠曾提到生長在社會的主流價值之中，是很難從很小就知道要掙脫，因為社會不允許、文化不允許，社會又沒有次文化可以支持。布赫迪厄認為：

主流文化就是宰制階級的文化，宰制階級藉由長期的合法化工作，使人忘記其文化原本也只是任意的一個文化。⁹³

人這輩子都要在生下來的主流價值和自己心裡的渴望價值中求平衡，有時我們屈從主流價值不是因為這主流價值太強，而是我們恐懼或是不想，或是習慣主流價值框在那裡。⁹⁴而筆者以為制度正是侯文詠所說的主流價值下的產物，在不同文本中的主角蘇怡華、謝政傑、俞培文，他們都曾試著與這樣的主流價值做拔河。但這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這種主流價值觀的建立，往往牽涉到利益的鬥爭。

95

此外，正由於透過各種機制，把特殊利益轉化為公共利益，像法律的規範化力量，因此體制的「普遍化」效果也不易被改變。⁹⁶而筆者認為，侯文詠是企圖在其長篇小說中，把看似為了公共利益所設定的種種規範，一一加以剖析、反思。

在《白色巨塔》的醫院體制當中，主角蘇怡華順利當上了外科主任，看似功成名就的他，結局卻是在不可自制地掩面啜泣。因為一路走來都身不由己的他，終究逃不開制度這美麗的牢籠，只能繼續費勁地演著這場權力與榮耀的人生大戲，因此對於自己在體制內所謂的成功，充滿了無限感傷。

而在《危險心靈》的教育體制當中，主角謝政傑從一個無奈卻認命的國三生，演變到後來開始衝撞這個體制，並引發了一場要求改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一開

⁹³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2002年初版），頁125。

⁹⁴黃慧娟，〈有問題的生命就有趣，就精采——侯文詠的天才夢〉參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editorial/author.php?id=2002070101&encoding=C>

⁹⁵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41。

⁹⁶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61—62。

始對台灣教育不滿的群眾聲勢浩大，看似可以撼動這個僵化的教育環境，但後來結局卻是抗爭活動被鎮壓、官員官腔的敷衍、謝政傑受傷變得抑鬱沉默，甚至一個人坐在河邊足足哭了一個多小時，只因為他在這體制內感到很深的無力感。

最後在《靈魂擁抱》的媒體體制當中，主角俞培文一開始迷失於名氣當中，冒用了書迷王郁萍的文章，後來又急於掩飾真相，努力要扮演著鏡頭前的完美形象。最終，在面對王郁萍臨終時，一個真正的靈魂擁抱觸動了他內心最底層，厭倦自己在體制內戴著的虛假面具，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悲痛，巨大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哀傷，就這樣放聲痛哭了起來。

蘇怡華、謝政傑、俞培文在不同的體制內接受著「社會化」。所謂的「社會化」是指所有那些讓個人去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以及一個社會或集體的規範、價值、信仰等所需的機制。⁹⁷

筆者從上述三本長篇小說的情節與結局安排，可以推論出侯文詠是反體制的。他藉由文學呈現、批判、反省了體制對人性的壓迫、扭曲和疏離，因此在文本中的主角永遠是焦慮、不快樂的，因為在體制中，一旦拒絕服從通常需要付出相當代價，但即便是達到了體制內所認可的成功也一樣感到無奈，只因為「體制」的本質就是問題的所在。因此侯文詠總是透過作品中的反諷，隱晦地傳遞他對體制的極度厭惡。

第二節 死亡對體制的衝擊

「死亡」這個主題在侯文詠的三本長篇小說中佔有很重要的關鍵，它往往衝擊到主角的制式化生活，讓原本深陷制度中，被制約的思考，能夠跳脫出來看待自己人生真正的意義。因此，「死亡」可說帶給了主角本質上的化學變化，而且小說中最具戲劇震撼力、情節轉折力的便是死亡一事。這和侯文詠本身從小對死

⁹⁷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 98。

亡的敏銳體會有相當大的關聯，在他小時候，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龍驟逝，這對他是很大的衝擊，那種不確定的感覺使他甚至到了半夜還睡不著，追問父母親該怎麼辦？

侯文詠曾形容過對「死亡」的感受：

它們像是無底的深淵，無邊無際。又像是排山倒海而來的鬼魂，緊緊地抓住不放，叫你無所遁逃、無法喘息。（《我的天才夢》，頁 116）

你仍可以感受到它們蟄伏在四周，伺機而動。每當你面對親友的死亡、疾病、離別、成敗、起伏，甚至是意外落海，種種無法掌控的什麼時……那些世事難料的不確定感立刻蜂擁而至。（《我的天才夢》，頁 117）

從這些文字可以看出，侯文詠對死亡是有很強烈的不安，它是一個活生生的存在，而且神出鬼沒，沒有人能抵抗的了。所以即便再怎樣堅不可破的體制，一旦面對死亡，也變得脆弱不堪，甚至是可笑。從醫後的侯文詠站在面對死亡的第一線，變得更加理解到這個道理：

我曾用著多麼仰慕的神情看著老教授，渴望擁有知識與專業，並把一切的苦難都踩在腳下。可是隨著歲月流逝，我理解到那只是某種一廂情願的假設罷了。知識與專業往往不是疾病與死亡的好對手。（《我的天才夢》，頁 68）

人創造出不同的體制，看似能操縱一切，使一切變得可預期，但唯獨對「死亡」是無法掌控的，而這個變數也就在三本小說中投下一顆顆的震撼彈，讓主角有了不同的體認與省思。因為在人的生存之中，只有通過死亡，生命才得以認識

到自己的形式。⁹⁸

一、《白色巨塔》的陳寬死亡衝擊

侯文詠巧妙安排醫生變成病人，《白色巨塔》中的陳庭如火如荼地舉發邱慶成紅包弊案時，兒子醫生陳寬卻罹患胃癌，年輕的他，面對生命的有限與無常，有許多領悟與感慨。

「生命中，有很多想說的話，想做的事，如果不馬上說，馬上做，很快就來不及了，」（《白色巨塔》，頁 315。）

生命的長短不是個人可控制的，人對於「死亡」往往抱持著一種駝鳥的心態。就像侯文詠小時候在恐懼死亡這件事時，他的母親只是抱著他，安慰他說：「不要亂想，去睡覺吧，睡醒了就好了。」（《我的天才夢》，頁 117。）它變成一個禁忌，大家總認為只要不聽、不看、不討論，就可以不用去面對。因此人刻意不去意識到生命將有終止的一天，而把很多該說、該做的事都一拖再拖，反正認定自己還有無數個「明天」可以揮霍。陳寬也是如此，所以在面對生命的終點時，他才驚覺到有許多話、許多事，如果沒有馬上說、馬上做，是會有「來不及」的一天。

「看著他搖搖晃晃坐上計程車，我忽然覺得非常害怕，不曉得為什麼……好像看到我們的生命，就這樣白白地糟蹋掉了。」（《白色巨塔》，頁 319）

蘇怡華陪著罹癌的陳寬去藉酒澆愁，想要用酒精麻痺這一切，但即使兩人狂歌、大笑，依舊掩飾不了對死亡的恐懼、不安。如果今天不是陳寬罹癌了，那麼

⁹⁸ 靳鳳林，《死，而後生：死亡現象學視閥中的生存倫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初版），頁 79。

這一晚一定再平常不過了，也許接下來是去酒家續攤，在脂粉味中尋歡作樂。但此刻的「死亡」壓力，讓他們不得不清醒，清清楚楚的審視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荒唐。如此當頭棒喝，儘管蘇怡華不是當事人，也害怕自己終將重蹈覆轍。

「想清楚了，人生實在沒有那麼多好怕的。如果再重來一次，我一定儘量按照自己的意思，更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內心的渴望……」（《白色巨塔》，頁 380）

人在一出生，就被迫要面對許多人為的制度，這些制度不給任何理由、沒有討論的空間，就像許多遊戲、運動規則一樣，只有遵循的份，這是一種集體的潛意識。大家只能依照各種制度，努力去達成它的要求，以獲取整個社會的認同與自身的安全感。不太有人敢在制度內越界，深怕一不小心自己就被判出局。但陳寬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此刻死亡的恐懼勝過一切，那種害怕違反各項制度的小心翼翼，也變得很可笑。他回過頭來看，只能遺憾沒有按照自己的意思過人生，反而是被無形的社會制度操控著。

「對不起，」陳寬顫抖地張開雙手，「你還願意擁抱我嗎？」蘇怡華把照片放在床頭櫃上，緩緩地上前一步。他激動地看著陳寬，終於衝過去床前和他擁抱。陳寬緊緊抱著蘇怡華，熱淚盈眶。「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好好地做朋友了……」他說。（《白色巨塔》，頁 381）

陳寬表面上和蘇怡華是朋友關係，但卻聽從了父親的意思，偷拍了蘇怡華被性招待時的春宮照片，好作為以後當有利益衝突時，對付蘇怡華的籌碼。不過生命的無常讓陳寬拋棄了在制度內的名利追逐、爾虞我詐，重新認識友誼的可貴。陳寬把照片和底片都交了出來，渴望對方的原諒，希望在生命的終點可以真實擁抱一份友情。

親愛的孩子，當你聽到這捲錄音的時候，你已經十七歲了。爸爸可以想像你長得又高又壯的樣子。十七歲實在是很美好的時光。爸爸常回想自己十七歲的時候，最後悔的事，莫過於沒有好好去玩了。現在想想，覺得很好笑。那時候，爸爸對人生充滿了害怕。好怕稍不注意，功課就輸給別人了；好怕如果不够努力，就永遠追不上別人；好怕……（《白色巨塔》，頁 395）

陳寬知道自己將沒辦法看著小孩長大，身為父親的他，內心自然很愧疚、遺憾，尤其醫生的職業讓他以前也很少時間能陪伴家人。所以他選擇用錄音帶錄下每年生日時送給小孩一些話和鼓勵，讓小孩想起他時，可以重複聽著，感覺爸爸彷彿一直陪伴在身邊。陳寬在這段對小孩未來十七歲時的談話，其實正說出了在他面對死亡時，內心的獨白，與其說是給小孩聽，又何嘗不是講給自己聽呢？要考上醫學系在台灣不是件簡單的事，十七歲的陳寬正值高中，當然是成天埋首書堆，每天就為了追求更高的分數，在這個升學制度下，要時時刻刻確定自己領先同儕，深怕一不小心就落後別人。

侯文詠曾寫到自己高三時的情況：「高中最後的一年，我停掉了所有的課外活動。我不再寫東西，不再在班上主動發言，或談論任何和考試不相干的事。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七月的大考離我愈來愈近，我專心啃書換取分數，想盡辦法爭取在有用世界裡面最難取得的資源，競爭大家千方百計搶奪的名次，以及那個名次所能優先分配的權益。」（《我的天才夢》，頁 37。）

這或許也是陳寬十七歲時的生活寫照，但此刻站在死亡之門前的他，回顧年少時光，才驚覺自己當初那種「害怕功課輸人」的心態是多麼可笑，人生苦短，為何自己沒有把握年少時光好好去玩？就像侯文詠考上醫學系時的心情：「我有點感傷，覺得很不划算。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時候，我想起我失去的青春年少再也回不來了。」（《我的天才夢》，頁 38）

他們把那張副教授的聘書當著陳寬的棺柩前，點著了火，讓聘書在空氣中熊熊地燃燒。陳庭看著那陣火光，無奈地笑了起來。「我們陳家，總算有人當上了教授……」他的聲音變得哽咽，說著說著，竟無法自制地號啕起來。「陳醫師。」蘇怡華站在一旁，機警地上前去扶他。「我很好，」陳庭甩開了蘇怡華，他的哭聲詭譎地變成了無奈的狂笑，「哈哈……費盡心機，總算當了教授……」（《白色巨塔》，頁 396）

在社會制度的價值判斷中，不管學歷或聘書都是一種身份的標誌，它往往可以決定你在社會中哪個階級？可以擁有多少權力？得到多少金錢？因此雖然只是一張紙，但陳庭和陳寬父子倆卻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得到，甚至是出賣朋友或收買有影響力的人。最後費盡心機，陳庭終於看到兒子擁有了這張可以光耀門楣的副教授聘書，但諷刺的是只能把它燒給死去的陳寬，一切的名利追逐在此刻也被熊熊燃燒，毫無意義了，最後陳庭那無奈的狂笑可說是在笑自己被這制度玩弄至此吧！

二、《危險心靈》的沈韋死亡衝擊

沈韋是一個國中三年級的青少年，在家長眼中是個乖巧、功課好的孩子，最後卻因為受不了沉重的課業壓力，而選擇了跳樓自殺。他在自殺的當天下午，有去因為謝政傑事件而引發的抗爭現場，唱了一首「阮若打開心內的窗」，並且表達了他對台灣教育的失望：

小時候，我好想背著大大的書包去上學。我以為我會在學校學習思考、體會、尊重、分享，好讓我更懂得享受生命所賦予我的一切，更懂得熱愛這個世界。直到我開始上學之後，我才明白我想錯了。他們說，教育就是競技場，而讀書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爭奪戰，為了保持領先，我們放棄了思考、體會、尊重、分享，開始學習平庸、冷漠、虛偽、貪婪……」（《危險

心靈》，頁 283)

在這樣極度失望下，自殺是對這教育制度的最大指控，因為孩子的死亡往往才能激起大人的反省，否則都會被視為一種無關緊要的抱怨。

弔祭完畢，正要離開前，沈韋媽媽忽然上前來，用著那張哀慟過度的臉疲倦地問我：「你為什麼要說那些話？為什麼要做那些事？」我有點手足無措，不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問。她眼神空空洞洞的，看著我，又好像什麼都沒有看到樣子。「你為什麼為什麼要喚醒他，叫他承受這些他承受不了痛苦？」我想我知道她要說什麼了。（《危險心靈》，頁 304。）

學生父母的「好」孩子往往是依據社會價值來認定，一個家長可能無法欣賞自己的孩子有獨立性格，充滿正義感，具有審美能力，但功課卻落後於同儕。只因為那不符合社會主流的價值。就在這樣的體制中，家長只希望孩子努力讀書，不要去想為何讀書，更遑論去質疑這制度。面對喪子之痛的母親，理所當然的責備眼前的小傑，認為他不該喚醒沈偉的自覺。但她卻沒想到，沈偉的死，其實是制度殺人。

我用一種幾乎是控訴的語氣對鏡頭說著：「為什麼每次發生這種悲劇時，我們只會追問這個同學個人發生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從來沒有人問我們的社會、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只會問我們小孩有沒有好好努力讀書，用功讀書？卻從來不問，教育可曾給小孩子帶來快樂、希望？照這樣下去，這個只讓我們學會了競爭、學會了恐懼的教育體系，將來還會逼死更多孩子的，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危險心靈》，頁 305）

一個學生的自殺，引起新聞的重視。但小傑痛恨面對這悲劇時，大家卻治標

不治本的去探討個人因素，而忽略這個教育體系的根本問題。沈偉的死對整個抗爭活動投下一顆震撼彈，大家憤怒的情緒傳染病似地爆發開來，湧入更多抗議人潮。一個孩子不願懵懵懂懂的長大，選擇以死亡換來大家的反省，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比生命更可貴了，「救救我們的孩子！」成了群眾大聲吶喊的口號，因為不想再有小孩成為這種教育體制下的犧牲者了。

三、《靈魂擁抱》的王郁萍死亡衝擊

原本俞培文只擔心自己在文壇是否會身敗名裂，所以想盡辦法要拿到〈靈魂的擁抱〉手稿，根本不管罹癌的王郁萍是死是活。但最後在陪伴王郁萍臨終前的那段日子，俞培文終於瞭解了王郁萍的心：

我甚至沒有想到過再也要不回來的〈靈魂的擁抱〉手稿，也沒有想過我之後的處境。我只是專注地抱著她。天光漸漸變亮了。我可以感覺到她的靈魂——那個彷彿比整個世界還要重，但卻又比她的身體還要輕的重量，就在我的擁抱裡，被我抱住，然後帶著微笑，慢慢地消失了。靜極了。在那陣靜默裡，我想起我人生似乎已經好久不曾擁有一個像這樣的靈魂擁抱了。這樣想時，我忽然感覺到一股莫名的悲痛，巨大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哀傷，我就這樣無可抑遏地在病房放聲痛哭了起來。（《靈魂擁抱》，頁 532）

王郁萍渴望從俞培文身上得到一種溫暖與靈魂的特質，好當成活在這個虛假世界裡的最後希望與救贖。也許她是很瘋狂，但至少是很真實的追求自己所喜歡的，所以在她彌留之前的要求——「真正的靈魂擁抱」終究觸動了俞培文的心。

在媒體塑造的完美作家形象之下，俞培文總是要戴上不同的面具和不同的人相處，久而久之，或許連他也感受不到自己的真心。而在這個死亡的時刻，不需要任何虛情假意，一個對他掏心掏肺的書迷，一個靈魂的擁抱，打碎了他所有的虛假面具，那種百感交集，讓他放聲痛哭了起來。俞培文的哭泣不單是爲了王郁

萍的死，更多是為他自己在這社會體制下，如同行屍走肉般被操控而感到巨大的哀傷。

小說中的王郁萍是最先出現的角色，藉由她來看俞培文這個作家。為什麼她極端的愛戀他？又期望俞培文為她完成什麼？我一開始就預約了王郁萍的死亡，我希望最後是從『生命』這個角度來看俞培文。如果不這樣做，王郁萍很有可能到了三、四十歲時，會認為那是年輕時做的傻事。但放到死亡這樣極端的事件中，到最後所有的辯證會回到死亡和生命的關係，從這樣的位置來思考為什麼會如此愛戀一個人或恨一個人！⁹⁹

因為王郁萍得了肺癌末期，面對生命隨時都會結束，她才會有一種急迫性，希望自己能透過寫作來讓人們明白生命的價值，並藉此使自己短暫的生命也有了價值。〈靈魂的擁抱〉就是在她生病住院時所得到的靈感，並且想像自己變成了屍體，有人抱著她痛哭，省悟到人生的真諦。

這些都是死亡壓力對她的生命產生的影響，她把人生最後的願望都寄託在俞培文身上，希望對於這個世界的遺憾與渴望都投射在一個所崇拜的對象。換個角度想，如果王郁萍是個身體健康的人，也許她就只是個從國中起，喜歡閱讀俞培文散文的一般書迷而已。所以，王郁萍對俞培文的極端愛戀，其實只是她想在死前，經由「擁抱」一個完美的人，來改變對這個世界所有的不滿與遺憾。

萬俊人在〈生死有結無了時〉寫到：

一個人的死，首先當然是意味著他或者她的生命（生活）的結束，可是他或者她的死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許許多多的人和事……人之死常

⁹⁹侯文詠，〈侯文詠談寫《靈魂擁抱》創作過程〉《侯文詠官方網站》，參閱：
<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wen-1-talk.htm>

常會把死者的個人事件變為生者的公共事件，……¹⁰⁰

從陳寬的死、沈韋的死，一直到王郁萍的死，套用侯文詠的話稍作改變，筆者認為侯文詠在文本中總是把體制問題放到死亡這樣極端的事件中，到最後所有的辯證會回到死亡和生命以及體制的關係。而當任何體制用死亡事件去審視時，都會顯得微不足道。

第三節 作者在文本中的自我投射

筆者觀察到《白色巨塔》中的主角蘇怡華跟侯文詠同樣是醫生的身份，而在《危險心靈》中的主角謝政傑，他那種古靈精怪活脫脫是侯文詠小時候的翻版，最後在《靈魂擁抱》中的主角俞培文則和侯文詠一樣是個暢銷作家。這樣的情形不能說是巧合，應是侯文詠有意識的刻意安排或無意識的心理內容。筆者這樣的看法和張淵盛不謀而合，他以為：

自小在台灣只重視升學考試的教育體制，以及長大後在醫療體系所感受到對自由心靈的桎梏，是侯文詠文學生命裡最大的壓抑根源。因此，教育與醫學體系中所加諸於人性的扭曲及種種荒謬現象，成為侯文詠反覆書寫的主題。¹⁰¹

這些主角都是侯文詠的一種心靈投射，呈現他身處在不同體制內的反抗及質疑，並將他各種意識傾向以角色的塑造使其人格化。關於這點，侯文詠自己也曾提到：蘇怡華當然有我的烙印。¹⁰²筆者認為不單是蘇怡華，連謝政傑、俞培文也

¹⁰⁰靳鳳林，《死，而後生：死亡現象學視閥中的生存倫理》，頁7—8。

¹⁰¹張淵盛，〈從精神分析觀點解讀侯文詠短篇小說中的類型人物〉，頁125。

¹⁰²河西撰稿，〈侯文詠：搖擺在幽默與冷峻之間〉。

都有著侯文詠的明顯烙印。

有時即使在全知的觀點中使用第三人稱或在第一人稱的敘述中對主人翁使用了「他／她」，仍可顯示出作者的自我寄託。最有名的例子就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的一句名言“La Bovary, c’ est moi !”（包法利夫人，是我！）這句話說明了在寫作的過程中，福樓拜認同了包法利夫人。¹⁰³

侯文詠間接透過蘇怡華，讓讀者看到他身處醫院體制中，觀察到的種種怪象與問題，而蘇怡華在《白色巨塔》中一路上的選擇和無奈，又何嘗不是侯文詠的心路歷程？《危險心靈》中的謝政傑也是侯文詠的化身，他代替了侯文詠對台灣的教育體制發出怒吼，甚至是對抗那些強加在學生身上的諸多不合理。《靈魂擁抱》中的俞培文在傳播媒體的炒作下擁有了名氣，但也因此必須做出符合社會期望的相對要求，這其中的無奈與迷失，不正是在文壇一炮而紅的侯文詠所面臨的處境嗎？

文學做為一種主觀的創造正如人生是一種主觀的過程。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是一個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參與的態度縱有積極消極的差別，其為參與則一。在參與時自然會發生種種可喜可悲的遭遇，而引致極大的情緒上的波動；這種波動的過程就是一個人生命的過程。人的內在情緒波動的張力，我以為就是當代最能觸動作者心靈的重要主題。一個作者不只在描寫這種張力，而也在體驗這種張力，借著一枝筆，泯除了人我以及過去與現在的隔閡，直接生活在情緒的波動中，為所創造的人物之喜而喜，為所創造的人物之悲而悲，到了作者與所創造的人物不可分離的地步。因此，就創作的過程而言，一個作者對所創造的對象，恰如一個演員對所扮演的

¹⁰³馬森，〈文學的魅惑：馬森文論六集〉（台北：麥田，2002年初版），頁75。

蘇怡華、謝政傑、俞培文是侯文詠不同的面相，這些分身扮演著侯文詠在醫院、教育、媒體的體制中所遇到的問題。像《白色巨塔》中的蘇怡華透過了內科主任徐大明的請託，因而參與了總統醫療團隊的工作，進而了解到許多內幕。總統女兒的入院開刀，使得一個單純的醫療事件變成了鬥爭的場所，就算犧牲了病人的權益也在所不惜，毫無醫德可言。筆者認為這樣詳實的經歷跟侯文詠事實上真的曾被指派參與總統醫療小組的工作脫不了關係。（《我的天才夢》，頁 85）後來蘇怡華在教師升等評議會上爲了陳寬的發言，也正是侯文詠曾有過的感嘆。

李教授翻著陳寬的申請資料，慢條斯理地問：

「陳醫師是第一次提副教授升等嗎？」

唐國泰想了一下，被蘇怡華搶先。

「第一次。」

「嗯，」李教授想了一下，「如果第一次申請就通過，未免太順利了吧？」

「升等應該考量的是資歷和成績吧？你看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就有二十八歲的教授。」蘇怡華表示。

「如果我沒有記錯，當年我的副教授升等是提了三次之後才通過的。」李教授表示。

「年輕人升等那麼快，一下子就升到教授了，以後我還叫得動誰做事？」

唐國泰若有感觸地附和著。（《白色巨塔》，頁 195—196）

現實中，侯文詠的副教授升等也曾因爲教育部修定大學法的實施細節，而產生了挫折，因爲他所在的大學傾向採用新辦法中的高標準認定。許多權益相關的講師自然會去遊說所認識的校務委員，但這過程中，侯文詠感受到一股看不見的

¹⁰⁴馬森，《文學的魅惑：馬森文論六集》，頁 24。

阻力。

有些教授不知道我是權益相關人，在別的遊說者離去後，當著我的面冷冷地說：「年輕人一下子念完博士就是副教授，再沒兩三年一個個成了教授，我們這些老頭子找誰做事？」

也有一些教授直截了當地拒絕，不耐煩地斥責著：「年輕人慢慢爬嘛，那麼急幹什麼呢？」（《我的天才夢》，頁 185—186）

這裡看到那種既得利益者的嘴臉，因為自身已經得到利益的好處和甜頭，就完全不顧別人的權益與所付出的心血。還有那種舊官僚中以上壓下的氣息，讓那些在體制中低階層的人，不由得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

另外，筆者推斷由於《白色巨塔》反映出太多侯文詠自身處在這體制內所看到的黑幕，像是掩蓋醫療疏失、搶病人、收紅包、勾結藥商等，因此在出版時，台大醫院高層對這本書很感冒，對外表明要對侯文詠保留法律追訴權。侯文詠說：「這是很奇怪的事情，怎麼可能去對一本小說保留法律追訴權呢？」台大高層當時做了很多動作，還包括停止他在台大的兼任教職。¹⁰⁵所以雖然王浩威在《白色巨塔》的導讀中提到「這絕對不是一本揭發隱私的真相小說，沒有所謂的對號入座。」¹⁰⁶但筆者以為從台大醫院對此書有那麼大的反應來看，小說中所提及的人物、情節的真實性，侯文詠和讀者之間早已是心照不宣了。

在《白色巨塔》中蘇怡華曾帶著關欣去行天宮拜拜，他向同樣身為醫生的關欣說著自己在搶救病人時的感觸：

妳會不會覺得，常常妳搞不清楚，為什麼到最後這些人死了？而那些人活了？儘管大家對妳期望深重，儘管妳每次都竭盡全力，可是最後發現，往

¹⁰⁵張葆蘿，〈侯文詠—孤獨寫作 默默點火〉，《書香遠傳》第 54 期，2007 年 11 月，頁 43。

¹⁰⁶王浩威，〈白色巨塔導讀〉，《白色巨塔》，頁 7。

往妳能控制的部分很有限……（《白色巨塔》，頁 173）

雖然自己是醫師，受到病人的完全信賴，但這樣不安的氣氛不時存在著，這也同樣呼應了侯文詠自己在從醫過程中所體會到的：

我曾經在一個禮拜之內有七、八次急救的經驗。當一切的努力都做過了，到了最後的時刻，整個醫療團隊望著我，問我是否再做一次電擊。儘管我總是表現得堅毅而有決心，可是老實說，我並不真的知道，再一次的電擊之後，為什麼這個人會復甦，那個人卻死了？（《我的天才夢》，頁 55）

所以蘇怡華和侯文詠有了同樣的認知：很多時候，病人的死活與其說操在醫生的手裡，還不如說操在命運的手裡。而這樣的認知對於受了這麼久的醫學教育的人來說，自然不好受，也很諷刺。他們理當相信科學，但卻往往在內心用禱告的誠意來治療病人。侯文詠寫到：我變成了主治醫師之後更是落入了這樣的處境了。儘管我的位置很虛榮地代表了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可是知識與經驗是那麼地有限，苦痛與無知卻是永遠地無邊無際。（《我的天才夢》，頁 55）這樣的體認是深刻而謙卑的，醫學不是萬能的，面對人生的生、老、病、死，種種的苦痛與無知，任何知識與經驗的累積其背後都是有所局限。

而《白色巨塔》中的蘇怡華在結局中，風光的娶了院長千金，順利當上了外科主任，並開始享有這些頭銜下的權力、金錢，表面上看似風光，彷彿站在世界的頂端，但最後的描寫卻是在掩面痛哭。如此的反差也正是侯文詠自身的感慨，而不願重蹈覆轍：

我體會到，不管我變成了主治醫生、博士、作家、教授……再多的頭銜，如果它們並不指向更深刻與愉悅的生命，那麼這一切，只不過是順應某種虛浮的價值所累積出來的廢墟罷了。（《我的天才夢》，頁 93）

另外，侯文詠也曾寫到自己在教育體制中所遭到的許多荼毒，像是體罰即是一例。

我記得一進國中，班費裡面就有一項是買藤條送給各主要科目的任教老師。藤條本來是農家用來打牛的器具，非常有彈性，打起來特別痛。通常只要打一下屁股就會出現瘀青，一旦打二下以上，鞭痕重疊的部分立刻皮開肉裂。歷史上說到明朝的廷杖打得人鮮血直流，我有些朋友認為文字誇張，怎麼可能？！我心想，這些在愛的教育之下成長的人真是不知民間疾苦。拜時代之賜，那種場面我在國中時代不但眼見，更是親身領教過了。
(《我的天才夢》，頁 21)

這裡特別提到，藤條是用班費買的，代表這體罰不單單是老師的意思，也是家長所贊同的，甚至願意出錢來讓老師來買藤條處罰自己的孩子。接著說明藤條是專門送給主科老師，其道理顯而易懂，這個體罰主要不是為了糾正學生的品性，而是為了成績。在學校，一般所謂的主科就是聯考要考的科目，國文、英文、數學尤其更為重要，因為它們佔的分數比重較多，所以藤條變成了主科老師促使學生得高分的最佳工具。侯文詠還指出藤條原本是農家用來打牛的器具，這弦外之音正是暗示如此的體罰無疑把學生當成有奴性的牛看待。學生被打到瘀青，甚至是皮開肉裂，一切只為了分數，這樣扭曲的教育方式卻行之有年。

被打的壓力是全民性的。成績好的同學有好的打法，成績不好有不好的打法。碰到嚴格一點的老師，每個同學依照資質優劣程度各有不同最低標準分，低於標準分以下就得挨打。(《我的天才夢》，頁 21—22)

侯文詠寫出了這種被打是不分成績好壞的，其目的性就是要把學生訓練成考

試機器，並且是考滿分的機器。所以成績不好的把你打到成績好，而成績原本就好的，則是要把你打到考滿分。學生因此逐漸失去了主動且多方面思考問題的能力，因為他被迫對於考卷要立即有標準答案的反應。所以侯文詠曾感慨的寫到：

我們活在一個以答案為中心的文明裡。問題似乎只是為了顯耀答案而存在的配角。我們先有了標準答案，再創造出附和答案的問題。這樣的文明使得思考的方向顛倒，教育變成了一種標準答案的自我繁衍體系。久而久之，標準答案變成了一種非存在不行的必要。整個社會不再有能力問為什麼或者是發出質疑，傾全力投入對現成答案的追逐。（《我的天才夢》，頁205）

台灣的考試很愛考選擇題，因為它很容易閱卷，不管是四選一或五選一，它都有一個不容質疑的標準答案。這樣僵化的考試方式，要如何讓學生有自己的想法和創造力呢？侯文詠曾經對這樣永遠以「標準答案」為準則的教育有一番批判：

在找答案的教育裡，學生一旦得到「標準答案」，思考也就停止了。這樣的教育格局，知識是封閉的。封閉的知識，就算擁有一百分的高分，能達到的頂點，最多只是上一代知道的一切。（《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頁110）

光知道上一代的知識是不夠的，侯文詠對如此的教育格局很不以為然，因為過去很重要的知識，到了現在往往都已被更新的知識所取代，因此以未來的角度來看此刻的「標準答案」也就不那麼絕對「標準」了。學生在追求「標準答案」的背後，事實上是在追求分數，而非一種真正的學習，對於這種只追求分數的學校教育，《危險心靈》中即透過導師和謝政傑的對話有深刻的觀察：

「站住，我可沒允許你進教室。」他把我的考卷丟給講桌前面的同學，「你告訴他，他考幾分。」

「七十六分。」

「七十六分你滿不滿意？」

我搖頭。

「別的同学也有人考四十分、五十分啊，你說，你考這麼好，我為什麼要生氣？」

我沈默地低下頭。這使得他很高興，提高了分貝再問：

「抬起頭，告訴我，我為什麼要生氣？」

我看見我的考卷從張瑜沿著馮德程往門口的方向傳了過來，每個人都看了我的考卷一眼。

「因為我成績退步了。」

「我把你趕出教室，難道是希望你成績退步嗎？」

「不是。」

「我為什麼那麼壞，不讓你進教室上課，嗯？」

「為了要刺激我。」

「對，我就是要刺激你。你不應該是這種程度的。可是我拚命地刺你，你有感覺嗎？你會痛嗎？」

我點點頭。

「你有感覺？我不相信。」班導不以為然地說：「既然有感覺，那為什麼考試的成績一次比一次退步？」

「因為，」我吞吞吐吐地說：「我不夠用功。」

「不對，那不是重點，」他用力搥了一下桌面，發出粗暴的聲音，「別敷衍我。你告訴大家，為什麼你的成績一次比一次退步？」

我大概知道標準答案了，可是我說不出口。

「為什麼？」他緊追不捨。

「因為……」

「因為什麼？」更用力地搥桌面，更粗暴的聲音。

「因為……我不知羞恥。」

「大聲一點！」他瘋狂地大叫著。

「因為我不知羞恥。」

碰，碰，碰，碰碰碰碰……賤女人、死孩子、下三濫。

我低下了頭，接過從門邊傳過來的考卷。我根本無心看考卷上的對錯或結果，我只是好恨我自己，竟說出了那樣的話。我真的一點都不知羞恥。（《危險心靈》，頁 41—43）

在這裡爲了考試成績，導師雖沒有像在侯文詠求學的年代時，用藤條把學生的屁股打得皮開肉綻，但那種摧毀尊嚴的語言暴力，卻是把學生的內心打得皮開肉綻。一個老師咄咄逼人，要學生在全班面前說自己不知羞恥，這比藤條的傷害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它傷害的是人性，跟教育的理想豈不背道而馳？侯文詠與謝政傑體會了不同時代的體罰，不管是肉體或心靈的處罰，卻都只是爲了追求更高的分數。

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中，追求分數成了老師教學的唯一目標，而學生也對這樣的價值觀逐漸內化¹⁰⁷了。高中上了第一志願的侯文詠曾有這樣的體驗：上了高中以後，就不再遇到打人的老師了。可是很奇怪，雖然說沒有人用藤條逼迫你的功課，你卻可以感覺到那種氣氛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來愈嚴重。（《我的天才夢》，頁30）聽話的學生不斷地鞭策自己以符合父母、師長的期待，將生命放置在一個極端扭曲的競爭體制裡。

學校文化是一個特殊的文化，即被轉變爲合法、客觀、不容置疑的宰制者文化。這個文化不但是任意的，帶有社會性質的，而且是篩選的結果，這種篩選決

¹⁰⁷內化是接受一組由人們或團體建立的行爲準則的接受過程，而這些人或團體能對個人產生影響。這種過程以學習行爲準則的內容開始，然後個人會經歷理解這套準則爲什麼有價值或有意義的過程，直到他們最終接受這套準則，作爲自己的觀點爲止，過程才結束。

定了何者為有價值的及傑出的，或相反的，何者為下流的及平庸的。¹⁰⁸

從筆者對侯文詠的訪談當中，可以體會到他對台灣教育體制是很有想法的，《危險心靈》只是一個開始，在後來出版的《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中更是對台灣的教育問題暢所欲言，他擔心我們這樣的教育制度最後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頁 14）想要讓大家逆向思考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是否有其他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學生應該「不乖」的另類看法，就是為了抵抗這樣的教育制度，反對學校灌輸學生不加思考就聽話、順從的態度。

事實上正是如此，從小當我們被師長說「不乖」的時候，通常都是想要自己作主或有自己想法的時候，但這往往也是不被允許的。我們一直被要求做師長眼中的「好學生」，一切都要依照師長給的答案和方式去做，「聽話」與「順從」也就無形中變成學生在學校的行為準則。這樣總是遵循著主流價值觀，表面上看似順利，但實際上落入一個僵化的窠臼，永遠無法創新、突破。因此侯文詠會警告著這樣教育方式的風險：一旦主流思考錯了，我們就再也萬劫不復了。（《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頁 14）

從侯文詠的自述及訪談中，可感受到他一直是一個對體制有所質疑，甚至於反抗的小孩，成長的歷程中，他遊走在老師眼中的好學生與壞學生的界線，而這正和謝政傑的形象不謀而合。

侯文詠從二十幾歲就因寫作小有名氣，而這名氣可以說是傳播媒體所賦予的。他的作品銷售量當然跟擁有的名氣成正比，並且使他能跨足到廣播、電視等不同的領域。但名氣不全然是好處，它像一把兩面刃的刀，今天把你捧上天，明天可能就把你摔得粉身碎骨，另外對生活也會造成困擾，因為將沒有個人隱私可言，大家會拿放大鏡看你的一舉一動，並且以高道德的標準來審視。無怪乎侯文詠曾感嘆的認為知名度簡直是抱在懷裡美麗又高貴的定時炸彈。（《我的天才夢》，頁 78）

¹⁰⁸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頁 145。

有一次，我接受了一個報紙採訪，隔天我在報紙上看到我的照片和那篇專訪。那篇報導興致勃勃地發現了一個不出世的年輕天才作家。這個作家幾歲就開始作文章，幾歲讀完了《紅樓夢》，幾歲讀完了《張愛玲全集》，他又是如何的天才地以高分輕易地考上醫學院，如何輕鬆地一面行醫、一面寫作……除了相片以及我的名字之外，我簡直無法辨認專訪裡面描述的那個人了。（《我的天才夢》，頁 80）

侯文詠從自身的經驗體悟到媒體是如何塑造形象，傳播媒體發展迅速，網路愈來愈普遍時，各類媒體不斷的增多，競爭也因此日益激烈，在此同時，民眾越來越依靠媒體採集各種訊息，這樣形成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結果，最後強化了媒體的輿論引導力量。媒體以其話語權對個人的形象進行種種塑造，而這塑造往往是出於某種利益需求。每到年終時，媒體的各種評選大戲都會輪番上演。不管是十大暢銷或是年度最受歡迎之類的評選，經過媒體之手，彷彿一頂桂冠般加在不同的人或產品之上。

這已成為時下許多媒體吸引目光的規定動作和生財之道。而那些被塑造形象的人及其作品在這種現象中，自然出現了許多不同程度的誤解和扭曲。這樣的誤解就像是《靈魂擁抱》中的王郁萍為了讓自己的網路創作〈靈魂的擁抱〉能吸引較多關注，因此冒用了作家俞培文的大名，而這正是侯文詠的親身體驗：

有一次有人透過出版社拿了一篇文章給我，據說這篇文章在網路上流傳廣佈，很受歡迎，希望我能授權讓他們收錄在書中。我一看，作者是我的名字，但文章根本不是我寫的。我好奇地在 Google 打上自己的名字，出來了幾十萬筆，結果我竟然發現有些文章根本就不是我寫的，而且大部分是

勵志小品，這些文章還被到處轉寄。¹⁰⁹

爲何那些作品要掛上俞培文或侯文詠的名字呢？答案顯而易見，就是因爲「名氣」。這個看似虛幻的東西卻有著點石成金的神奇效用，任何平凡無奇的作品，只要掛上名人的招牌也就變得不同凡響了，不過這樣的「名氣」是需要靠媒體不斷的炒作與塑造形象。

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換來這些熱情？我只是個平凡的人，有著一樣的生命限制無法超越。是我所寫的東西，讓他們覺得我和別人不同，因此我可能無視於這些限制嗎？或者我在各種媒體上的演出，符合了他們對於自己人生的某種期待？會不會那只是一種誤解？什麼時候那種誤解才能夠得到澄清？（《我的天才夢》，頁 89）

侯文詠對於自己被媒體所塑造出來的形象有著許多疑惑，正好投射在《靈魂擁抱》中的俞培文，一樣懷疑同時存在自身的好的知名度與壞的知名度，哪個真實，哪個才是虛幻？那篇不是俞培文寫的〈靈魂的擁抱〉，卻被整個社會的氛圍認定是他的代表作，他要不要接受這突來的暴紅，以及隨之而來的利益呢？還是召開記者會，大張旗鼓地否認文章是他寫的呢？〈靈魂的擁抱〉其實在小說中是一個象徵，它象徵著名氣，在媒體體制當中，一旦面對這名氣時，人是否能忠於自我呢？還是注定要迷失在這些虛幻當中？

我忽然可以理解為什麼當我寫的書開始暢銷時，我是那麼無可選擇地被推上某種傑出成功人物、風雲人物、不世出的年輕天才作家的行列裡；也可以體會到，為什麼我經過修飾的照片會被光鮮亮麗地推上全版廣告、大型

¹⁰⁹侯文詠，〈侯文詠談寫《靈魂擁抱》創作過程〉《侯文詠官方網站》，參閱：<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wen-1-talk.htm>

看板上……或者是不斷地有人期望我回答：如何維持良好的婚姻？如何成功？如何利用時間……這一切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惡意，傳播媒體無非只是順水推舟，從時尚、成功、富裕、名氣、青春……不斷地推出各種成功的典範或者是生命的解答。我只是正好置身在這樣的潮流裡，必須扮演起答案的角色。（《我的天才夢》，頁 206）

侯文詠被媒體塑造成一個成功者，是一個學者專家，能提供生命中的標準答案，如何維持良好的婚姻？如何成功？如何利用時間……，面對真實生活裡的無奈與無力，大家渴望一個典範或解答，而這時就需要一個人扮演著完美的偶像來滿足大家的需求。真實世界裡的侯文詠被推到這偶像位置上，《靈魂擁抱》中的俞培文又何嘗不是呢？甚至連總統致詞都引用俞培文掛名的文章〈靈魂的擁抱〉，並因此虛偽地和反對黨領袖在螢幕上相互擁抱。這經由媒體塑造出的偶像，其影響力可見一斑。面對這樣典範式的偶像，侯文詠是嗤之以鼻的：

如果我不跳開，那麼，我恐怕會成為集名醫、名教授、名作家於一身的「典範」，而在我的觀念中，這種典範，其實只是一個「社會要的謊言」。¹¹⁰

筆者以為，不論是《白色巨塔》中的蘇怡華、《危險心靈》中的謝政傑，或是《靈魂擁抱》中的俞培文某種程度都是侯文詠的化身，正如羅盤的說法：

姑不論作者在作品中是否扮演了某個角色，就廣義言之，自傳成份終是難免。因為作品中所表現的是作者的思想、意識、情感，明乎此，就可得知任何作品不可能與作者無關。¹¹¹

¹¹⁰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¹¹¹羅盤，《小說創作論》（台北：東大圖書，1990年初版），頁 340。

因此筆者認為侯文詠把自己投射在這些角色當中，以「體制」為其書寫主題，去呈現他在不同體制內所遭遇的困境與產生的疑惑，其中的情節或多或少和他真實的個人成長經歷有關，藉此他想和讀者一同去省思這些體制背後的問題。

第四節 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懷

在大家普遍的認知當中，所謂的「知識份子」就是指具有相當知識學問，並對政治、社會等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因此除了「讀書人」這個基本的特性外，知識份子還必須對人類與社會有相當程度的關懷與批判精神。

「知識份子」所指涉的「人」的性徵不是「人」所直接顯示的具體外顯形象，而是由其人格或社會角色特質，長期而且持續地表現在許多不同場合之不同面相的行為中抽離出來的基本特徵（如「批判精神」、或「不滿現狀」的性格）。¹¹²

對社會或個人而言，知識本身是不會產生力量的，而是透過人的應用才會激發出力量，來讓知識能幫助自己，或對社會產生更好的質變，這才是知識所帶給人的內在含意。對社會有貢獻是知識份子最終的目標，但在達到此一目標之前，必須具有不滿現狀的性格與批判思考的能力，如此才能想有改變現狀的動力，並進一步選擇什麼樣的方向才是對社會有利的。此外，要具備有獨立思考能力者才能稱為知識份子，能夠勇於挑戰權威與既定的體制，透過各種形式對社會大眾發言，批判社會與攪動現狀。

「知識份子」的核心意含是：他們擔當「觀念精煉化」(idea-articulation)

¹¹²葉啟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229。

的工作。……他們是 Coser (1965) 所謂的「觀念人」(the man of idea)。Mannheim 的定義最能傳達這個意思。他說：「知識份子乃是一羣人，其特殊的任務是為其存在之社會提供有關世界的解釋。」¹¹³

這裡的「觀念人」意味著知識份子不單是一個有知識的人，還必須具有建立觀念的能力，而這就要靠獨立思考和創新的能力了，並且終其一生為追求觀念而追求觀念。當然，知識份子所提供的各種觀念，不宜過度專業化與學術化，否則就難以涉入公眾生活了，因此他們不會被專業知識或書本上的死知識限制，而能針對社會大眾就公共事務從事觀念性的解釋。所以，知識份子除了可以承繼傳統偉大觀念，更是新觀念的創造者，同時也擅長於以各種管道來傳播理念。

「知識份子」的真正含義不但應當包含某種類型的思想，更應包含至少是與社會結構不滿(socio-structural dissent)具潛在關係者，也就是說，「知識份子」之觀念一定要是具普遍意義者，而且足以對社會產生效用。

114

知識份子往往批判當道、批判主流，自然會讓當權者不高興，這樣的反應是因為主流基本價值與信仰遭到挑戰，會產生不安的情緒。但如果缺少了知識份子的積極批判，整個社會對其重大問題，便會失去相當程度的自省力與洞察力。知識份子的感受性都特別強烈，對於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具有相當的熱忱，並且時時保有敏銳的心智，能積極且主動的行動與創造。此外，知識份子必須是其所處的社會的批判者，也是既定價值的反對者，他不能處於靜態且封閉的環境，避免變成固守傳統或那種具有穩定不易更改的思維模式。

日治時期以來，當時是一個教育被限制的殖民社會，台灣受高等教育者幾乎

¹¹³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238。

¹¹⁴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頁 241—242。

是以醫師和教師為主。醫生在各個時代皆具有不同的身分與角色，當其社會地位越高的時候，也就意味著對社會有越大的影響力。除此之外，社會對醫生亦有較大的期待與要求。因此在台灣，醫生一直是傳統所認定的知識份子，更被視為是社會的良知和啓蒙者，例如蔣渭水、賴和在台灣社會的現代化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因為傳統社會對於知識份子的期望，除了希望他們能在本業上有所發揮外，亦希望能對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有所貢獻，並促進社會的改革。

台灣醫界曾經是知識份子的主體，並因為殖民體制的關係，成為了社會上的領導精英，對台灣當時的本土化運動與社會進步有相當大的貢獻。也使得醫生在當時的社會，除了扮演醫病救人的角色之外，也得背負社會責任使命感的角色。此外，自蔣渭水、賴和以降，臺灣的醫師多具有深厚的人文傳統，他們的工作很忙碌、辛苦，卻總是閱讀大量的人文書籍，聆賞古典音樂、藝術作品，甚或投身創作，他們的人文藝術造詣常令人歎服。¹¹⁵臺灣的醫界盛產作家，像被尊稱為「臺灣文學之父」的賴和就對臺灣文學有極大貢獻。直到現在，醫學院的學生還是熱衷文學，像臺北醫學院有「北極星詩社」，高雄醫學院有「阿米巴詩社」。

人文，只是臺灣醫師的業餘興趣，但這種興趣往往貢獻於比醫療更遠大的理想，我一直覺得，臺灣的醫師是知識分子的典型，除了專業能力、技藝，他們的社會角色還表現了人文素養，和人道關懷。薩伊德(Edward W. Said)在談論知識分子時說，最吸引他的知識分子意識是一種反對精神，那是為弱勢團體奮鬥、勇於挑戰現況的精神。¹¹⁶

筆者認為侯文詠正是傳承著這種醫生作家與知識份子的角色，江靜芳在替《烏魯木齊大夫說》寫序時，提到：大夫不只要治人病痛，能為文治療時代敗德

¹¹⁵焦桐主編，《臺灣醫療文選》(台北：二魚文化，2005年初版)，頁11。

¹¹⁶焦桐主編，《臺灣醫療文選》，頁13。

的心靈，為生病的社會注射一針幽默。¹¹⁷他具有社會改革的使命感，所以努力把他所觀察到的各種既定體制的荒謬面向提出來，透過他一本本暢銷的小說，希望大眾閱讀後，能引起社會的關注或省思。所以與其探討他的文學價值，不如深究其文學背後所隱藏的社會責任。

阿米巴詩社的前社員，高雄婦女新知基金會現任理事，並且創辦高雄市第一間女性書店「好書店」的李佳燕醫師就表示，踏進阿米巴的第一步，日後就會由不得你再以簡單、冷漠的心態來看這世界。她覺得當初會參加阿米巴詩社醫學院學生，大多是本身個性是屬於不安份的，經過聯考後，面對新生活早已經是「蠢蠢欲動」。李佳燕認為醫學系要唸的科目，多半是非常貧乏、要強記死背的東西。對這些唸書唸很好的學生來說，要應付也可以拿高分，可是對有些人來說，考試上得高分的成就感，經過了聯考的成功，已經不能滿足於她們了。於是進入阿米巴裡面，以詩來表示自己對人生、社會的觀感。¹¹⁸

這裡可以看出，醫學系的學生求學之路大都是很順利的，但這樣的順利往往會讓人想尋求更高的成就感，而有些人就以文學為憑藉，去探索人生的意義或批判社會的體制。而醫生由於職業的關係，在接觸生老病死當中，對生命與人性的關懷較為深刻，又為了與每一位病人建立良好的醫病關係以發揮療效，醫師必須善於溝通，洞悉病人心態，對病情則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對社會的問題要有深切的體認，堅持站在正義的一邊。良醫更要有抽絲剝繭分析問題的能力，以及為病痛者下富於智慧的決定的果斷能力。這些特性，給醫業帶來濃厚而非科學的藝術屬性。¹¹⁹

¹¹⁷侯文詠著；蕭言中漫畫，《烏魯木齊大夫說》（台北：皇冠，1992年初版），頁3。

¹¹⁸呂嘉鴻報導，〈高醫阿米巴 以詩替社會看病〉，《生命力新聞》<http://www.newstory.info/>

¹¹⁹黃崑巖，〈醫學教育白皮書——台灣醫學教育之改進方向〉，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2002年12月，頁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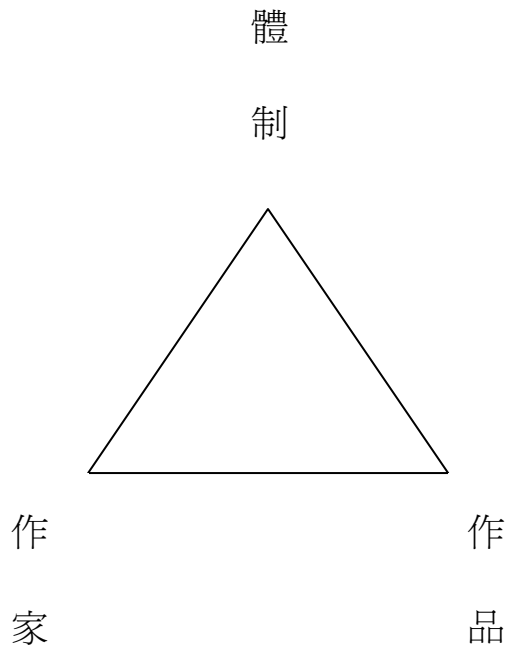
上述這樣的特質與訓練，也同時是一個好作家所需具備的，這或許就是為何文壇一直有許多出色的醫生作家的原因吧！這樣的論點，陳宛蓉也提到過：

醫生作家們根據學治病的邏輯去探求更細微的人與人、自然、社會、國家的關係，許多不公、殘酷的本質透過內斂的詩語言呈現，其無限遐想的空間較其他文類更易溫和地滲入人心。……醫生每日所見所聞所觸都是赤裸裸的人性、沉甸甸的悲歡離合，於是信手拈來盡是你我週遭時發生的現象，這些專業醫生以冷靜、敏銳的思維分析，用細膩、熱情的筆觸提出關懷或控訴，都使讀者在「相信專業」的心態下更易於了解與接受。¹²⁰

侯文詠一開始大都以醫學臨床為寫作題材，像是從最初的《點滴城市》、《大醫院小醫師》、《烏魯木齊大夫說》、《離島醫生》，一直到《白色巨塔》都是叫好又叫座，但他逐漸用其專業性的冷靜、敏銳思維來關懷社會，寫作題材趨向多元。他的作品在醫生作家群中算是暢銷的，同為醫生作家的王浩威曾寫到：「在我學生時代，剛好是一群醫學生充斥在文壇舞文弄墨的，成為當時所謂的文藝新秀。從莊裕安、我自己、陳克華，到侯文詠，雖然在不同的醫學院，卻剛好依序排列，各差一屆地密切銜接。當然，侯文詠是知名度最高，讀者群也遠超過我們三人的總數。」¹²¹靠著廣大的讀者與媒體的關注，侯文詠的作品影響力自然不容小覷。

¹²⁰陳宛蓉，〈飛行在文壇領空的靈魂——台灣醫生作家作品觀察〉《文訊》第171期，2000年，頁35。

¹²¹王浩威，〈白色巨塔導讀〉，《白色巨塔》，頁4。



筆者將以上面的關係圖來說明作家、作品、體制這三者的關聯性。首先，作家生存在一個固定模式的社會體制當中，而且這體制通常是由社會結構中的上層者所掌控。當作家產生自覺意識，對體制有所不滿或懷疑時，往往就會想透過文字來表達，而此時作品就成為作家個人抒發理念的管道。接著，在作品完成後，自然會有讀者來閱讀，此時他們也就接收到作者的觀念，並產生一些省思。讀者和作者處於同一個體制內，透過作品引起共鳴後，那個想改變的力量就不單單是作者一個人而已了。如果作品越暢銷，讀者越多，改變的力量也就越強大。最後，這個僵化的體制便會產生一些質變。

正如侯文詠談到自己的作品有如此深遠的影響力時所說的：「我想這是因為書裡有一種正當性的標準在裡面，它並不是靠我個人力量賦予的，只是放在那個地方，經過所有人的討論，群眾自己就會產生一種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¹²²而筆者認為侯文詠正是企圖透過這樣的群眾力量去在體制內進行一場不流血的革命。

¹²²參見侯文詠官方網站 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aut_2_006.htm

正如同苦茶曾為侯文詠的《點滴城市》寫的序中所提到的一樣：

侯文詠自己一定也發現了：只要他講故事，就一定十分動人，幾乎可以不著痕跡的傳遞有力的訊息；如果他忍不住說教，一落言詮，就像伊索寓言後面的「教訓」，讓人有生吞煮飯的痛苦；而如果連故事也無，只見他板起小面孔說起大道理，那就像他所輕視的 Telefessor（電視教授）一樣，有一種讓人陌生的無趣了。¹²³

筆者以為侯文詠自己也深知這個道理，因此他以動人的小說故事去包裝他所想要傳遞的訊息，也就是說，他的小說是負有相當的使命感，而非單純的為文藝而文藝。小說透過許多的讀者閱讀，對社會產生某種的影響，侯文詠也同時注意到他的小說起了社會作用，再根據此回饋去創作新的小說。侯文詠、小說、讀者、社會各方面互相回饋、影響，讓文學在這之中活躍了起來，也同時賦予其小說真實的生命。

小說在現今的文學作品中可說是對社會的影響力最大的，一方面因為讀者群較廣，更重要的是作者本身可以隱藏在角色中，靠著情節、對話，所要表達的想法會更容易投射在讀者的心中。當處在相同體制內的讀者，藉由小說的引導，能從更客觀、更高的視野來看體制的全貌，接著開始思考一些問題時，體制也才會

有改變的契機。

「如果制度有生命，人的思考，就是這個生命的 DNA，畢竟，是 DNA 決定了生命的樣貌啊！」侯文詠或許已經不當醫生，但跳脫了醫院制度的他，卻能從更高的位置執行手術，試圖為這生病的制度，徹底改造 DNA。¹²⁴

¹²³參見《點滴城市》的序。侯文詠，《點滴城市》（台北：圓神，2003年初版）。

¹²⁴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由此可知，侯文詠正企圖以他的文學影響力，去為他所認為種種不合理的制度做改革，從醫院的體制、教育的體制，一直到媒體的體制，他成為一個社會觀察家，把自己放在社會批判者的定位，以不同的小說樣貌告訴我們這些社會制度都出問題了。正因小說中的故事，乃是表現作者思想的「工具」¹²⁵，所以這三本長篇小說都帶有一種鮮明的問題意識、使命意識與改革意識。加上由於他十分熟悉這些體制，因此在小說情節上特別貼近事實而具有感染力量，好提供讀者更多的省思與對照，藉此達到強化問題、改革問題的目的。

正如侯文詠曾提到：在創作中，作者並不是最重要的，作者只是事件的發動者。對侯文詠來說，在乎的是他的東西點火出去後，有沒有得到效益，那才是他想要的實踐過程。¹²⁶筆者認為侯文詠正企圖以文學不斷在廣大讀者中點燃那把啓迪的火，好引爆群眾對各種體制的省思，因為這才是他所認定的寫作效益。

雖然許多人不願意被貼上「通俗文學作家」的標籤，但筆者在訪問侯文詠時，他即明白表示想當所謂的通俗作家。他覺得通俗沒有什麼不好，而且當醫生的都會覺得說「你如果不吃藥，我就醫術再好也沒有用。」所以這年頭如果不通俗的話，誰要唸文學呢？

台灣的寫作者不講當代的故事，不講大眾的脈動，以致於大眾文學發展不起來，但其實現在的金融、保險、法律等領域，若作者有心投入，好好營造人物，是可以造就動人的大眾小說的。¹²⁷

侯文詠跟一般暢銷作家不同，他不寫那些浪漫卻不切實際的愛情小說，或修身養性志卻稍嫌唱高調的勵志叢書。他善用身為暢銷家所擁有的文化資源，替所觀察到的社會問題寫出一本本小說，藉由大量的閱讀者，在社會中引爆議題，促使人們進一步去思考問題。這或許跟他早期閱讀的小說經驗有關：

¹²⁵羅盤，〈小說創作論〉，頁 13。

¹²⁶張葆蘿，〈侯文詠—孤獨寫作 默默點火〉，頁 45。

¹²⁷劉梓潔，〈走出白色巨塔——醫師作家侯文詠〉，《聯合文學》第 260 期，2006 年，頁 119。

那時候我讀著小說裡面更深沉的世界，寫著人的窮、苦、貪、鬥，我愈讀愈覺得人的世界都是一樣的，並不因為是兒童、青少年或成人就有什麼不同。雖然我們的生活貧瘠而有限，極力裝出可愛的模樣，可是成人或者是小說世界裡的苦悶，我幾乎都可以在生活裡找到呼應。（《我的天才夢》，頁 23）

對侯文詠而言，小說反映了真實的人生，而人生也往往如小說般充滿戲劇性，小說就像一面鏡子，是種真實世界的延伸，赤裸裸地描繪出社會中的窮、苦、貪、鬥。當人生與小說之間的真實與虛構顯得模糊時，自然能夠引起讀者去省思那共同的苦悶之處。但侯文詠也如同今天的文學作家或戲劇作家，有幾點特色：第一他不會去教化別人；第二，他面對種種問題時，自己並沒有答案，他自己也是迷惑的，也是在困局之中的人，不能為別人指出一條道路來。¹²⁸身處在相同的體制當中，藉著小說中人物的困惑，反映出了侯文詠與讀者的共同困惑，並一起思索著問題與改變的可能。

一個比較成熟的作者，他會把讀者或觀眾也看成是位比較成熟的人；所以他知道，這些讀者和觀眾禁得起衝擊、體念他的牢騷與苦惱。他可以把他的問題提出來，讓大家共同思考；他不會掩飾他的問題，也不會掩飾他的痛苦，他認為這樣做，才是尊重他的讀者和觀眾。而讀者和觀眾也認為這樣的作者，才是成熟的作者；他沒有關起門來寫白雪公主給我看，他是把真實人生的問題寫出來給我們看！他把今天我們所面臨的種種困局和痛苦，放到我們面前給我們看，大家共同討論、共同思考這些問題。¹²⁹

¹²⁸馬森，〈文學的魅惑：馬森文論六集〉，頁 71。

¹²⁹馬森，〈文學的魅惑：馬森文論六集〉，頁 71。

雖然侯文詠的小說並沒有給讀者具體的答案或解決方法，但透過作品的本身，給了我們啓發，加強了我們面對問題的勇氣。也就是說，當他把問題呈現出來時，至少讀者會想一想，要不要解決這些問題？或是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這正是對作者的呼應。就如同侯文詠曾在小說中所寫到：

文學作品其實跟我們的人生很像，我覺得問出好問題，遠比回答出好的答案更加重要。因此，我覺得能夠問出好問題，用心地去思考，追究那個問題的過程，就是好的文學作品，甚至是好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靈魂擁抱》，頁 20）

筆者以為侯文詠的這三本長篇小說，正如實印證了上述的理念，他藉由不同的小說來向讀者丟出一個個問題，而隨著文本的情節發展所構成的人物、事件、語言等，都是追究那個問題的過程。

在冒犯了正確知識、正統知識、主流知識、真實知識的同時、以及之後、小說還可能冒犯道德、人倫、風俗、禮教、正義、政治、法律……冒犯一切虛騷為愛彌兒設下的藩籬和秩序。冒犯它們固然不足以表示小說的價值盡在於斯，但是小說在人類文明發展上注定產生的影響就在這一股冒犯的力量；它不時會找到一個新的對象，一個尚未被人類意識到的人類自己的界限。¹³⁰

不管是道德、人倫、風俗、禮教、正義、政治、法律……，這些都是人為的體制，隨著時間久遠，漸漸變得僵化卻不可挑戰，每個人也都習以為常的遵循著這些體制生活，儘管有些質疑或不適應，都被刻意忽略掉。身為小說家的侯文詠卻直接挑戰這些體制，藉著小說來說出他對這些體制的不滿，並靠廣大的讀者閱

¹³⁰張大春，《小說稗類》（台北：網路與書，2004年初版），頁 29。

讀，引起更多的共鳴，來撼動這些體制，這正是一個通俗作家可以有的影響力。
侯文詠曾在報紙採訪說到：

我覺得，你如果看了，產生問題，開始想，然後在網路上發表意見，等於是對我的作品和這個社會，再做一個創造。當每個人發出想法，去尋找共識，外在的體制跟社會也會跟著改變。這是我的理想國啦。暢銷作家不只是看銷售數字，我也可以利用大眾文化去改變一些事，這個帥吧、厲害吧？

131

透過解讀侯文詠小說文本所透露的政治無意識¹³²和社會衝突，我們可以形構出侯文詠對未來社會歷史想像的新格局，且透過一種烏托邦的衝動，來投射改變與解放的可能。人類建立了制度，努力維持制度運行，然而，制度的種種標準規範，卻又回頭主宰著眾人的行爲與想法¹³³，侯文詠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加上高明的寫作技巧，將一個個體制的縮影，羅織在他的長篇小說中，好讓讀者可以藉此看清自身所處的每個體制，並有進一步去省思的可能性。侯文詠曾闡述自己的創作企圖：

我相信人的心裡都有分辨善惡的能力，因此，當制度裡的人開始受到小說引導，能從更高的角度觀望制度全貌，開始思考何者「當為」或「不當為」之後，制度的樣貌自然也會開始改變。¹³⁴

不管是從《白色巨塔》的醫院體制、《危險心靈》的教育體制，一直到《靈魂擁抱》的媒體體制，都可以看出侯文詠的創作原點始終是圍繞著人與制度的關

¹³¹陳宛茜、羅嘉薇，〈相對論〉，《聯合報》A10版，2006年8月29日。

¹³²馬克思主義者詹姆遜提出的政治無意識理論，他認為在最基本的層次上，每個文本都是一種政治幻想，它以矛盾的方式連接在特定的政治經濟內部構成個人的那種實際的和潛在的社會關係。

¹³³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¹³⁴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係在打轉，而筆者認為這正是其長篇小說的核心價值。

第陸章 結論

侯文詠在體制內一直是個成功的樣板。在教育體制當中，他從小成績名列前茅，高中是讀台南一中，接著又考上人人稱羨的醫學系，最後還唸了素有衛生署長儲備處的台大博士班。而在醫院體制當中，他拿到醫學博士，被醫學院聘為副教授，還是台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至於在媒體體制當中，他是公認的暢銷作家，並成功跨足了電視、廣播的領域。若依照社會主流價值的標準，侯文詠從小至今的順遂美好，幾乎是令人嫉妒了。但這樣的他，卻為何寫出一本本探討體制問題的小說。

這答案在筆者和侯文詠的訪談中找到了，他提到一段話：「我的文學鄉愁全部是童年，就說我不管寫《白色巨塔》，不管寫謝政傑，不管寫《頑皮故事集》，我裡面的標準都是用那個小孩子的標準在看待世界。」筆者認為也就因為在小孩的世界裡，是沒有任何體制的，體制是成人所創造出來的桎梏，所以侯文詠企圖用小說解構不同的體制，要讓讀者解下這樣的桎梏。

首先，在《白色巨塔》中，可以看出「體制」是具有相當「父權式」的色彩，而在此之中為了確保其權威性，只能順從著主流價值去追求著名利（尤其身為男性），以達到社會價值的認同。因此可以看到在文本中的男性人物，為了自身利益而有所互動，最後形成了一張張人際網絡。層層相疊的人際關係以巧妙的方式達到了全面監控的效果，讓身處其中的任何人，都被催眠似的喪失了個人自由意識。¹³⁵因此，不管是唐國泰、邱慶成或蘇怡華，誰也逃離不了這樣的體制掌控，被迫做出種種違反醫學道德的事（醫藥勾結、醫療糾紛、紅包弊案），最後也只有有在親情方面嗅得到一些人性吧！

而《危險心靈》則是一本為全台灣受困在教育體制中的學生、家長、老師寫的書。學校就像一座另類的監獄，以一種強制性的方式去監控著學生的行為與心

¹³⁵王浩威，〈白色巨塔導讀〉，《白色巨塔》，頁6。

靈。在上位者藉由教育來掩飾「霸權」的本質，而學校傳授的知識有時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潛移默化，卻被宣稱為「唯一有價值的」，也不管內容是否已跟實際生活脫節。另外，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打著「功績主義」的旗幟，但最後只把智力優勢當作衡量學生的唯一標準，並忽略了家長社經地位的差異所造成的影響。身處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學生、家長、老師豈能不焦慮？

最後，在《靈魂擁抱》中藉由暢銷作家俞培文和美麗主播宋菁穎的相關事件，看到了媒體體制中的荒謬性。首先，人們努力「攀登媒體的邊」，只因掌握了發言權就有定義事件的權力，因此除了聳動的標題外，永遠沒有真相可言。其次，在媒體的「角色派定」之下，人不再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而是被歸類化的「角色」，並在唯恐天下不亂的媒體舞台上照本演出。如此的媒體建構出一個扭曲的世界，而媒體經營者、記者、專家名嘴、閱聽大眾、當事人、節目廣告主……都是其背後龐大的共犯結構。

筆者認為文本裡每一個角色在侯文詠眼中都是受害者，而加害者正是社會中無所不在的各種體制，這些體制都是由人所創造出來的，但到最後人卻反而被各種體制束縛。在它們各自的領域裏，制度可以強迫社會施為者接受制度對現實的某些合法定義，而社會施為者事先就對制度採取信任的態度。¹³⁶

侯文詠選擇鬆綁了自己，不想在主流價值的框架裡繼續表演著。他更進一步以筆代替了手術刀，透過詼諧而理性的論述，解剖著台灣社會種種看似合理但卻荒謬無比的制度，當然制度不是一個人或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但身為一個有影響力的暢銷作家，侯文詠說：「我把寫作當作是一種社會責任。」¹³⁷他把小說當做引信，引爆出制度的各種爭議。

此外，由於從小對死亡就很敏感，加上後來當醫生的經歷，侯文詠在小說中常常習慣拿「死亡」來當一個人生座標，去衡量制度中所謂的主流價值觀，好讓

¹³⁶ 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2002年初版），頁130。

¹³⁷ 楊倩蓉，〈侯文詠——撇開萬能，擁抱寫作〉，《30雜誌》：6月號，2005年。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167&auth=10898&keyword=%e4%be%af%e6%96%87%e8%a9%a0>

讀者輕易領悟到其中的荒謬性。

從散文、短篇故事，一直到開始寫長篇小說，侯文詠提到自己的創作有一貫的本質：

過去的散文、短篇故事，就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圖，在決定寫長篇小說之後，我開始蒐集、重組這些拼圖，試著拼出我一貫想要表達的核心價值，而它的樣貌，自然也就不會只是一塊拼圖而已。¹³⁸

對體制的論述與批判正是侯文詠要表達的核心價值，因此不管是《白色巨塔》、《危險心靈》或《靈魂擁抱》都帶有一種鮮明的問題意識、使命意識與改革意識。加上由於侯文詠在這些體制當中都有其個人經歷，因此小說情節上特別貼近事實而具有感染力量，藉此提供讀者更多的省思與對照，藉此達到強化問題、改革問題的目的。

總結上文，筆者以為這樣的侯文詠正具有知識份子的特質：不滿現狀的性格與批判思考的能力。他透過文學作品對社會大眾發言，批判社會與攪動現狀，並能夠勇於挑戰權威與既定的體制。因此他的創作企圖不單是提供讀者更多閱讀樂趣的小說，而是一種做為知識份子對社會的持續關懷。

¹³⁸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

參考文獻

壹、侯文詠創作專書

- 侯文詠，《白色巨塔》（台北：皇冠，1999年初版）。
- 侯文詠，《危險心靈》，（台北：皇冠，2003年初版）。
- 侯文詠，《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台北：皇冠，2010年初版）。
- 侯文詠，《靈魂擁抱》（台北：皇冠，2007年初版）。
- 侯文詠，《我的天才夢》（台北：皇冠，2002年初版）。
- 侯文詠著；蕭言中漫畫，《烏魯木齊大夫說》（台北：皇冠，1992年初版）。
- 侯文詠，《點滴城市》（台北：圓神，2003年初版）。
- 侯文詠，《沒有神的所在——私房閱讀《金瓶梅》》（台北：皇冠，2009年初版）。

貳、中文書目

-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2003年初版）。
- 李崇建，甘耀明，《沒有圍牆的學校：體制外的學習天空》（台北：寶瓶文化，2004年初版）。
- 蘇嫻雅，《煞不住的下衝列車：台灣媒體批判》（台北：米羅文化，2004年初版）。
- 吳若權，《「媒」事來哈啦——吳若權的媒體經驗分享》（台北：富邦文教基金會，2006年初版）。
- 胡元輝，《媒體與改造：重建台灣的關鍵工程》（台北：商周，2007年初版）。
- 徐佳士，《冷眼看媒體世界》（台北：九歌，1997年初版）。
- 葉啓政，《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東大，1991年初版）。
- 馬森，《文學的魅惑：馬森文論六集》（台北：麥田，2002年初版）。
- 羅盤，《小說創作論》（台北：東大圖書，1990年初版）。

焦桐主編，《臺灣醫療文選》（台北：二魚文化，2005年初版）。

張大春，《小說稗類》（台北：網路與書，2004年初版）。

靳鳳林，《死，而後生：死亡現象學視閩中的生存倫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初版）。

參、中譯外文書目

迪倫·伊凡斯著；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龔卓軍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台北：巨流，2009年初版）。

E.M. 蒞德爾著；刁承俊譯，《女性主義神學景觀》（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初版）。

盧卡奇著；陳文昌譯，《現實主義論》（台北：雅典出版社，1988初版）。

哈利斯著；唐宗清譯，《教師與階級：馬克思主義分析》（台北：桂冠，1994年初版）。

Roger Silverston 著；陳玉箴譯，《媒介概念十六講》（台北：韋伯文化國際，2003年初版）。

P.L. Berger & T. Luckmann 著；鄒理民譯，《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台北：巨流，1991年初版）。

朋尼維茲著；孫智綺譯，《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北：麥田，2002年初版）。

肆、學術論文資料

林容萱，〈大眾文學與社會的對話——以侯文詠長篇小說為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陳筱涵，〈醫生作家侯文詠長篇小說《白色巨塔》創作基本要素研究〉，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8年。

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林貞均，〈白色雙塔記——台日《白色巨塔》異同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年。

朱燕華，〈侯文詠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研究〉，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張天泰，〈台灣校園師生溝通出了什麼問題？——以 J.Habermas 溝通行動理論分析《危險心靈》中的師生衝突〉，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林信男，〈從語藝觀點看「慾照事件」的媒體角色與新聞敘事〉，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

伍、學術期刊資料

張淵盛，〈從精神分析觀點解讀侯文詠短篇小說中的類型人物〉，《思與言》第45卷第1期，2007年3月。

哥舒意，〈放下手術刀，立地成作家——談台灣超人氣作家侯文詠《白色巨塔》〉，《今日中國》第2期，2006年。

袁意晴，〈課程轉化下教育公平性與文化再製理論的對話〉，《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第23期，2002年5月15日。

王乾任，〈我讀侯文詠的《危險心靈》〉，《社教雙月刊》第116期，2003年。

張葆蘿，〈侯文詠——孤獨寫作 默默點火〉，《書香遠傳》第54期，2007年11月。

黃崑巖，〈醫學教育白皮書——台灣醫學教育之改進方向〉，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2002年12月。

陳宛蓉，〈飛行在文壇領空的靈魂——台灣醫生作家作品觀察〉，《文訊》第171期，2000年。

劉梓潔，〈走出白色巨塔——醫師作家侯文詠〉，《聯合文學》第260期，2006年。

王浩威，〈白色巨塔導讀〉，《白色巨塔》，（台北：皇冠，1999年初版）。

陸、網際網路資料

楊紹華，〈侯文詠：我不要「團進團出」的人生〉，《30 雜誌》：9 月號，2006 年。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361&auth=12360&keyword=%e4%be%af%e6%96%87%e8%a9%a0>

河西撰稿，〈侯文詠：搖擺在幽默與冷峻之間〉，《新民周刊》第 450 期，2007 年 10 月。<http://magazine.sina.com.hk/xinminweekly/450/2007-10-21/ba41444.shtml>

侯文詠的官方網站 http://author.crown.com.tw/wenyong/aut_2_001.htm

呂嘉鴻報導，〈高醫阿米巴 以詩替社會看病〉，《生命力新聞》

<http://www.newstory.info/>

黃慧娟，〈有問題的生命就有趣·就精采—侯文詠的天才夢〉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editorial/author.php?id=2002070101&encoding=C>

侯文詠發表於公視留言板的文章〈我是侯文詠，危險心靈並沒有結束……〉

<http://tw.myblog.yahoo.com/tapu7269/article?mid=521&prev=557&next=481&l=f&fid=5&sc=1>

楊倩蓉，〈侯文詠——撇開萬能，擁抱寫作〉，《30 雜誌》：6 月號，2005 年。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167&auth=10898&keyword=%e4%be%af%e6%96%87%e8%a9%a0>

游常山，〈侯文詠：追求下半輩子的幸福〉，《30 雜誌》：9 月號，2004 年。

<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47&auth=10080&keyword=%e4%be%af%e6%96%87%e8%a9%a0>

柒、報紙

林黛嫻，〈兼論《小說族》二十週年〉，《自由時報》副刊，2006 年 9 月 25 日。

陳宛茜、羅嘉薇，〈相對論〉，《聯合報》A10 版，2006 年 8 月 29 日。

黃天如，〈世界第一 每 3 個月 1 醫師定醉〉，《中國時報》頭版，2008 年 1 月 20 日。

附錄一

侯文詠生年年表

製表人：劉自立

西元	年齡	生平大事	作品
1962	1	<p>出生：雲林虎尾。祖籍：嘉義縣六腳鄉。六月九日，雙子座。</p> <p>父親侯峰柏是公務員，最早是在虎尾的糖廠，後來調到新營修配廠工作。</p> <p>母親林金菊是小學教師，東石人，最早在虎尾的中正國小教，後來轉到嘉義縣義竹鄉東華國小，一直到退休。</p> <p>祖先來自福建泉州南安。作家侯吉諒是與他同個曾祖父的堂兄弟。祖父在日治時代曾當過通譯，也開過肥皂工廠及碾米廠。祖父早逝，加上後來實施三七五減租的關係，家道中落，祖母甚至經常跑法院。外祖父是住嘉義縣東石鄉，栗子崙的後埔村。弟弟侯文琪和他相差四歲，現任臺北醫學大學生藥所教授。妹妹侯智惠在嘉義高職教書，師大教育心理系畢業。</p>	
1963	2		
1964	3		
1965	4		

1966	5	在義竹就讀天主堂幼稚園	
1967	6	祖母常會帶他去吃的雞肉飯和香菇肉羹，是他最懷念的嘉義小吃。在義竹國小唸一年級，只唸了半年。級任老師翁蘭英，日後成了義竹鄉長。	
1968	7	父親調到新營糖廠修配廠，全家搬入員工宿舍。轉學南梓國小，唸到五年級上學期。	
1969	8		
1970	9	偶而家人會到布袋的海鮮店聚餐，對沒有外食的家庭的小孩來說，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1971	10	第一次投稿，在新營紙廠的紙廠通訊。後來投稿國語日報「校園風波」。在國小辦地下刊物《兒童天地》，一本銷售一元。到第三期就被迫停刊，導師問他：「你這麼聰明，為什麼不做點別的更有用的事？」 辦家庭報。	
1972	11	五年級上學期搬離修配廠的宿舍，住到新營市區來，下學期轉到新營國小。 擔任《王子》小記者，投稿《王子雜誌》。	
1973	12	新營國小畢業。	

1974	13	<p>國中念台南縣興國中學。</p> <p>上了國中，開始閱讀中文世界一些名家的作品。最先是洛夫、鄭愁予、楊牧的新詩。隨之而來的是徐志摩、朱自清、琦君、司馬中原、子敏、張曉風的散文。還有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七等生、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張愛玲。</p>	
1975	14	成績好，幾乎都在紅榜。	
1976	15	興國中學畢業。	
1977	16	<p>考上台南一中</p> <p>參與許多活動，老師問他：「你這麼聰明，為什麼不做點別的更有用的事？」</p>	
1978	17	<p>辦班刊遇到挫折，成績一落千丈到十三名。</p> <p>有位文史科的宗老師鼓勵他走文史哲的路。</p>	
1979	18	高三時，停掉所有的課外活動，專心啃書換分數。	
1980	19	<p>台南一中畢業</p> <p>考上台北醫學院醫學系</p> <p>爸爸很高興在門口放鞭炮，他卻感傷失去的青春年少再也回不來了。</p> <p>大一參加耕莘山地服務團</p>	

1981	20	大二開始看伍迪·艾倫，像《星塵往事》。	
1982	21	大三、大四時期愛看電影，一年可以 看上三百多場電影。	
1983	22	大四時第一次想離開醫學院，想去美國加州學電影。想以同等學力申請美國的電影研究所，家人反對。 大四牙醫系的張雅麗加入耕莘山地服務團。侯文詠給張雅麗的第一印象是「好臭屁、好討厭、好醜」。	
1984	23	大五創辦電影委員會，又當校刊社社長。在宿舍成立 LLA（失戀者保護協會）。	
1985	24	大六在台北榮總見、實習。 和張雅麗打賭是否繼續寫作，結果作品〈歲月與心情〉獲全國學生文學獎佳作。	
1986	25	大七在台北榮總見、實習。 作品〈關於她的二三事〉獲全國學生文學獎佳作。	
1987	26	台北醫學院畢業。 作品〈鐵釘人〉獲全國學生文學獎第三名。	
1988	27	認識作家苦苓。 希代出版社老闆朱寶龍有計劃的發	希代出版社出版《七年之愛》

	<p>掘和培植新作家，所以創造了「小說族」系列，集合了六位(吳淡如、楊明、彭樹君、林黛嫻、詹玫君和陳稼莉)中文系出身、得過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年輕女性作者集體出書，又網羅了郭強生、侯文詠、安克強等人成爲旗下作家，原本主力在羅曼史市場的希代用包裝明星的手法作行銷，書封面用作者經過造型師設計拍出的沙龍照，把作者塑造成文學偶像，「小說族」系列一炮而紅。但也因爲希代太過粗糙的商業策略造成理念不合，自張曼娟開始，其餘作家也紛紛出走轉投皇冠出版社旗下。《中國時報·開卷週報》除了在〈第三隻眼〉等另類書評的方塊中以匿名方式把「小說族」譏爲「紅唇族」(當時流行樂壇的歌手組合)外，更以全版報導來探討小說族現象，這篇題爲「排行榜新青春偶像派爭議多」的報導。在澎湖當兵。</p> <p>在《中華日報》寫〈吳姊姊說歷史故事〉的主編吳涵碧注意到一篇得獎作品〈考試真好〉，輾轉打聽到他在澎湖，便電話遊說他爲小朋友寫故事。</p>	
--	---	--

1989	28	張雅麗計劃去美國讀書，被侯文詠勸退。坐著快樂公主號從澎湖退伍回來。六月四日與張雅麗結婚。	希代出版社出版《誰在遠方哭泣》
1990	29	申請在台大當住院醫生。爲了持續寫作，選擇麻醉科。 報紙《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頑皮故事集》評選爲年度最佳童書。	
1991	30	大兒子出生。	圓神出版社出版《點滴城市》
1992	31	由聯合報系、教育部、台電等聯合舉辦的「真善美講座」。	皇冠出版社出版《淘氣故事集》 、《大醫院小醫師》、《親愛的老婆》、《烏魯木齊大夫說》
1993	32	升等台大主治醫生。 主講聯合報與波蜜企業合辦的「新人生均衡觀」講座。	健行出版社出版《頑皮故事集》。 皇冠出版社出版《愛情免疫學》、《離島醫生》
1994	33	唸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 《親愛的老婆》入選金石文化廣場年度十大暢銷書排行榜。二兒子出生。	皇冠出版社出版《在生命轉彎的地方》
1995	34	侯文詠台北市臥龍街的住處遭竊，損失三條金鍊。 光景旅行社籌辦的「與名人同遊澳洲」活動，邀侯文詠同遊。擔任皇冠	皇冠出版社出版《做個健康快樂的智慧人》。 平安有聲出版社出版侯文詠、蔡康永合著

		大眾小說獎決審委員。	《頑童三部曲》
1996	35	主持台北之音「ZOO(動物園)」(崇友文教基金會贊助)。搬進台北東區高級大廈，做了副總統連戰的鄰居(一品大廈)。	皇冠出版社出版《親愛的老婆2》、《侯文詠短篇小說集》
1997	36	十一月臺大醫學臨床醫學博士班畢業。辭去台大醫院麻醉科主治醫師的工作。 參加「尋找香巴拉」外景隊。	
1998	37	從台大醫院到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兼任麻醉科專任醫師。 被北醫聘任，升副教授。 入選金石堂一九九七年度十大暢銷男作家。	平安有聲出版社出版侯文詠、李豔秋、陳水扁合著《走希望的路》。 侯文詠、柏楊、馬英九合著《真情做自己》。 侯文詠、子敏、林懷民合著《舞出生命中的小太陽》。 侯文詠、李敖、劉墉合著《冷眼笑傲人間事》
1999	38	與蔡康永，集資成立的文化生活型態網站「網可可(oke)」。	皇冠出版社《白色巨塔》
2000	39	華文獎項 台灣 1945~1998 兒童文學 100 《頑皮故事集》入選故事書	平安有聲出版社出版侯文詠、蔡康永合著

		目。公視「大醫院小醫師」。 第二十一屆中興文藝獎章得小說獎。 《白色巨塔》獲金石堂一九九九年度 年度最具影響力的書。 網站「網可可(oke)」關閉。	《歡樂三國志》(全 1-20 冊)
2001	40	指導研究生李政益碩論《疾病、文化 與社會變遷—由結核病流行觀點探 究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臺灣社會》。 辭掉台北之音主持。	
2002	41		皇冠出版社出版《我的 天才夢》
2003	42	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青年 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商務出版社出版 《良醫益友談醫療保 健：麻醉科侯文詠》 皇冠出版社出版《危險 心靈》
2004	43	推出「總統青年人文講座」。	皇冠出版社出版《侯文 詠極短篇 》
2005	44	雜誌 金石堂《出版情報》 人物特寫 推薦《頑皮故事集》。誠品書店 2004 年年度暢銷書排行榜。《侯文詠極短 篇 》與《達文西密碼》分別奪下中 文、翻譯文學的年度冠軍。電視開始 拍「白色巨塔」、「危險心靈」。	皇冠出版社出版《天作 不合》
2006	45	「白色巨塔」、「危險心靈」首播。	

		<p>華文獎項 《好書大家讀》 《頑皮故事集》入選第 50 梯次「故事文學組-故事創作」。</p> <p>廣播 《教育電台嘉惠「長青天地」》推薦《頑皮故事集》。</p> <p>雜誌《野葡萄文學誌》高中男生「最愛作家」第三名。</p> <p>《白色巨塔》入選誠品書店十大暢銷華文書。</p>	
2007	46	<p>改編自侯文詠原著的兩部大戲入圍金鐘獎，「白色巨塔」拿走最佳導演、編劇與男配角獎。最佳連續劇獎項給了「危險心靈」。</p> <p>重回廣播圈主持飛碟電台的「飛碟晚餐」，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5 點至 6 點播出。節目主題有書籍介紹導讀，文化表演介紹，人物訪談等。</p>	皇冠出版社出版《靈魂擁抱》
2008	47	<p>《靈魂擁抱》入選金石堂年度好書。</p> <p>結束主持飛碟電台的「飛碟晚餐」。</p>	
2009	48	<p>爆料親自操刀幫言承旭寫了一封「寄不出去的情書」。</p>	皇冠出版社出版《沒有神的所在》
2010	49	<p>「嘉義縣之書」網路票選結果，由《白色巨塔》獲勝</p>	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乖》
2011	50	<p>《不乖》獲選金石堂 2010 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p>	皇冠出版社出版《帶我去月球》

		《沒有神的所在》入選搜狐讀書 「2010『讀本好書』年度評選」，	
--	--	-------------------------------------	--

附錄二

不乖的靈魂—侯文詠訪談

時間：2010年6月13日

地點：台北市 lavazza 咖啡店

探訪者：劉自立

劉：侯老師，很榮幸可以訪問到你！我想要寫有關於你童年到現在的一些歷程。

雖然老師的作品《我的天才夢》就是自傳性的散文了，但我想請老師幫我補充我當時有的疑問。可不可以回想一下你童年的一些的情況，比如說跟父母的關係，或者祖父、祖母。

侯：要不要就你問我答吧？

侯：我父親是在新營的修配廠。

劉：修配廠？

侯：對，就負責糖廠機械的地方。

劉：是修理糖廠的機械？

侯：對，事實上他們在糖廠是一直調動的，我父親最早是在虎尾的糖廠，所以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後來他才調到新營的修配廠，一直在那裡工作。我祖籍是嘉義縣，因為我父親是嘉義縣人，媽媽也是嘉義縣人。我父母親是搬出來住，所以我從小就住過義竹，我小學一年級是唸義竹國小，義竹國小一直唸了半年。後來父親因為到新營糖廠來，所以全家就搬到新營糖廠修配廠的宿舍，所以《頑皮故事集》的故事其實寫的都是以南梓國小為主，因為我在那邊唸到小學五年級上學期。

劉：所以義竹國小唸一年而已？

侯：不到一年。一直到五年級上學期，後來因為我們家離開那個宿舍，搬到新營市區，所以那時候我又轉學到新營國小。我小時候幾乎都在轉學，印象很深刻，常常轉去以後人家就看我的課本，說哎唷，他的教科書竟然跟我們一模一樣，但又看我的帽子、制服都不一樣，因為我在南梓國小還戴舊式的日本帽子，後來轉到新營國小是戴黃色小帽。他們看我衣服什麼都不一樣，卻沒有想到我教科書是一樣的，所以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而且我每轉到一個地方考試成績都會很好，一直很被注意！

劉：是從一年級好到六年級？

侯：嗯，對！

劉：那父親算是公務人員嗎？

侯：我父親是公務人員，是國營的那種公務人員。

劉：媽媽是小學教師？

侯：我媽最早是在虎尾，在我唸小學之前，是在虎尾的中正國小教書。後來她轉到嘉義縣義竹鄉的東華國小，然後就一直在那邊教到退休。她退休的時候，整個村子都不做生意，因為她在那邊教了快二十幾年，她教的學生都橫跨到兩代了，所以整個鄉裡的人都不工作，來慶祝她退休。

劉：所以你的出生地是在虎尾？

侯：虎尾，但是住虎尾的時間很短。

劉：搬家的流程是從虎尾、義竹，然後？

侯：因為我爸最早在虎尾糖廠，然後才調去修配廠，剛到修配廠的時候我們先住在義竹，靠通車。後來慢慢我爸有點錢了，也申請到宿舍，所以我們就搬到新營修配廠的宿舍。之後，我爸爸開始存錢，一直到我小學五年級，他就買了新營市區的房子。

劉：這樣一直搬來搬去、轉學，對你童年有沒有什麼影響？

侯：還好啊！我在南梓國小待比較久，那後來新營國小是一年半嘛！

劉：這樣不會跟同學不熟或比較疏離？

侯：也差不多啦，我不管走到那裡都很容易跟人家混熟，這點倒還好！

劉：媽媽是小學老師，會不會對你功課很要求？

侯：她沒有辦法要求，因為已經第一名了。

侯：她很難要求。

劉：是因為她要求才第一名？

侯：沒有，她並沒有怎麼要求。

劉：老師的小孩通常壓力都比較大？

侯：我還好耶！因為我是那種會讀書的，所以我媽也不太擔心。她當然希望我考試很好啦！我後來到國小五年級就跟她講不要管我，反正我就是會考前三名。但其實我的表現一直是超過她所期望的，所以我媽也不大操心。

劉：侯老師你方不方便透露父母親的名字？

侯：可以啊！我爸是侯峰柏，母親是林金菊。我從小就沒有祖父，祖父很早過世了，我爸算是孤兒吧！之前祖父開過工廠，也做過代書，後來得了肺結核，很早就日據時代死了。所以是我的祖母她一個人扶養我爸爸他們兄弟長大，當我後來長大懂事的時候，祖母她就常常會跟我們來住一陣子，再跟我伯父住一陣子。我外祖父他們是住在嘉義縣東石鄉栗子崙的後埔村，我們小時候就常去，那邊是個三合院。我外祖父是農夫，然後有個小魚池，小時候過年就回那個鄉下去。現在很好玩，跟人家講我到底是哪裡人的時候，就變成嘉義縣的人當我是嘉義縣人，然後雲林的人說我因為是虎尾出生，所以是雲林人。

劉：名人可能大家都搶著要。

侯：對，然後我是唸台南一中，所以台南也說我是台南人，當我想說都好的時候，卻又因為我人生一半以上的時間都住在台北，被台北說我是台北人。

劉：侯吉諒和你的關係是？

侯：我的祖父跟他的祖父是兄弟吧！我從小就去過他家玩，然後也知道有他這個人。後來長大認識侯吉諒，可是過了很久才把這兩個拼起來。

劉：侯老師，前陣子聽新聞說你的姪子作文滿級分？

侯：是我妹妹的兒子。

劉：妹妹現在的工作是？

侯：在高中教書。

劉：哪一所高中？

侯：她是嘉義高職，不過嘉義高職現在還叫嘉義高職嗎？

劉：嗯！不確定，我再查查看。所以她是師大畢業？

侯：對，她是師大教育心理系。

劉：我查到的侯文琪先生就是你弟弟？他是台北醫學大學藥學所的教授嗎？

侯：嗯！生藥所。

劉：《頑皮故事集》雖然是以你小時候為藍本，可是裡面的小朋友功課屬於不好，調皮搗蛋的。

侯：對，那是我幻想，我希望的。（呵）

劉：所以那些都不是你真正的經歷？

侯：大部份的故事是啦！因為我是成績好，所以就算很皮也比較不會有後遺症。

劉：所以除了成績不好這點是虛構幻想，其他大部份都是真的？

侯：大部份都是自己的故事。

劉：包括什麼吃西瓜、拔牙，然後丟皮鞋的故事都是？

侯：拔牙不是，拔牙是我太太的診所一個小朋友的故事。然後丟皮鞋那個也不是，是我那時候看到一個我同學的故事。

劉：侯老師你有提到過投稿「校園風波」。

侯：那個是在南梓國小。

劉：差不多是幾年級？

侯：開始會寫作文嗎？我記得作文課是三年級開始，所以應該是三、四年級那個時候。

劉：就開始跟《頑皮故事集》一樣，幻想一些沒有發生的趣事？

侯：對。那時候就開始投稿國語日報，它有個「校園風波」，是專寫學校裡的事情。國語日報有好幾個版面，其中的兩個版面，一個是寫一個故事，另外一個則是刊國小的故事，翻過來刊國中的故事。有一欄叫「校園風波」，它裡面的正文很難投進去，我們那時候小朋友是很難寫到前面的，但是它後面就需要一些什麼學校風波，那個則很容易投進去，而且有稿費。我只是爲了被刊，所以不擇手段，就會去投那個地方。不過校園風波都要稍微有發明一下，因此那時候我發明了很多學校的事情。

劉：你怎麼會有寫作的欲望或投稿在那麼小的時候？

侯：那時候我們的南梓國小家長來自兩個，一個是糖廠的修配廠，另外一邊則是新營紙廠的員工。新營紙廠的員工有一個紙廠通訊，其中有一小欄是給員工子女發表作品的，老師就幫我投稿，這是我第一次在那邊嘗到甜頭，然後我當小學老師的媽媽也很鼓勵。所以我從那個時候接著去投國語日報，國語日報是學校唯一有的報紙。後來還去投王子雜誌，是我國小五年級以後的事。

劉：王子雜誌是當時的一個兒童刊物？

侯：對，那本書辦得非常好，充滿了很多想像跟漫畫什麼的。

劉：那是五年級之後開始？

侯：是到新營國小之後。

劉：你以前有提到說在國小辦地下刊物？

侯：對，是在南梓國小的時代，應該是三、四年級左右。

劉：當時就可以賣一本一元？

侯：對，那時候用複寫紙，一次四張，然後複寫二十本，所以一個東西要複寫五次，就這樣辦了兩期還三期。

劉：同學都會乖乖的跟你買來看？

侯：會啊！

劉：會跟你討價還價？

侯：不會，同學感到很好玩，而且很多時候他們自己也有文章在裡面，所以就會

買一份回去做紀念。

劉：可是導師好像比較反對？

侯：是後來被同學告呀！同學去告，老師自然要處理，我就被叫去罵了。因為那時候一包東西，福利社才賣五毛錢，所以一塊錢是一個小孩兩天的零用錢，媽媽最後發現小孩的零用錢不見了，就會追查，不過我搞不清楚是誰去打小報告的。

劉：高中階段也有個老師說過類似的話，大家都覺得你不做正經事，說你那麼聰明，為什麼不做別的事呢？

侯：那是挨罵的時候，國中倒還好，因為我國中的時候成績非常好。

劉：興國嗎？

侯：對，那時候我成績非常好，興國有個叫做紅榜，就是榮譽榜，我幾乎都會在榮譽榜上。

劉：興國是私校中管得很嚴的？

侯：對，我爸媽那時候希望我考好的學校，所以就千方百計讓我進去，我記得那時候還要抽籤耶！

劉：所以《危險心靈》裡面有些片斷是你的親身體驗？

侯：倒不全然，因為《危險心靈》主要是來自一個在台北碰到的 case，然後我後來大概把台灣的教育事件找了一、二十個，然後再把它拼湊出來。

劉：我有一段印象很深刻，就是你在散文《我的天才夢》裡面寫到有一次有個名人死了，促使你好像第一次發現死亡？

侯：李小龍。

劉：對！你發現人再怎麼樣都會死，然後就哭著跟爸爸、媽媽講。因為我也有類似的例子，小時候對人終究會死，感到非常的恐懼，所以我深有同感。你可以說說看？

侯：就是李小龍死掉嘛！然後在電視上有看到他的新聞，好像大家去瞻仰遺容，我嚇了一跳，因為他是一個英雄、一個偶像，都打贏人家，現在他竟然會死

掉。那是在南梓國小的時代，我有點嚇到了，然後就開始想：哇！天啊！這樣有一天我會死掉，我的爸媽也會死掉，然後我弟妹、所有人都會死掉。我想到這事就很不安心，會覺得現在在幹嘛？結果我就跑去跟我媽講：啊！有一天我們都會死掉，妳也會死掉。我媽就說：神經病！小孩子講這個幹嘛？睡覺啦！你還有那麼多事做。我在想那是我對死亡的啓蒙吧！第一次的啓蒙。

劉：差不多幾歲？

侯：也是小學三、四年級那時候。

劉：就已經開始對死亡有意識到？

侯：不對，是五年級以後，是在新營國小之後的事。有時候我們會騎著腳踏車晃來晃去，我還記得隔天在籃球場有個小孩子說：你怕什麼？他說：你不用怕啦！你死掉，這世界就消失了。

劉：所以這跟你從醫有關嗎？

侯：沒有關係。

劉：可是我記得你後來就開始做事戰戰兢兢、很努力，因為覺得可以避掉些什麼意外？

侯：沒有直接的關係，那是小學五年級的事情，我一直到比較大的矛盾衝突是跟一般人一樣在青少年的時候。我看都是比較早熟的書，記得小學六年級就讀到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覺得感觸很深，可是那時候我連唸國中都還沒開始。唸國中以後，我就開始在看王文興、白先勇，都是現代文學之類，然後還讀到黃春明。所以很好玩，我的當代文學反而是在國中的時候開始涉獵比較多。

劉：是誰引介你看那些書？還是你隨便亂翻？

侯：不知不覺，因為在國小五年級我認識一個朋友，家裡有很多書，後來跟我一樣唸台南一中、台北醫學院，一路都是我同學，很好玩。那時候他家裡有許多的書，所以我常在他們家借書，借了書以後就入門了。另外新營有兩家比

較大的書店，我就常常去那站著看書。不過像我媽媽以前給我看的童書，我都不太看的，因為我很討厭、覺得很難看。那時候我記得是聯合國科教文補助，再由國立編譯館出的一些印刷很漂亮的圖文書，我就覺得好蠢唷！頂多翻一翻大概五秒鐘，都是圖，然後沒有什麼字，就不想看了。後來一直到國小大概五年級的時候，有個同學介紹我看福爾摩斯、亞森羅蘋，還有世界冒險故事系列，因為覺得有故事，我才開始比較喜歡看書。我還去王子雜誌投稿，變成王子小記者。

劉：王子小記者？

侯：王子小記者不到一千個人唷！你要先申請，他會發一個小記者證，然後你就可以寫通訊，它不是說任何人都可以投稿的，它只收王子小記者的，所以要有一張記者證。

劉：那有審核嗎？

侯：要，你得先投稿刊載，刊了第一篇還是第二篇，它才發給你記者證。如果沒有作品刊載之前，它還不發給你，所以有記者證是很了不起的。

劉：國小、國中的階段都是在這樣積極投稿之下，你沒有打算鎖定目標走文史路線？

侯：沒有啊！我成績很好，在學校是那種搶全校第一的人，你想我怎麼可能跑去唸文組？那種氛圍是不可能的。當時成績最好的是唸丙組，再來唸甲組，然後才是唸乙丁組，所以乙丁組基本上都是在班上唸不下去唸的，所以很少。那時我幾乎沒有看到立志要唸法律系的，特別在南部，後來我在唸南一中也是那個氛圍啊！

劉：你國小、國中在唸書方面都那麼順利，那除此之外，有沒有遇到過比較大的挫折？

侯：沒有啦！就追女生，然後好像有一搭沒一搭，不過好像也沒有怎麼追女生，都是女生喜歡我。

劉：是因為功課好？

侯：對啊！加上也會寫稿子，我有沒有什麼挫折？幾乎沒有，以前國小、國中的最大的挫折就是沒有考到第一名，那已經是最大的挫折，然後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因為家裡很安穩呀！反倒比較多的問題都是成長上的，因為我看的那個書的世界很大，對照我周遭每天卻只是在這邊不斷考試。

劉：你那時候沒有想要抗拒？

侯：那個年代沒有別的方法，因為我就住在南部的鄉下啊！能抗拒什麼？我的意思是說不像現在起碼禮拜五、禮拜六日，大家有舞會可以參加，西門町可以去逛，我是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在《天才夢》裡就寫到我拿那個時候流行的音樂雜誌，然後就看著艾爾頓強戴著個大眼鏡在搞鬼，有幾千萬人在英國的倫敦演唱，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我翻著就覺得說：吭，怎麼有這種世界？我完全連電視都看不到。

劉：所以那時候成績好對你來講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侯：不知道，那時候不會想那麼多，反正就是得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方法。

劉：那會是一個光榮或者好勝心嗎？

侯：會啊！當然會啊！但那是一種鴉片，你得過第一名，一旦知道你有這能力，你就很難不想去得。

劉：那跟同學的關係會不會因為這成績的競爭而變得比較勾心鬥角？

侯：不會，沒有什麼好勾心鬥角的。

劉：因為贏不了你？（呵）

侯：對，沒有什麼好勾心鬥角的，因為就只有那幾個人是競爭者。而且真的要得第一名也要夠努力，不是說只有聰明就行，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點獨善其身啦！當然也交一些朋友，不過也沒有想要跟全班都做朋友。但是後來很好玩，到國二、國三的時候，我反而認識一群那種成績很不好的朋友，只因為覺得這些人特別有趣。

劉：那你考試要不要罩他們？

侯：對！就是因為罩他們考試，變成很好的朋友。後來這些人功課不行了，就轉

到壞班去，惹出的事情很多，像爲了女朋友爭風吃醋、打架之類的，然後這些人打來打去到最後，ㄟ！我竟然變成是那種仲介協調的，就是說搞不定的事，我可以出來搞定，在國二、國三有一陣子是那樣。

劉：老師不會叫你不要跟所謂貼了標籤的壞學生在一塊？

侯：我不會讓他們知道啊！而且老師很難對我怎樣。

劉：因爲有一個好成績當保護傘？

侯：對！然後我那時候跟他們什麼調解也不是公開的，都是私底下放了學，約在後面的什麼甘蔗園前面之類的地方。這大概也形成了後來我寫《危險心靈》裡，故意要丟幾個那種壞小孩的邏輯。因爲我覺得他們那些人很有趣，然後所謂的放牛班常有很漂亮的女生。你現在來看這些小孩都很不錯啊！他們如果走的不是讀書這條路，而是演藝圈的話，樣子都很好看啊！反正我就覺得那個世界很有趣啦！

劉：侯老師你在國中、高中讀了那麼深、那麼廣的書，會不會因此跟同學的話題比較沒有交集？

侯：還好耶！我覺得我從小就還蠻普羅的，我很少去跟人家講我在唸什麼書，如果你不曉得我這個人怎樣？你就只覺得還蠻普通、有趣的。

劉：你不會覺得說好像這些人很幼稚？或者他們這些人都不懂？

侯：無所謂，反正人就是有幼稚，但是也有很厲害的啊！

劉：就是借你書的那個人還可以跟你聊聊？

侯：對，然後我有一些朋友，但我的朋友也分，打屁的朋友歸打屁。我們那時候最愛的就是禮拜六、禮拜天，兩三個同學騎著腳踏車晃來晃去，有時候吃個冰，有時候打打球，看到什麼就罵一罵、講一講。

劉：就是在興國的時候？

侯：對，那個氛圍就是青少年的氛圍，我們騎著腳踏車，然後整天在這個小鎮裡閒盪，如果碰到誰就跟誰聊一聊，那是屬於我們小鎮的氛圍。你說跟那些朋友會不會聊不上？其實我的朋友沒有一個在看我看的書，可是也 OK！

劉：在國中有沒有哪個老師對你影響比較大？或者國小的老師？

侯：國小？

劉：對你的文學或者對你的作文。

侯：其實老師都不錯，碰到的老師我算都喜歡。但是文學這一塊基本上是自己追求，因為我寫的作文、看的書跟他們還是不一樣的。

劉：老師都會給高分？

侯：對！因為他們那種要什麼蔣公啊！然後要什麼反共大陸啊！那個我也都會寫！

劉：所以你也會迎合他們的口味？

侯：我小時候之所以喜歡寫文章，是因為那個文學的世界是一個秘密的世界，是一個我可以自己弄的世界，是一個我的媽媽、我的老師都干涉不了的世界，並不是因為我在學校可以作文得高分讓他們高興的世界，因為那個世界我的成績就夠了。我有一個很小的秘密世界，像我在看熱門的音樂雜誌，或者在看那些怪書。那個時候怎麼讓他們看王文興《背海的人》呢？我不懂怎麼讓他們看？因為王文興《背海的人》翻出來第一頁就「幹！什麼什麼」，接著幹譙了一整頁。然後《家變》也很好看，完全在講小孩子跟家裡的關係，他看穿了父親的虛偽，看穿了那個家世的敗落。不過像這些書怎麼能夠去跟我父母談呢？我爸媽都是鄉下畢業的小孩子，兩個人結婚在一起，從沒有錢到租房子，再搬去住公家的宿舍，最後買了自己的小房子，然後開始養孩子，他們那個氛圍跟我生下來的那種怪氛圍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能給我父母親的就是他們養的孩子很乖、成績很好，然後很優秀，他們也很滿意地過著小康、幸福的生活，這就是他們的氛圍啊！一方面我要去滿足那個氛圍，而周遭的老師也很滿意那個氛圍，但同時我也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小怪世界，那個世界就是很怪，不需要、也不用、也犯不著去跟別人分享，所以我沒有跟我的朋友談那些，只有另一個朋友會多少談一些，因為書是跟他借的嘛！但是我後來看的書真的是已經很怪了，那時候還看村上龍的《接近無限透明

的藍》，那是他最早期的書。還有李昂最早的書《花季》，那些人當時都還不出名，可是他們的第一本書我都看過。後來我跟李昂說她出的第一本書《混聲合唱》我看過，她嚇了一跳，但我那時候根本不曉得她是誰？然後還有《花季》，它是講一個女生在幻想花匠會強暴她，如果強暴了，她該怎麼辦？結果到最後根本沒有發生什麼事，她反而好像隱約有點失望，這是李昂的第一個短篇小說。我那時候亂七八糟的看了一堆沒有分類、沒有系統的書，就是雜七雜八的在腦袋裡裝了一堆東西。你有時候想說那是個怎樣的小孩？在看Queen，然後再加上村上龍，加上李昂，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是什麼？可是那個世界就是很好，是我自己的一個小小世界。

劉：你到了台南一中之後，成績好像是因為辦了班刊而下滑？

侯：糟了！糟了！

劉：結果一方面弄得不愉快，一方面還影響了你的成績。

侯：我記得我高一的時候還第三名嘛！但到了高二就變十幾？

劉：十三？

侯：十二、十三，反正就是這樣。因為我高一下的時候開始辦班刊，後來高二就換了新的班級、導師。

劉：結果又要新同學付錢？

侯：對，然後大家意見很多，加上剛開始經驗又不足，其實那時候就該結束了，可是沒結束，一直拖到高二老師說要收心讀書了，所以那個時候就搞得很不愉快啦！在高二下學期，我一直被罵，但到最後我也不走，然後就學習一個人過日子，用一個人的身份在那個班活著。到了高三的時候，才和一兩個同學互動，有個小圈子，我就用這種方式活到了畢業。

劉：雖然在一般人的想法裡，第一志願的十三名已經是很棒了，但爸爸好像對你考十三名是不是很失望？然後你會覺得有愧疚感？

侯：不是，這可以理解啊！因為一直是住家裡的小孩，突然去外面唸書，唸到有一年起了很大的變化，他一定會關心啊！

劉：可是南一中的十三名還是很強啊！

侯：嗯！那時候如果要唸醫科，十三名就不夠了。

劉：你那時候就鎖定是醫科了？

侯：對！我一直都唸自然組嘛！

劉：那醫科是你的想法？還是說家人、師長的共同期待？

侯：共犯結構啦！

劉：你會覺得是一種壓力嗎？

侯：不會，就覺得應該要達成目標。

劉：是因為世俗都認為功課好就要考醫科？

侯：對，功課好就唸醫科。而且醫科也不錯，我自己也不是沒有興趣，那個時候有契可夫啊！毛姆啊！所以就覺得當醫生很不錯啊！還可以理解人家沒看過的事情，加上我也被那個環境洗腦到覺得這是件很神聖的事情。

劉：你提到高中時期有個同學跟你一起努力，然後結果後來好像隔了一年？

侯：他考上台大電機系。

劉：對，但在意外中過世了。

侯：他高二跟我同班，然後高三轉到甲組，後來在甲組成績就衝起來，讓我會很注意他，後來好像台大電機系唸到一年級的暑假他就過世了。我們台南一中到最後五月就停課了，很多學生就會回去利用教室開放唸書，所以我還常看到他，但好像也沒講過什麼話吧！後來大一暑假就聽說他過世了，印象中有這麼一個人，胖胖的。

劉：它會是對你的一個衝擊嗎？

侯：會吧！

劉：因為你努力那麼多，可是人生的無常卻會剝奪你所有的一切？

侯：這是比較早期的衝撞啦！畢竟認識的人嘛！但後來到了台大醫院做末期癌症，在我面前過世的病人，大概就有四、五百個，那又更龐大啦！

劉：到最後會變麻木了嗎？

侯：不會啊！就是因為不願意麻木，所以就會很 suffer 痛苦，因為這件事你花再多時間都不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醫師，更何況我還要寫東西。而且如果你當醫生追求的都是更有名、更有錢、更有什麼，那其實是很荒謬的，因為人在臨死的時候，他們最在乎的都不是那些。如果人生是 permanent 永遠的，那你當然可以這樣搞，就搞得像秦始皇一樣嘛！可是人生是很有限的，也就這麼幾十年，真的腦袋清楚的時候，就覺得一直在把這些時間拿去弄錢、累積這些名利是很蠢的，這是我那時候的覺悟。

劉：後來考上了台北醫學院，我記得你有段文字寫到爸爸高興到放鞭炮？

侯：那是南部的習俗。

劉：可是你那時候反而有一種失落，覺得一切沒有那麼值得慶祝，因為時光換不回來的感覺？

侯：對啊！那鞭炮很奇怪啊！就是一方面很誇張，但你又不能不讓他放，因為我之前有一個表哥，他就是考上台大醫科，現在已經在美國當醫生了，他們家就這樣放過了一次嘛！我爸就覺得說我家裡也要放一次這樣子，但反正那就是一陣煙，然後很不切實際，害我都想去躲起來了，想說這事跟我沒有關係。

劉：考上了醫科，你總共只興奮了幾天？還是說也沒那麼興奮？

侯：也沒有那麼不高興，再怎麼說，我高三有唸了一陣子書，也還蠻怕說沒考上怎麼辦？因為我原來的想法就是要唸醫科的嘛！後來好歹也考上了一個醫科。當然弄得那麼誇張，那跟我沒有關係，我沒有興奮到那個樣子，要公諸於世，要昭告世人。但是對於能夠去台北唸書，然後離開我那個住的小小的地方，還是有一種期待，因為我經歷的將是個完全不一樣的環境，我覺得這個是還蠻有趣的。那時候我還把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燒掉，但真的沒有想到後來四十歲的時候又回來看這些東西，還回來寫，完全沒想到。

劉：在高中以前，你覺得父親或母親對你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侯：他們給我一個典範中的中國傳統小家庭，父嚴母慈，其實我爸也不嚴。然後有溫暖的家庭、小家庭的期待，所有一切該有的典範他們都給我了。而且我

的父母親是非常好的父母親，我對那個小小的環境的不滿意，其實是來自那個格局。

劉：很封閉？

侯：對，是那格局，但是我對我的父母親是充滿了敬意，因為他們給了一個小孩子很多，像我現在回想最快樂的時光就是童年。

劉：就是那階段？

侯：特別是唸小學之前，小學以後因為牽扯到了期望啊！考試啊！那個並沒有那麼純粹，但小學之前的人生是我到現在為止最美好的時代。

劉：為什麼？

侯：你看我寫的東西，很多人他有一個叫做文學的鄉愁，有些人文學鄉愁是很老的，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但我的文學鄉愁全部是童年，我不管寫《白色巨塔》，不管寫謝政傑，不管寫《頑皮故事集》，裡面的標準都是用那個小孩子的標準在看待世界。

劉：包含《白色巨塔》也是？

侯：對，《白色巨塔》基本上是寫一個人在那個變成成人的掙扎裡面。主角到最後在哭的時候，是因為他還帶著剛走進這個醫院裡面時，那個童年的小孩子。

劉：老師，這段是不是有點像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那段？

侯：有一點！

劉：因為有出現「現世安穩」四個字，然後那個畫面就很像振保再遇到紅玫瑰後哭的畫面。

侯：我覺得張愛玲比較滄桑，她從小就變老人了，這是因為她家裡、她母親的關係。可是我比較不是，就說我的人都沒有那麼老人，即使謝政傑後來在哭、即使蘇怡華後來在哭，其實都還是為他那個失去的小孩子在哭。

劉：因為那個背景好像也是遇到女朋友跟一個鄉下的醫生在一起，他覺得自己當到主治醫師應該很開心，可是卻發現其實並不是這樣的時候。

侯：他失去了他所有的童真。就是說他好像擁有了這些成人要的事，可是他放棄

掉的是他那段最沒有算計的時候的愛情，或者是原來當醫生的那個使命，最純真的使命。所以那個純真的主題，或者是小孩子的那種快樂、開心，就是我某個文學的鄉愁吧！

劉：包含《靈魂擁抱》？

侯：對，《靈魂擁抱》是更複雜的一個，它有一點像萬花筒，是一個鏡子反射一個鏡子，所以《靈魂擁抱》是比較隱晦的啦！他的童年藏的很深、很深，你看不到他的童年在哪裡？反倒《危險》是比較清楚的。

劉：這三本書其實都跟你的身份有關，醫生、作家、學生，所以是不是都以你最熟悉的角色當題材？

侯：對！我比較偷懶一點，會取巧一點。

劉：在後來寫的時候，都有預期它會被改編成爲電視劇？

侯：沒有！《白色》在一九九幾年的時候完成，沒有想過改編成電視劇。然後《危險》更沒有，因爲《危險》寫完我就覺得這沒有辦法拍成電視劇。

劉：後來還是拍了。

侯：還是拍了！然後《靈魂》也很複雜？其實《靈魂》還不夠複雜，那個時候如果再悶個一年會更好，可是《靈魂》已經有人覺得受不了那個複雜了，但無所謂，到了一個年紀，我也應該可以有點自由了。

劉：我裡面覺得最精彩的就是她拿那個羊角鎚。

侯：喔！在鎚、在打！

劉：因爲我覺得那邊已經有點像驚悚小說那種敘述了。另外，好像每一本裡面都有提到死亡，《靈魂擁抱》裡那個讀者死了，然後《白色巨塔》裡的陳寬死了，最後《危險心靈》也有一個上去彈吉他的學生自殺嘛！

侯：對！沈偉！

劉：那些死亡都給他們主角很大的衝擊，那是湊巧？還是說你都故意安排的？

侯：不是湊巧，也不是故意安排，但是這件事可能在我心裡就是一件事吧！因爲你想我經歷那麼多死亡了，很難在談人生的事情，或者在談一個大議題的時

候，卻不把這個放進來談，而且那也會讓小說變得比較有座標感吧！人生是一個生下來到死亡的座標，然後我們還有對照好幾個的座標，比如說要有名氣的座標、要有錢的座標、要成功的座標，那死亡也應該是個座標吧！

劉：還有新聞媒體呢？三本小說好像都跟新聞媒體扯上不小的關係。比如說《白色巨塔》那個時候的醫療糾紛在媒體曝光，《危險心靈》跟媒體更有關，而《靈魂擁抱》也是因為媒體炒作。

侯：對，這件事已經是我們存在這個當代社會裡面，不得不跟它共處的一個東西了。而且媒體是這個時代，大概近一兩百年的一個很大特色吧！特別是到了後現代的社會裡面，媒體是一個我們必須跟它相處，然後其實我們又不太瞭解它的東西。我對自由這個事很感興趣，不管我談的《白色巨塔》、《危險心靈》或《靈魂擁抱》，基本上都在討論人怎麼會創造體制，後來卻被這體制制約？照說人去創造一個東西，是爲了讓它方便我們，可是到最後所創造的那個東西不知不覺的，我們被它制約了，變成這個東西的囚犯、奴隸。人如果不搞清楚這些東西，活著永遠就是這個樣子。媒體是裡面其中很大的一個操配者，所以很難不去講媒體啦！反倒是我覺得前面兩本，媒體都是一個被動的角色，直到《靈魂擁抱》的時候，媒體變成一個我來看它的角色，可是我覺得因爲自己沒有在媒體裡面真的工作過，所以覺得我寫它還寫得不夠好。

劉：其實媒體算對你很友善，然後你也算能言善道，又跟媒體關係似乎不錯，有沒有考慮那時候就一腳整個跨入媒體圈？

侯：沒有！那這跟我再去考個醫學院有什麼兩樣？

劉：所以文學還是你的最愛？

侯：對！你那個問題很好玩，我沒有傻到覺得媒體那麼好，或者我們應該擁抱媒體。所以問我爲什麼沒有跨進媒體圈？我一直在跟它保持一個很適當的距離。

劉：可是它會不會很誘人？

侯：什麼意思？

劉：媒體，那種權力、光環？

侯：不會啊！你見識過死亡、見識過人生、見識過更深刻的事以後，你就不覺得那東西很了不起了。當然它很重要啦！它是一個你在賣書時必要有的條件，但是並不會是你要追求的目的啦！

劉：提到文學的話，我想要跟你聊聊就是有關希代、紅唇族的事。因為我自己後來才想起，我其實好像也是看希代的書長大的。林黛嫻她有寫一篇論文是討論紅唇族的，這裡可不可以講一下你跟希代的關係？

侯：那時候，其實希代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幫我們這群人出書嘛！

劉：你算第幾批？

侯：我是張曼娟之後的下一批。

劉：下一批是六個女孩子嗎？

侯：我跟她們在同一個時期，那時候就找了六個女的，但我沒有算到那六個女孩裡面。我最大的被攻擊就是被誤以為是女生，然後被誤為是紅唇族。

劉：是因為名字的關係嗎？

侯：對！然後因為我沒有照片嘛！所以《七年之愛》就被誤以為是女生。

劉：當時不是要放照片嗎？這也是他們的賣點啊！

侯：老闆看到我就說不用了，可以不用放照片，其實他大概比較知道我的路數跟他們不太一樣。因為我那時候寫《七年之愛》是講醫學院的事，然後他們那時候寫的校園主題多半是愛情，所以我跟她們擺在一起會很奇怪啦！那時候郭強生有跟她們擺在一起，因為他寫的再怎麼說，還是愛情的故事嘛！而我是沒有的，所以就完全被獨立開來。那時候我記得有一次被罵說：紅唇族光有一些美色啦！封面啊！寫一些愛情小說啦！包括誰誰誰，其中還有侯文詠。而我的《七年之愛》也被當成愛情小說，我那時候就跟苦苓說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還算有美色，憂的是無緣無故也一起挨罵。

劉：可是我後來發現《七年之愛》其實很多作品是得過獎的，當初已經得獎得的

作品再收集成冊。你會不會覺得很冤枉？大家也不看這些得獎的作品，就一味的攻擊？

侯：不會！你要跳到另一個層次看這件事，那是一個市場，是一個時代的氛圍。就好像現在大陸開始轉變的時候，他們很多年輕的作家，像韓寒、郭敬明，當然他們每個後來發展都不一樣，但也都是被罵到臭頭啊！就是時代在變，我們那個時候剛好是有一個斷代，這群人用完全是大眾文學或通俗小說的方式寫作。其實現在也沒那麼通俗，跟現在網路文學相比，又變成中間小說了。可是第一次從純文學開始出現有所謂中間小說這種東西的時候，自然會有那個文化上的，然後世代對世代的這種不滿意或什麼。我覺得批評只是一種包裝，因為你回頭過來看，我們這個世代也就是那些人在寫啊！

劉：對啊！而且也都很持續，經過時代的考驗。

侯：對！就這些人在寫，所以換句話說在我們這個世代，它就是那樣的邏輯，到了新的這世代，你看就是網路文學作家了。不能說他是網路文學作家，所以你就批評。

劉：就被批評？

侯：對！然後不能說我們這個世代因為有照片在封面，因為寫愛情就該被批評。其實那個時候寫出的愛情小說真的很特別，它不再是以前有民族、有國家、有鄉愁，那種傳統的純文學的樣貌。因為在我們之前是多半要經過聯合報、中國時報的文學獎，然後由他們去背書，那好像是一個選狀元的機構嘛！所以選出來的人就完全寫的是這種非常純文學，而且符合了老一輩的口味，因為是這些老評審認證挑出來的。但我們這群人完全不是屬於這個系統出來的，雖然好歹我跟曼娟有得過一些文學獎，但都不是那種大型的，像聯合或中國之類，卻一下就跳到這個位置來，寫的又是校園小說，然後又完全不是那種純文學的路數，所以我覺得那個衝突在所難免啦！

劉：希代是苦苓介紹老師去的嗎？還是怎麼會跟希代牽上線？

侯：我不曉得他們為什麼會找我，不過我想應該跟苦苓有關，因為苦苓有一陣子

在當他們的主編嘛！這些人應該都是苦苓找的，沒有錯！我在希代一共出了兩本書。

劉：《七年之愛》跟《點滴城市》？

侯：不是，是跟《誰在遠方哭泣》。

劉：你們後來爲什麼都陸陸續續離開希代？

侯：也沒有說陸陸續續離開啦！因爲後來我的書同時在很多地方出版，有一陣子譬如說我在圓神出，然後有一陣子在皇冠出，然後希代也出，到最後就發現那個氛圍讓我覺得比較舒服的是皇冠。

劉：他們是不是先有雜誌？小說族雜誌這本？

侯：都一樣啊！皇冠也有一個皇冠雜誌啊！

劉：我的意思是指希代這些小說族的作家是先在小說雜誌出單篇，然後再集結成冊嗎？

侯：不一定，我們那時候因爲到處被邀稿，後來再收集那些稿子變成出書，所以並沒有說一定要先在小說雜誌上發表。

劉：會發表在希代的小說雜誌？

侯：有！有時候發表在那裡，可是我的小說發表在那邊的恐怕不到十分之一吧！

劉：你覺得那個經歷對你現在來講會不會是一個障礙？也就是通俗作家的包袱？

侯：不會啊！那是很重要的階段，而且我想要當一個通俗作家。

劉：即便現在也是？

侯：對，我不想當一個純文學作家。

劉：所以你會期待一個文學的定位？不介意大家把你看成一個通俗作家、暢銷作家？

侯：那很好啊！因爲像歐美的文壇以前都要畫油畫，後來有普普藝術以後，那些人被罵翻啦！可是現在你再回頭看那段普普藝術，它就是那段時間的代表啊！不管說是魯迅，或者是老舍，那時候也是通俗作家啊！然後三國演義我想更俗了吧！所以我覺得通俗沒有什麼不好，而且我們當醫生的都會覺得如

果病人不吃藥，醫術再好也沒有用，那這年頭如果不通俗的話，誰要唸文學呢？

劉：那是大眾給你的肯定，但如果是學院內的呢？

侯：無所謂！

劉：無所謂？

侯：對！

劉：所以說不會很期待能給你一個文學上的定位？

侯：我自己也從學院裡面出來的啊！學院是什麼東西我知道啊！我不期望靠著學院來維護我的文學生命，那應該是由讀者，而不是學院。

劉：五年級很多作家都有那種壓力，像黃國峻、像袁哲生，你怎麼看待你們五年級生的壓力？

侯：這群人我不太瞭解他們，而且黃國峻不是五年級生，黃國峻很小啦！他比我們小很多很多，況且他們各自去自殺的理由也不同，所以我覺得不能把它當同一件事。至於你說五年級生的壓力？這個問題很籠統耶！

劉：就是說會不會急於給自己人生一個結果、定位？好像時間已經很緊迫的感覺？

侯：不會啊！我還要活很久。

劉：不是這意思，就像張愛玲說的那種成名要趁早，然後要再更大的？

侯：不會，那是一個假的東西

劉：那現在文學對你來講的目的是什麼？或者你想要追求的是什麼？

侯：我就一輩子都在做這件事啊！

劉：這是一種樂趣？

侯：我不想講大話、也不去講不可能的事，更不想去講太多讓自己理直氣壯的虛幻東西。至於名氣這事，說穿了只是把書讓人家看的一個推力而已嘛！重點是在於這書被讀了，別人有沒有感動？喜不喜歡？文學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可是現在倒回來變成文學沒有人在講誰讀它？讀了有沒有感動？反而回

過頭是在講那個名氣、定位，那都是假的啦！那東西是沒辦法被定位的，你如果看過蘭陵笑笑生的東西，他這輩子又怎麼被定位？但那東西就是很好啊！雖然他也被罵了四百年，可是他的東西一定還會被翻過來的。我之所以這樣想，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會讓我寫很久的態度啊！那我就喜歡做這個事，喜歡別人讀的時候很開心，喜歡別人讀的時候，感受到像你剛才說的，我講的事你也感受到，那這種就是人類的共同經驗裡面的一種聯結嘛！這個作品在了，我們因此透過作品聯結，在聯結的時候自然有一種感覺、感動。不管寫的人跟看的人都是那個聯結裡面的內控經驗的一部分，所以沒有那麼了不起，也沒有那麼需要被定位。因為那個定位還是回到寫的人好像是高高在上的位子，我不覺得這樣，我覺得寫作不是作者論，反倒多一點是讀者的。

劉：作者已死？

侯：也沒有到死，就說作者也是一部分啦！但是他並沒有比讀者大多少，有時候讀者加在一起所能夠決定的遠比作者大的多。我們其實是透過文學這個工具在共同理解人類的聯結裡面的互動、感動，就是這樣而已！所以越把自己弄到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定位，就更虛幻，因為那個東西只是文學的手段，不是文學的本質。所以要回到文學的本質裡面，我就是做這麼一件事裡面的一個。如果一定要講說什麼定位，這就有點像以前說：我要怎麼拯救國家啊！怎麼樣讓民族可以強壯！我沒有這樣，因為我覺得那樣是虛幻的，寫不久的啦！所以像我們會寫很久，就是也理解到這個事，然後就開開心心的做，我沒有要什麼定位。而且我覺得台灣讀者回報給我的善意，

劉：非常的大！

侯：對！甚至說給我在經濟上的條件，我都很滿足了。所以覺得說不需要再求什麼定位，這已經超過我需要的了。

劉：我後來有發現你早期散文的文字風格比較雕琢，所以不是不能夠寫那種雕琢的文字，可是我後來發現你的長篇小說大都是平鋪直敘，開始不賣弄文字了，你是刻意的？

侯：那樣雕琢你讀得完嗎？

劉：因為我看《離島醫師》有附錄一些當時的散文。

侯：那時候多少有些受其他作家影響啦！不過越來越會像自己，我寫極短篇的時候就在想一件事，想說可不可以寫到沒有字啊？所以就把字句弄到很短、很短，因為覺得字好煩喔！譬如說有時候看那些老先生、老太太講的話不合邏輯，而且還在講童話，那話完全不合文法，可是就特別有意思，你知道他在講什麼。反而那種跟你講話很流利的人、字正腔圓的人，你會覺得說有點怕他，因為他太流行了。後來我就在想說這事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妥協？也就是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我認為寫文學的人第一個障是文字障，很多人一直誤以為說文學就是文字，可是那個文字的障如果一天不去掉，永遠就在那個迷魂障裡。文學是要到最後什麼都沒有，就是直指人生啦！

劉：所以你就覺得賣弄文字，或者是雕琢那些文字已經不是你要追求的？寫那種很深的詞，然後那種特別的句子？

侯：不但不要追求，更要趕快遠離的。

劉：講到你大學時期，讀醫學院應該很忙，怎麼還有時間去創作？

侯：就是有啊！你想你的人生再怎麼忙，你想談戀愛還是有時間啊！

劉：因為我對醫學院比較沒有概念，你們怎麼實習？或者是說整個學習流程？

侯：我們一、二年級唸基礎、唸通識，三、四唸基礎醫學，五、六就見習，最後七年級是實習！

劉：你那時候五、六年級在哪邊見習？

侯：我在好多醫院，主要以榮總為主體。

劉：台北榮總？

侯：台北榮總。

劉：然後七年級？

侯：我看我七年級？沒有啦！五年級在很多醫院，六年級、七年級在台北榮總。

劉：六、七年級在台北榮總？

侯：OK！

劉：那是見習？

侯：我們那時候見、實習連在一起，所以六、七年級都在榮總。我那時候 round 的科比較多，這個也很好，讓我後來在寫實習醫生有很多題材，不然你一年十二個月怎能夠跑十二個？而且分科很細，光是一個內科它可能就要分八科，只有十二個月怎麼跑得完？所以我後來變成兩年就有二十四個月，有些小科半個月，所以我 round 了二十幾個科。

劉：在七年級畢業完就選科嗎？還是？

侯：去當兵！

劉：所以選科不是在七年級選的？

侯：是在當兵完之後，申請醫院的時候。

劉：喔！去住院醫師？

侯：對！

劉：所以你是七年級畢業之後就去考預官？然後當兵？

侯：六年級考預官，七年級畢業去當兵。當兩年嘛！退伍之後進台大醫院。

劉：所以在《七年之愛》裡面那些都是真有其人？

侯：對！同學！

劉：那些都是真實故事？

侯：大部份，或取材自真實故事啦！不能說真實故事。

劉：所以大家比喝酒啦！那些都是真實有發生的事？

侯：對！

劉：然後只會讀書，不會追女朋友的那些？

侯：對！

劉：老師是在澎湖當兵？

侯：兩年！

劉：你有提到在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原本想要去唸電影？

侯：對！但後來就沒有了。

劉：那時候念頭有很強嗎？

侯：就想去啊！都去打聽、去找資料了，那時候也沒有網路可以查，所以還找資料啊！但是一抬頭、一伸出來就，

劉：就被砍了？

侯：對對對！

劉：是在幾年級認識你老婆張雅麗小姐？

侯：我大一、大二就知道她了，因為她是南友會的，從台南女中畢業。我們班有一個當會長，她是副會長，那時候就知道這麼一個人，然後也會打招呼。她是到我大四的時候，才去參加耕莘山服團，現在叫耕莘學習團。因為我大一暑假就去了，所以我那時候已經是比較資深，後來在我大五、她大四的暑假時一起上山，在山上待好像快一個月。我那時候同時在當學校綠杏校刊，還有電影會主席，所以請她當我的總務。

劉：那時候是故意的嗎？

侯：故意的！

劉：是第一次見面就對她有好感？

侯：不是，是後來才慢慢理解，啊！這個人跟我想的又不太一樣。

劉：所以有好感是在她一進社團的時候？

侯：對！就是慢慢理解她，因為她以前其實在學校就裝得很漂亮啊！然後飛來飛去啊！惹了一堆蒼蠅，我就覺得這種女生很糟糕，所以互相沒有什麼好印象。但後來才看這個人還蠻有趣的，跟我想的不太一樣，所以在在大五才想說那不然給她一個機會看看！

劉：她是你的初戀嗎？

侯：不是！當然不是初戀。

劉：初戀是什麼時候？

侯：國小。

劉：不算國小的那種呢？真正的。

侯：大學，大一！

劉：所以老婆是第二個？

侯：不能算！

劉：你有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在宿舍成立什麼失戀者保護協會？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

侯：沒有啦！就是班上同學在大一就有什麼初戀，後來我先失戀嘛！宿舍男生就很無聊啊！班上同學就有幾個人，那時候還有個香港僑生也很愛打屁的啊！有人失戀就跑到我們那邊去，那個好像是大一、大二時候的事情！

劉：像老師提到在澎湖當兵時，她跟你們家人好像有些爭執，你很怕會分手，所以就打電話故意說旁邊風吹的很大，那都是真實故事？

侯：對！那都是會有的吧！

劉：但是蠻有趣的，我覺得！

侯：你沒有碰過嗎？這種？

劉：可是假裝這種東西，然後對方竟然也相信。

侯：喔！在澎湖很方便啊！（哈）

劉：所以是退伍之後就馬上結婚了？

侯：對！那時候要去美國參加一個文學會議，在我退伍的時候，所以就問她要不要跟？她覺得很好玩，想去。後來被問說我們要住一個房間？還是兩個房間？然後我就想說：這樣住兩個房間很奇怪，可是住一個更奇怪，因為一群人裡還有媒體一起去啊！我就趁機跟她說不如就結婚了吧！然後她也說好啊！就這樣。

劉：所以沒什麼特別的？

侯：還蠻無聊的。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已經交往一陣子了。

劉：中間不是都有很多競爭對手？

侯：沒有，當兵的時候已經很穩定了。應該是說大五、大六開始慢慢穩定，大七

的時候就很穩定了。那些競爭對手，大概五年級我請她來當我的總務的時候，

劉：也都砍光了？

侯：差不多！

劉：所以也是在當兵的時候跟吳涵碧牽上線？

侯：當兵的時候我有一篇得獎作品，叫做〈考試真好〉，有收在短篇小說集，然後她看了很喜歡，就一直在追我的電話，她打了好幾通到我的部隊裡面來。

劉：所以她沒有真的飛到澎湖？

侯：沒有，她是打電話找，後來還被人家誤以為是我的女朋友。接著就開始要我寫，然後我寫了第一篇，她跟我說很好，給了我一些意見，但最後沒有刊登。我再寫第二篇，就是〈看牙醫〉，然後就對了！她說這個好有趣，馬上就發了，我這才知道說第一篇是被退稿了。後來就開始照那個路數一直寫，我說要寫這種我可以寫很多。

劉：那怎麼沒有持續在寫兒童文學？

侯：我其實從來沒有想要寫兒童文學這件事，是因為吳涵碧那時候在編《中華兒童》，所以她才被她抓去寫。那為什麼會這樣？是因為我從小就很討厭兒童文學。

劉：可是你寫的也跟傳統的兒童文學不一樣呀？

侯：所以那時候我也不覺得我在寫兒童文學啊！可是竟然沒有想到，後來是上次你們老師？

劉：許建崑老師，他那時候就發現你真的很厲害。

侯：沒有，他就跟我說：你只有寫一本，結果一直好像被當做一件事。然後我就說沒有耶！我真的沒有耶！

劉：可是那本反而是算你最早的成名作？好像比較廣為所知！

侯：也不然！因為最早它被收在九歌的四本合集裡面，所以它一直賣不好。

劉：是越後來越好？

侯：是後來因為我在皇冠出書了，像是《親愛的老婆》，然後還常在電視上露臉，

開始紅起來的時候，同時《淘氣故事集》也紅起來。九歌這才意識到要把它挪出來變成單行本。它單行本到現在就發行三十幾萬本啦！

劉：那後來退伍、結了婚之後，是多久生下老大？

侯：你那個資料有點錯。

劉：我用推的。1992不對？

侯：91的年底。12月16號。

劉：那老二就對囉？

侯：老二對！他是94的年初。

劉：因為我知道有一個繼續在台灣升學，而老二是直接去美國？

侯：在去年，去年他考完試，然後考不好。我說那你要不就去唸，不然重考，不然去美國。他想了一下，決定要去美國。

劉：留在台灣的是老大？他是唸哪？

侯：老大，他是唸師大附中。

劉：然後大學是？

侯：他考到一個私立大學，他很不滿意。

劉：所以會不會因為你跟你太太都是醫生，從小成績都很優秀，所以雖然你給孩子很大的空間，但有時候心裡面還是會覺得說我就不信邪，爸爸教不會或媽媽教不了？

侯：沒有，我不覺得這樣。我兒子前幾天才跟我說，我 Facebook 也有寫，他說他覺得選擇比努力重要，然後他說如果你選對的東西，就算努力不夠，你都還有機會。

劉：所以你沒有從小教他功課？

侯：我不太會，他媽媽比較會逼啦！我覺得他該吃的苦、他該功課考不好、他該有挫折、該什麼都是好事。

劉：那老大為什麼沒出國？

侯：現在在當兵啊！

劉：我是說爲什麼老二國中就出國？

侯：他們都沒有想出國，都是一直想要在台灣唸書的，後來是唸到他們覺得受不了，或者覺得在面臨一個選擇的時候，他們才做這個決定。所以小的出國的時候，他也沒考托福，然後就找了一個亂七八糟的學校，就去唸了。

劉：小的是國中之後馬上出國？

侯：對！

劉：做父母的你會捨得嗎？

侯：還好耶！就 boarding school，美國的住宿學校把小孩照顧的非常好。

劉：所以你們會飛去看他？

侯：不會！讓他回來。當我小孩算很幸福，但也很不幸，因爲他會比爸媽累。

劉：我印象中最深刻，有一次他好像動作比較慢，那是老大還是老二？然後一路在抱怨你，你就突然把車停在旁邊，說下車、下車？那是老大嗎？

侯：老大！那時候太誇張了，沒有帶過小孩，脾氣太大了。

劉：那跟你書中的形象好像差異很大，所以你跟兒子的互動關係？

侯：還不錯，現在兩個都很好。其實你當了爸媽就會知道說要做一個很開明的爸媽，這也不是很難。因爲你當國中老師，你知道嘛！一群這種小孩很難搞的，不是每個都很好搞，那就要慢慢一邊跟他相處，一邊要學。你的位子、態度是很重要的，像我後來的態度就是當爸媽那個部分比較少啦！我有點掉到朋友，然後兼兄長那一類的吧！我不太會去干涉，因爲他們的人生到最後有一個底線就是自己選擇。

劉：你都完全尊重他們？

侯：他們擁有最後的選擇權，我能夠盯到的，只是說這個討論有沒有想過？還有沒有沒想完的要再談？這事如果他有想過，然後他做選擇，那就是他的。

劉：對，其中一個就是讓他選擇不要讀書嘛？

侯：對！我們家兩個小孩都知道，但其實這不是可以一下子就放的，你要從小就開始放，從不要讀書、要不要游泳？要不要什麼？一個個放。放到最後，我

跟媽媽的邏輯就是說，你只要都想過，你就做選擇，因為這是你的人生，你一定要擁有選擇權，而做父母的只能提醒那個你有沒有想過？譬如說你要去美國，對不對？那我就跟你說這個、這個、這個，有沒有想過？你想的又是什麼？其他的路你是怎麼想？你怎麼做？然後你有沒有問過？如果都好了就去啊！像我小孩去了就沒問題。

劉：是因為基測比較不理想？

侯：對！一方面是不理想，然後一方面他也覺得說該做的也都做過了。

劉：因為我自己在國中教書，所以覺得好像跟我們那年代一樣沒變，現在國中基測你還不能錯耶！像建中可能錯三題就再見了。

侯：台灣整個教育的問題很大啦！但是我從來不太去提這個事，因為沒有立場去提。台灣現在整個教育，它不拉到整個國際化的局面，因此落後全球，反而還更靠近大陸。像美國現在的整個教育，如果你看我的小孩去唸，你就知道說那個才是教育，一個老師他帶不到十個學生，然後對學生是瞭解，老師跟學生永遠只有權利、義務關係，沒有說我是師長的關係，所以美國的小孩子跟老師都是互相瞭解的。我的小孩子甚至從代數開始唸起，X加一乘除，我說你怎麼唸那麼簡單的？他說不是，他說我是學單字，然後我說那學完單字也可以跳進一級了吧？你就學單字而已嗎？他說不是，以前光背公式，現在才第一次真正學數學。美國的小孩子兩點多他就下課了，下課以後有很多活動。像我的小孩去以後就拉高，然後身材變壯，開始跟黑人在那邊運動，他有很多同學是國家球隊的球員，他們只要有七十分就可以進大學。他認識了一大堆國家代表隊，他們送他球鞋、簽名，他說收集起來，以後拿來賣。我就覺得小孩子在那個地方，他整個獨立了。而且學校有很多課，譬如說看電影，然後跟他們討論，如果這學期討論的是人類的未來，就給他們看三、四部都是在講人類的科技片、動作片，很適合高中學生。老師還會要他們發表，跟他們談，整個學期就在討論這件事情。這種東西如果放在我們國內，一定會說不可行，因為老師沒有這個素質。

劉：我自己是老師，我覺得是考試領導教學，你再怎麼活潑的方式，可是基測就是畫卡、四選一，永遠都是四選一。我們好像讓學生變成一個考試機器，只懂得怎麼解題？

侯：對！其實美國也是這樣，可是美國回過頭來，第一個，它要你 GPA，但這在台灣就會有問題，一定懷疑這樣會不會有人做假？可是美國那個水準已經到了，老師基本上不太會做假，所以大家可以相信那個 GPA，而且好的學校 GPA 跟不好的學校 GPA 是不一樣的。再說它只考最簡單的，它考 SAP，就是英文跟數學，也就是我們的中文跟數學而已嘛！而且它並不考文言文，所以到最後，這表示你一個大致上的數理跟文字的能力，然後還會看你其他參與的活動。而且學生可以一直考，甚至從二年級就開始，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就說美國的學校它當然也比，可是壓到最低，那學生就不用把所有力氣都放到準備這個東西。夠聰明的人，其實只要把 SAP 搞好，然後你 GPA 都跟的上，這樣就可以了。整個美國教育它就如此，但是一旦進入大學之後，學生就很累，好的大學非常累。那所以他的學生，

劉：跟我們顛倒、相反。

侯：對，他好的學生在讀書，可是他能夠讓你很累是因為他的教授、他的學校素質夠，所以他可以讓你很累。台灣的大學最大的問題是教授素質不夠，只要教授跟你沒有那麼大差距，就沒有辦法讓你很累。譬如我以前帶一個醫學跟人文的研究所，上課時就每一學期開五十六本書，少的時候四十八本，然後要學生就算沒唸完，也要把它找完。我在想說碰到這種老師，要很高興，因為不是每一個老師都可以開五十六本書給你唸，因為你要唸這五十六本書，你回來找我，我一定要唸過。事實上我還可以再狠一點，可以開給你五百六十本，但是如果你撐得過我這個東西，你就會變。但台灣沒有幾個教授可以這樣搞啊！在大學裡面如果永遠可以這樣的話，那學生就會願意吃苦嘛！如果說老師自己沒有唸過，你開五十六本來，學生會想又何必呢？這整個素質上都有問題啦！美國教育系統最大的好處是說它的學生出來，他的能力基本

上跟他的學歷是相符的，所以一個學生能夠從哈佛出來，

劉：他就有那個實力。

侯：對！而且譬如說上課有小組討論，他就必需跟人家合作，要有找資料的能力，然後還有參加球隊啊！服務啊！培養他平時對於除了分數以外的東西，包括跟人合作、團隊能力、協調能力，或者在 **persentation**、溝通能力，還有跟別人聯結的能力，或是去指揮一個團隊，用團隊做戰的能力。這些東西，是一個一個都在培養、在堆疊的。所以當這個孩子畢業的時候，他 5 % 的能力可能只是分數，但是他有 95 % 的能力。其實出了社會，一個新人進公司，大概三個月吧！我們就看透這個人了，不是他的分數，而是其他的能力。這個東西的差別真的很大，老闆會看這 95 %。可是現在台灣的問題最大就是在於真正好的學校出來的，卻沒有好的競爭力。

劉：比較不能跟人相處。

侯：對！更糟糕的是他們被培養成只要有這成績，我就很任性，我就可以其他不用管。可是他不曉得這其實是一個弱族群的特徵，一個好的、強的族群，他永遠最強的人都是最有能力的人。

劉：可能因為從小老師、父母就給他們這種感覺：你只要成績好。

侯：為什麼我們教育體系會變成這樣呢？照說過去全世界都是最聰明的人在教下一代，那現在變成聰明的人不願意從事教育。

劉：聰明的當醫生、當律師。

侯：對，那教育就好像是變成一群其實沒有那麼聰明，可是又自以為聰明的人在教，而且這個體系不改變。

劉：我真的贊同，因為有時候在辦公室也會覺得老師都好自以為是，因為我們在一個小王國裡，所有的道德標準、所有的東西都是你一個人決定，沒有人會糾正你，然後學生就一直聽你的。

侯：所以我覺得整個教育體系，說實在的，我覺得比醫界還糟，因為醫界還要面對病人，病人會告他，而且一個病人、一個 case 會死。

劉：可是老師現在也會被告喔！像是體罰啊！

侯：你只要不犯那個就沒事了嘛！

劉：可是現在連罵遲到大王也要被告。

侯：都是 discipline 嗎？都是訓導這些事嗎？

劉：嗯，大部份。

侯：對，但是我們的教育體系沒有一個老師教學的標準。

劉：可是父母要看的就是第一志願的人數。

侯：對！這些也就是一個共犯結構，我覺得這國家如果整個教育體系不改變的話，它永遠就只好當二流國家。

劉：你的成功會不會給你的孩子很大的壓力？

侯：我試著不要，可是沒有辦法。

劉：比如說那些老師都知道你爸爸、媽媽是侯文詠、是醫生，你怎麼考這個成績？

侯：他們已經過了這段了。

劉：如果他們作文寫不好，或者國文不好？

侯：他們過了這一階段了。

劉：那有遇過嗎？

侯：有啊！就說你爸是侯文詠，那你作文怎麼可以寫這樣？他們都遇過了，所以我的邏輯就是說：人生一定會有挫折嘛！如果這也是你人生的挫折，那我沒有辦法。

劉：可是你是從這種體制裡面出來的頂尖人物，你怎麼可以忍得住不讓他們跳下去玩這個遊戲？

侯：不是啊！因為在這邊贏沒有好處，贏的好處很少。

劉：可是你是在這個遊戲當中得到好處的人，你會覺得：爸爸很會玩這個遊戲，就帶著你們玩這遊戲？

侯：沒有啊！我如果要繼續玩，就應該當醫生、當作家，然後現在應該有個教授頭銜，甚至當院長，然後繼續佔據媒體，做個節目，把所有東西都控制在手

上。但那樣的我失去會更多啊！因為任何一個東西都會有副作用的啊！

劉：還是因為你都達到了，所以你就不會把這期望放在小孩子身上？

侯：沒有啦！看你對小孩子的邏輯是什麼？我希望他在他的人生舞台裡面能夠發展，然後得到快樂、得到幸福。這是我的期待，所以我的目標就是那個，任何推他往這個目標的，我都會支持。

劉：你老婆也支持？你們大家的方向都一樣？

侯：對！但如果跟這目標相反的，我們就不會那麼鼓勵他去做。我並不覺得說在這個世界裡面領先、一直贏，然後得到所有的物質資源會讓他往那個方向走。

劉：可是我自己在教書的時候，會有一種想法：可以講出這些理論的都是現在的家庭是中產階級以上的？然後有資源讓小孩出國讀書，有資源可以給他一些什麼。可是有很多鄉下的小孩子，或者他父母知識水平、經濟水平沒那麼高，他就沒有辦法？

侯：當然！

劉：很無奈啊！

侯：很多人跟我說：你為什麼不來講美國教育跟台灣教育的差別？但是我沒有立場講啊！事實上是有差別，以美國現在的教育想法、思維，它是一個比我們更好的教育思維，我們在 follow 過去的美國，美國現在已經不太一樣了。但那個教育是我沒條件立足去講，為什麼？因為我講的等於是，

劉：又唱高調？

侯：或在造成一個落差而已，那事實上應該改變的是說，要把整個台灣改變成現在這種美國的教育思維。

劉：可是好像很難？

侯：很難！

劉：我覺得很難，因為我現在要帶國二升國三了，雖然沒有能力分班，可是有能力分組。其實你會知道最後在玩那些分數的，就是那少部份的人，其實絕大部份的人，根本連玩都別想玩。我都鼓勵他們就過正常生活好了，因為你會

知道如果沒有在最頂尖，其實結果會是一樣的。

侯：可是我跟你說喔！這社會的反應也很快，只是說現在這群人會被犧牲了，爲什麼？因爲有一天當大家慢慢發現說，其實那些成績很好的人也沒有賺更多錢，也沒有特別受尊敬。而這件事就好像說西方跟東方以前差那麼多，但現在慢慢在變小。成績好當然很好，我覺得我從來不反對人家成績好，但是如果只因爲成績好，而失去了其他的能力，就好像你數學一科考一百分，其他都考四十分，你的人生還是過不去的。所以對很多家長而言，有一天他也會發現說：我的小孩就不是讀書的料啊！那爲什麼逼他去讀書？爲什麼不讓他培養很多能力？快樂一點，找人脈，讓他在興趣裡面找到一個他可以做的。這種小孩將來賺的錢是在管那些讀書的人耶！譬如說我的朋友裡面有一些非常有錢的人，我算算學歷高的不多。或是我的環境裡面有一群是很被尊敬的人，並不是說都是醫科的，因爲這些人在將來的時代會越來越不重要。台灣正在轉變，譬如說科技業的大老闆，以前科技業是人人羨慕啊！就好像現在大陸人想去富士康一樣，可是現在科技業的工程師常有肝炎之類的毛病，所以沒有人要，

劉：再當了。

侯：對！你如果去看西方的一些國家，譬如說歐美或者一些資本主義比我們更久的國家，最受人尊重的，往往不是最有錢的人，因爲錢這個事像喝汽水一樣，第一瓶很好，可是喝到第三瓶，同樣的代價，但是已經沒那麼好喝了。那物質的東西永遠是這樣，但怎麼去跟現在台灣講這件事？我沒有辦法去，我不可能像史英那樣去批評台灣的教育，因爲只會得到反效果，副作用會比作用更大，這就是我們醫生的思考邏輯。所以我現在反而會換個角度說，像我出一本書叫做《不乖》，裡面我就提到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今年暑假會出。

劉：就是老師前陣子在趕稿的？

侯：對！

劉：也是長篇小說嗎？

侯：不是，我就是一篇一篇寫。因為我過去都問問題，現在想來跟讀者討論一下，除了教育我們的分數以外，哪些能力是活在這個時代裡面一定要有的？在學校所教的事之外，更重要的事是什麼？然後我就開始講，一個個講，我講所謂不乖是一種創新，因為跟著昨天的標準，明天可能就過時了，如果不乖才能夠一直不斷的創新、不過時。我講失敗比成功更好、熱情要比認真更好、用自己的腦袋思考比用別人的腦袋思考好。然後我講要有快樂的能力，因為快樂能力永遠是一個人到最後很重要的競爭力。還有講八個我覺得最核心的東西，但這些東西學校是不教的，學校的重點裡面不把它們當做一個要被評分，要被教導的能力。

劉：因為那很難評分。

侯：對，但這些動力都會決定你更重要的人生，我只能用這個邏輯去寫我的書，你懂我的意思嗎？我沒有辦法回到那個邏輯去批判教育，因為從某個角度來講，我知道我講的是對的，但我現在沒有立場去講，因為台灣就是這樣啊！

劉：我對醫院體制內升等的流程比較沒有概念，可以談一下嗎？因為你升等算是快嘛？

侯：還好啦！住院醫師是四年嘛！有些科別是五年嘛！

劉：你應該是一退伍完就去台大當住院醫師？

侯：對！然後就升主治醫師，主治醫師在台大裡面是醫院的行政職，它是最高等了，你當院長也是主治醫師。但是台大醫院有一個醫學院，所以它就有教職，而教職是有分等級的。

劉：住院醫師完就馬上變主治醫師？

侯：住院三年，第四年是總住院醫師，然後再來就是升主治醫師。

劉：總住院醫師要幾年？

侯：一年。

劉：是快嗎？還是正常？

侯：正常，正常一年。那個過程都需要審核，每一個過程會淘汰很多人，然後剩

下一些人。

劉：在你的小說裡面升等的情形有描寫到，好像？

侯：那是教職。

劉：嗯，那是教職的升等。

侯：那是醫學院的教職。

劉：好像陳寬就是？教職？

侯：類似。

劉：你在散文裡有提到你的升等，其實有些教授也會酸你？

侯：是這樣子，我是四年唸完以後，台大有一個叫做研究所。

劉：什麼四年唸完以後？

侯：我四年住院醫師出來就變主治醫師，而我主治醫師第一年就跑去唸台大醫學研究所，它屬於台大醫院醫學院的。

劉：住院四年後，是應該先到總醫師？

侯：沒有，住院三年後，第四年是總醫師。

劉：第四年是總醫師？

侯：對，我住院醫師、總住院醫師做完之後，變成了主治醫師，我主治醫師的第一年就去唸台大醫學的臨床醫學研究所。其實就是台大有點像那種將官班啦！畢業的包括現在的侯勝茂，還有以前的林芳郁這些衛生署署長，他們就說那個是培養台大的教職、衛生署署長的搖籃。在過去台灣的升等邏輯是畢業博士拿到了，就變成副教授。但是在我唸到一半的時候，它就改了，但改的時候它還沒實行，所以我們有兩三年是處在比較模糊期，如果按照它的辦法實行，

劉：變成不利？

侯：對，我應該升教授，但現在就變成要從助理教授重新做起。而早我一點畢業養成的，他就是副教授，可是那中間所代表的可能是四年的一個 gap。不過其實我已經非常快了，因為一到主治醫師就可以去唸博士班的，其實非常

少，而且我畢業很快，大概四年就畢業了，所以是很順利的。

劉：一畢業就升等，就變成副教授？

侯：照原來的邏輯，博士是副教授，可以去升請副教授，可是後來那時候如果按台大邏輯，我要去申請助教。

劉：所以只有申請到助教？

侯：沒有，後來我就沒有申請，我離開了。

劉：所以你的學校教職沒有去申請，就直接離開？

侯：對，離開的時候我還是講師，是後來北醫聘我去教的時候，北醫就按照舊規定，我申請就是副教授。如果在台大的話，就會成了助理教授。教育部是你申請送來我就承認嘛！

劉：所以你在北醫申請就變成？

侯：因為它聘我的時候，直接送出去就是副教授，所以我後來在北醫教書一直是副教授的教職。

劉：所以這跟陳寬的升等有類似的情節嗎？被刁難？

侯：台大每個人都被刁難啦！沒有不被刁難的啦！

劉：因為我記得好像有些教授就覺得你寫書那麼有名氣，應該不在意這個升等。

侯：他不是針對我。

劉：是每一個都會這樣？

侯：台大的教授是想：大家都升那麼快，以後誰來替我們做事情？（台語）

劉：因為你的身份比較特殊，在醫學院當中大家會覺得？

侯：多少有啦！但我後面也有背景啊！我後面也有挺我的教授啊！你別忘了我是派系鬥爭裡面的。

劉：所以在《白色巨塔》中，你是不是就把他們挖出來對號入座？

侯：也沒有啦！因為如果是這樣就變成不是文學了，所以我一直在避免。

劉：可是那裡面的情節寫得真的很生動，所以還是說很多角色的共同組合？

侯：對，那氛圍是對的啦！因為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寫實小說嘛！但如果可以對

號入座，它就變成是八卦，而不是文學。

劉：我發現那三本小說《白色》、《靈魂擁抱》，還有《危險心靈》，你的主角好像都會很明確去做一件一般世俗認為是錯的事情，你不要讓他們變成完全的好人，是有刻意這樣注意嗎？比如說謝政傑真的有去吃毒品，然後比如說去嫖妓、對愛情不忠，你是有刻意讓他們做一些？

侯：對啊！我不相信完全的人。

劉：所以你就刻意讓他們不要太完美？

侯：對啊！也不是，就沒有人是完美的。

劉：有的小說會讓主角避開這些事情。

侯：我不要啊！我覺得為什麼要？那是一個很過去的觀念，就是要表彰正面的，但其實我的小說是想回到比較靠近人生一點。

劉：因為你如果不把他完全正面，其實你有時候要說理就沒有辦法說的理直氣壯？

侯：無所謂啊！

劉：我發現你好像在書中都會反反覆覆跟自己對談？

侯：對啊！

劉：可是，你不會覺得謝政傑在說理的時候，跟他的身份不符合？

侯：不符合，對！那無所謂了。

劉：所以你在小說中想要說理的那個欲望是不是很高？

侯：盡量不要啦！因為那樣多了是不好的，那個很討厭啦！

劉：《靈魂》跟《危險心靈》好像就越到後面說理越多？

侯：對，這個不好啦！可是解決方法不是說理變少，而是要把故事弄得更精彩，你就不會覺得在說理了。

劉：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危險心靈》裡面那個女孩子，一開始你會以為她偷錢是被誤會，等到快要到結尾的時候，

侯：是她偷的！

劉：是她偷的！然後《靈魂擁抱》裡面那個讀者，一開始大家以為她是神經病，沒有跟那些暢銷作家發生性關係，可是你後來發現，

侯：是有的！

劉：是有的！你是故意都這樣做安排嗎？

侯：對啊！你不覺得這樣比較接近真實人生嗎？說他沒有，然後一副很可憐的樣子，就好像夜市人生喔！

劉：你周邊真的有那種事情？

侯：就這樣說啦！連一個作家也很難是完整的作家，你會對一個作家有期望，希望他某個邏輯符合你想像的那樣子，可是這作家永遠不會是。然後有些作家他明知道這是缺點，可是又覺得不全然。譬如你提到說理，可是如果真的去看托馬斯曼的《魔山》，那才叫做說理，可怕到簡直是不行。或者是去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與罰》或《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才叫可怕的說理。所以相對之下，一本二、三十萬的小說，如果是謝政傑，他其實根本不叫說理，我的意思是如果跟那些比的話。但現在為什麼大家會覺得它很說理呢？這又回到我的問題，因為大家的期待是一個通俗小說嘛！而我自己也說要當通俗作家，可是忍不住又露了餡，那狐狸尾巴又跑出來，所以我下次應該要再進步的地方是說，要把故事講的更精彩，更生動一點，那個生動就會讓你覺得說理沒有那麼討厭。但是如果我放棄了想講我知道的道理這一塊，從某個角度想，我可能就不想寫東西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劉：我知道，因為你就是想講道理才會想要寫那些東西，傳達一些理念。

侯：對，但是講道理是不對的。

劉：可是那種道理好像又沒明確的往一邊靠耶？我每次要靠到那邊的時候，就覺得你又要靠另一邊。

侯：啊，所以你會不舒服嗎？我沒有要讓你們舒服啊！

劉：對，我們好像習慣答案就是一或二，但我們真的以為答案是一的時候，你就說二也可以。

侯：因為你一直在問我答案是什麼？可是我就是討厭答案，看書要用自己的腦袋看，我如果看完讓你一直搞不定，促使你開始去想，這就是我的目的。所以我前面幾本小說，如果你看完，產生了問題，那這就是我要的。但你看完如果有答案，那我要去撞牆了。因為我不要你有答案，答案太舒服了，而且我的答案一定是錯的，因為台灣教育哪會有答案？

劉：所以你在小說當中也有意識到，不管是說理的部分，或者是讓那個理由矛盾的部份，還是讓主角裡面有一些性格的瑕疵，這都是你有意識的在寫？

侯：對！

劉：不是在無意識狀況下這樣寫？

侯：那怎麼會好幾本都是這樣？就算都是無意識，它也是一種很根深柢固的潛意識吧！

劉：還有這三本裡面都會有一兩小段很露骨的性的描述。

侯：還好啦！那不算露骨啦！以現在當代的標準。

劉：可是跟你短篇的風格、趣味性不同，你好像在長篇就會有，是故意要添加一些嗎？

侯：不是啊！我都已經四、五十歲，一個作家如果還要自我設限，我覺得也很誇張嘛！而且我也覺得讀者會長大吧！

劉：所以不是刻意要加？

侯：就是會碰到啊！好比《金瓶梅》就是會有啊！我是這樣子，我不會去寫這些事，但碰到也不會避啊！所以我最近看到博客來好像在國中還高中的選文書中，竟然把《金瓶梅》選進去了。

劉：國中沒有，應該高中。

侯：高中選進去，然後我覺得對呀！這個態度才對啊！國中生現在上床的比率多高啊！如果他不能看這個書是很奇怪的，我們的教育永遠跟不上真實。老實講，你如果知道一個國中生的生活，他每天在看A片，還有日本AV女優他們多熟悉，但看這個又會怎樣？反倒你自己綁了很多東西，讓他們沒有辦法

去碰觸到真實的世界，這個才可怕，這個是他們小孩子變壞的最大邏輯。

劉：《危險心靈》不算是你自己的經驗？剛剛提到你是收集一個 case。

侯：因為我的經驗太過時了，那已經是二、三十年前。

劉：可是老師在補習應該也過時了吧？

侯：過時？沒有，二零零幾還有，很多，我小孩子就有啊！

劉：因為我們那邊的國中老師已經不敢了，因為怕被告。

侯：因為你們是最近這幾年，我寫的時代是二零零三年、二零零二。

劉：那《白色巨塔》就是以台大？

侯：九幾年的時候。台大現在不是這樣，像現在如果要寫就一定有醫院評鑑，一定有健勞保、一定有錢這件事。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那時候錢是紅包，現在反而不是這個。

劉：你會不會覺得在寫《白色巨塔》就跟《急診室的春天》一樣，那是你們這種醫生作家的賣點？然後寫那種東西都特別拿手的感覺。

侯：也不是賣點，就是他除了寫這個，還能寫什麼？如果開始的時候，也沒有別的可以寫啦！

劉：你覺得醫生作家，醫生這個身份對你來講是助力還是包袱？你是不是想透過作家去做醫生做的？只是他們救的是人的身體，你想救的是心？

侯：我沒有那麼醫生掛啦！我就是我，譬如說我今天如果是個律師，就會寫律師的小說，因為熟悉嘛！我會寫我感觸到裡面讓我最深刻的事情，所以我做了什麼就會寫什麼。

劉：可是好像讀者反應都特別好，像《大醫院小醫師》或是《烏魯木齊大夫》，然後《白色巨塔》？

侯：《親愛老婆》沒有醫生也很好啊！《頑皮故事集》沒有醫生也很好啊！就算是我寫的醫生，跟王溢嘉寫的《實習醫師手記》也完全氛圍不一樣。

劉：可是別的作家寫不到你們這一塊，因為沒有醫生的身份？

侯：那也一樣啊！我們寫不到別的作家那一塊啊！你看山崎豐子也寫《白色巨

塔》，但他就是一個記者。

劉：他的作品是在你的之前嗎？

侯：對，那本《白色巨塔》在我之前。

劉：所以你那時候是先看過？

侯：不可能看啊！台灣根本看不到那本書啊！而且那時候它根本沒有翻譯，它的翻譯本是在唐澤壽明演出之後才有的。而且以我的邏輯來說，如果知道他有那本書，我的小說也不會叫《白色巨塔》，因為想辦法避它都來不及，怎麼會去跟他一樣？

劉：可是大家都會拿來做比較。

侯：就很倒楣啊！沒有道理跟他正面衝啊！就是因為不知道啊！這也是無知啊！

劉：所以醫生這塊你還有打算再寫？

侯：我現在離它很遠了，就不容易再寫，這就是真實的情感。你說我有沒有辦法再寫像《白色巨塔》的東西？沒辦法了，因為現在的問題都完全不同了。

劉：那時候台大有反彈嗎？

侯：有！

劉：因為大家都認為是台大。

侯：有啊，有反彈，有很多反彈。然後我的兼任教職也是在那個時候拿掉了，他們就不再聘了。

劉：因為這本書的關係？

侯：對，就是因為這本書啊！就是不再聘了。後來剛好有邱小妹妹的事件，那時候很支持我的，像黃達夫院長，就連醫界大老也有不同意見，認為台灣應該反省！邱小妹妹以後，台灣整個媒體就開始翻了，醫學院的學生都要唸這本書，所以我這本書幾年內又變成一個醫界中，好像比較有良心的代表。

劉：它後來變成電視劇，包括《危險心靈》、《大醫院小醫師》都是因緣際會？

侯：都是因緣際會，就有人來找，我也很樂意。

劉：哪一部是製作人？《白色巨塔》？

侯：《危險心靈》！

劉：《危險心靈》是製作，那其他的？

侯：那個是蔡岳勳他們公司的，我就不是製作人了。

劉：你後來會對這塊有很大的興趣嗎？

侯：當然啦！因為像《危險心靈》播的時候，公視那個網站是擠爆的，只要九點播完以後。你就會發現說，整個台灣有那麼大一塊創傷是沒有人在提的，過去也沒有人在講。而且後來有一次，不知道哪個國中有學生被罰坐到外面去，然後報紙就刊頭條，當天下午學校就跟老師出來道歉。這件事在我二零零二年寫的時候，是不可能的，可是因為現在有這個小說，而且它的頭條就說這是謝政傑的翻版、《危險心靈》的翻版，然後包括電視也在追，因為謝政傑那個影像太清晰了，就變成一個我們台灣的共同記憶。我在二零零二年寫的時候，沒想到也不過六、七年的時間，它就變成一個改變。當然不能說徹底改變教育，但它是影響了嘛！因為我這個書變成影像，它對校園的文化是有改變的啊！我覺得一個老師再怎麼樣，也不應該把學生的課桌椅拿到教室外面，因為這是在羞辱自己啊！這不是在幫學生，再怎麼處罰學生，都還要回到學生是來受教育的這個立場，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可是台灣竟然能在七、八年內就改變了。我覺得這就是我說的通俗文化跟大眾文化裡面最有趣的一部份，就是它有影響力。這個影響力是我想要去做的事，因為我在乎這個影響力。你說我有沒有辦法改變？沒有辦法！但是教育是比你想的還要複雜一千倍、一萬倍的事，如果我能改變這一點點，那我就覺得說，這就是我們做為這樣一個通俗或者是俗氣的作家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劉：所以你有預期《靈魂》也會改變成電視劇？

侯：現在在做。

劉：真的啊？

侯：現在在做。

劉：所以後來老師的書越來越厚，跟這有關係嗎？就是你有意識它會變成電視

劇？

侯：沒有，它不變成也可以。

劉：因為我覺得你的小說都很有畫面跟情節的段落。

侯：對，就是如果要做的話，對我來講比較大的吸引力反而是參與這個時代。台灣的小說很好玩，就是不寫當代，寧可去寫科幻、寫什麼，然後沒有人關心當代，明明當代很精彩、問題很多。我基本上就只寫當代，而且是只切當代的大問題，等到再變成電視劇的時候，我的想法也不是說要拍偶像劇，要很紅、很轟動，或是可能賺錢或賠錢，這都不重要。我的樂趣在於它可以化爲更大的影響力，可以讓大家再跟著我想一次。當代有那麼多事情，我們覺得那麼美好，但其實都是讓我們更不自由的東西。

劉：所以《靈魂擁抱》已經在籌拍當中？

侯：對！現在在跟公共電視、跟導演討論，劇本大概整個輪廓都畫出來了，可是也沒有那麼快啦！我做東西很慢，大概一兩年跑不掉。